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湖南文史

第
34
辑

周谷城题

湖南文史杂志社

湖南文史 HUNAN WENSHI第34辑

编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主编/田伏隆

副主编/丁 江 高 原

责任编辑/朴永丁

出版/湖南文史杂志社(长沙市迎宾路15号)

发行/湖南文史杂志社发行部

印刷/湖南省轻工业专科学校印刷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湘长广准字第0152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6.47 字数/160,000

版次/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长沙第1次印刷

国内统一刊号/CN43—1311

定价/2.00元

● 主 编 田伏隆

● 副 主 编 丁 江 高 原

● 责任编辑 朴永子

湖南文史 目 录

19 2 89
(总第34辑)

同 业 公 会 史 话

- 工商同业公会的起源及其衍变……省民建工商联文史办 (1)
建国前的长沙市工商业同业公会……孙志明 (6)
长沙市卷烟业同业公会的回顾……黄曾甫 (27)
长沙酒酱业同业公会……杨昌炳 彭芝亮 (35)
长沙西药业的药品质量和物价管理……马国奇 李家赞 (39)
长沙市饮食业同业公会……王正球 (42)
长沙南货业同业公会的几点回顾……莫浚源 (44)
长沙照相业同业公会……朱振三 (47)
长沙百货业申庄二三事……张鉴之 (49)
长沙绸布行业条规四则……朱运鸿整理 (54)

工 商 人 物 自 述

- 惨淡经营航运业的历程……彭六安 (59)

名 人 与 实 业

- 实业家章克恭事略……章执中 (78)
记青年企业家发明家朱培立……江立仁 (81)

经 营 之 道

- 长沙大盛绸庄的生意经.....省市民建工商联 (93)
“精神”追踪录.....李秀方 (99)

电 信 业 史 料

- 建国前的湖南电信业.....王 钧(105)

金 融 黑 幕

- 民国时期的币制及沅江工商业市票.....刘剑秋(119)

湘 籍 文 化 名 人

- 我所知道的女作家白薇.....李长钦(125)
名画家翟翊的一生.....熊淑文(138)
曾熙传略.....赵民伊(153)

教 育 沧 桑 录

- 朱经农与湖南教育.....刘寿祺(158)
建国后湖南教育界大事一瞥.....曹国智(174)

补 充 · 订 正 · 质 疑

- 对《解放湘南》一文的订正意见.....郭明龙(197)
订正《中统在湖南的活动》一处史实.....陈崇鏊(200)
《浏阳起义前后》一文首句失实.....王兴刚(201)

- 历代贡品 莲中珍品.....(202)

工商同业公会的起源及其衍变

省民建工商联文史办

工商同业公会是自律性较强的行会组织，它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生和发展逐渐形成的。为维护经济的正常活动和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历史上曾起过有益的作用。虽限于当时历史条件，其间不乏消极的内涵，但其积极的一面，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今天，尚有可供借鉴之处。

行会组织，在我国可以说是历史悠久。在唐代就有以行分类的记载，所谓团行组织（简称“行”）即同类商店、作坊的一种联合组织，“《太平御览》卷191引《西京记》”：“东都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四面各开三门，邸凡三百一十二区，资货一百行。”宋代分行更多，有二百二十行、四百一十四行的记载。后来以明代统称的三百六十行作为惯语。商店、作坊组成团行，是为了谋求在经营等方面的共同利益，但另一原因是官府为了便于控制和需索。《都城记胜·诸行》：

“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名，不以其物小大，但合充用者，皆置为行。”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经济活动的组织性和社会性的特点，要求相应的规则和秩序，以保证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如是清代的团行出现有地区性的组合，权限也扩大了，如摊派官差，议定货价，代催税款，以及排解同业间的纠葛，制定相应的规约章程等。以湖南为例，行会组织，名目繁多。有按籍贯组织的会馆，也有按同业或经营关系组织的行帮。属于前者有江西籍的“万寿宫”，福建籍的“天后宫”，广东籍的“岭南会馆”，江苏籍的“金庭会馆”等，属于后者的有银钱业的

“财神殿”，药材业的“药王庙”，屠宰业的“桓侯庙”等。会馆都祭祀一个神主，作为精神团结的偶像，这些被祭祀的神主有“孙思邈”、“张桓侯”、“詹王（易牙）”、“财神（赵公明）”以及绸布业的“天孙”，丝业的“嫫祖”等，所以会馆也称为祀神公所。

会馆的首领称总管或称值年，职责是掌握会产，主持祭祀，处理和调解同业之间的纠纷。更大的一些会馆，有各帮的首领，称为帮董，大都捐有五品以上顶戴，身着官服，出入官府。会馆受官府保护，为官府支差派捐，在同业中议定行情市价，约束徒弟伙计，制订行约店规，调解纠纷，同时也组织壁垒，对抗苛勒，抵制外来资本，因此，在同行业中有较强的凝聚力。

会馆的经费均来源于商号的捐款，捐款分基金捐款、常年捐助、临时捐派三种。平时新商号入会亦须缴纳一定数量的捐款。

会馆每年举行年会一次，多在祀神之日，如农历三月十五日之财神会，八月十八日之杜康会，八月二十日的赵公会等。也有每月举行一次或两次例会的。会议内容大多是：公议价格，解决同业争端，商讨改善经营，维护同业利益。如益阳各帮在商定价盘后，用告白通知：“自某月某日起，某货定价或加价若干，公议遵行”。发给价单，照价发卖。又如长沙市商会每日搜集各行业公会议定的市价，汇编成《商情导报》自抗战胜利后到解放前夕，迄未间断发行。价单式样如下：

公 議 所	益陽商會籌款委員會		
	桐油 茶葉 香粉	油時價足銀	文
	宣統元年 月 日公立		

违反公议条规要受到处罚，处罚的办法有多种，如罚戏、罚酒席、罚钱或并罚戏和酒席。如湘潭酱园业浙、南、西、本四帮，公议货价违者罚酒席四桌，戏一本，钱五千。最严重的处罚，则是革逐出业。安化西帮药业有犯规约者革出境外。各地均有是项实例。由此可见会馆的权力之大。下面是茶陵鞋业的一个革条。

茶陵衡帮革条

立革条衡帮鞋店曾正茂、义和、义升等因本帮同业大茂窝藏销赃，业经查实，我等公同商议，革出该大茂，永远不许再入茶陵州营业，本街亦不能雇用、隐匿，以整同帮同业规程。特此告白。

宣统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衡帮公贴

1917年2月24日，北京政府农商部公布《工商同业公会规则》令各省将旧有之同业团体——会馆及公所等依照规定组织同业公会，次年6月11日又公布《修正工商同业公会规则》及《工商同业公会规则施行办法》，规定呈请设立同业公会须由发起人“陈明设立同业公会之必要理由”并造具“该区域内同业者之商号及经理人姓名表册”取得所在地商会之证明文件，报由地方长官呈请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核准，并汇报农商部备案，依照上述规定，湖南即开始有同业公会之组织。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将原《工商同业公会规则》修改成为《工商同业公会法》及施行细则于8月17日公布施行。这项法规规定：“工商同业公会以维持同业之公共利益及矫正营业之弊害为宗旨。”“同业之公司行号，均得为同业公会之会员，推派代表出席于公会”。公会法公布施行后，湖南各地，特别是长沙市各行业纷纷组织同业公会，当时有76个行业正式成立

了同业公会，共有会员7856人。

1938年国民政府又颁布新的公会法，确认各公会为法人，并赋予各公会组织同业联营性质的任务。以后湖南各地的同业公会陆续增加，全省有同业公会2124个，长沙市的同业公会亦由76个增加到1946年的89个，而1947年湖南省社会处登记的长沙市工商业团体名册则有97个。后来湖南又成立了“工业会”同业公会又划为××工业同业公会，××商业同业公会，大部份既是商会会员，也是工业同业公会会员。

新中国建立后，在原来工商同业公会的基础上，加以整顿改组，组成新的工商同业公会，成为工商业联合会的基层组织。新中国的同业公会，是由各行各业的所有企业，自愿参加的民间自治组织。它在行业内部进行企业间的协商协调，以减少在自由竞争中的盲目性。同业公会在工商联的领导下，同受国家有关部门的监督和指导，协助政府贯彻各项政策法令，如国家物价政策，评议税负，市场管理（工商户的开、停、并、转以及出外采购证明，都得先经同业公会调查，签具意见，转工商联报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组织物资交流，协调劳资关系和兴办社会公益及缴收公费，负担、分摊工商联的经费等等，并代表各企业，为企业服务，保护各个企业的合法利益，起着国家与企业之间的桥梁作用。如建国初期，长沙市有70多个工商同业公会，在工商局的指导下与政府各业务部门商谈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类业务的具体办法，代表各企业与政府主管部门签订合同，既保护各企业的合法利益，又实现政府主管部门对各企业的间接领导。那时通过同业公会实行行业管理，成千上万的私营企业，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据祁阳县1953年材料：

“祁阳城关有同业公会三十五个，包括商业、工业、手工业、服务业，还有摊贩，当时政府抓工商工作的只有城关镇工商助理一人，县工商科干部三人，千头万绪的工商事务工作如评

税、纳税、购买公债、抗美援朝捐款、义务劳动、市场管理、整理摊贩，培训办学以及社会公益等事宜，均由工商联及所属的同业工会承担。

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之后，急于求成、求纯，各行各业进行了一系列的大并大撤，由相应的部门归口统一管理，这样，工商同业公会的作用也就自行消失了。

建国前的长沙市工商业同业公会

孙志明*

一、同业公会的源起

溯自明初洪武年间，长沙府县同城，即有“行市”出现。清初顺治，历经兵燹，庐舍为墟。后经康，乾得以复苏，嘉庆年间已百殖繁昌、商贾云集。咸、同以后，市场兴旺，省城居民大增，工商各业兴起，外省商人纷至沓来，为了联络乡谊，旅居绅商还有会馆、宾馆、试馆及同乡会之设。其基金及基地，多为同乡人中富绅巨贾所捐助。据史料记载：1935年，长沙有会馆、宾馆、试馆共33处；同乡会22处。其目的是为同邑人服务。随着乡帮崛起，防止利权外溢与市场角逐，因而帮口极紧。如“丰帮”（江西丰城），不用外乡人，从学徒至店员均为丰城籍人。

各种同业以同籍各为一帮，帮规各异。为了行业的共同利益，始有公所之设，最早是行帮商人公共集会之场所。处理有关同业之权利、义务之分担，政府命令之上传下达。即同业公会最初之组织形式。清中叶咸丰、同治之前，公所尚未成立，即利用城隍会，各业自行组合参加赛会祀神，总名为“普天同庆”会，下面如“万育群生”（南货业）、“寿世培元”（药业），“天孙云锦”（绸布业）等等，后来公所成立，有的还保留着某某公会称呼，带有浓厚的封建行帮色彩。长沙早期的公所有29所（附表），清末有公所、公会、官、堂、会、庙69个。不论名称各异，一般皆公举总管2人，值年若干人（少数行

* 孙志明系长沙市民建、工商文史办干部。

会也有设主任的)，总揽其事，总管3年一任，值年1年一任。

二、同业公会的衍变

(一) 沿革与衍变。

1904年，长沙开埠，设立海关，清廷下诏，劝办商会，因此，乃有湖南商务局之成立。湘抚札委王铭忠为总理。“翌年农工商部编订商会，设立章程，奏准颁布，吾湘商人复谋湖南商务总会之设立，屡经集议，由各业推举议董，再由议董推举总理、协理。1906年推举陈文玮为总理，湖商商务总会成立，原湖南商务局即行撤销”。此为省城民间商会之始。

为了革除陋习，纠正弊端，进一步发挥民间工商团体的作用。1917年2月24日，北京民国政府公布《工商同业公会规则》，4月17日，农商部又公布《修正商业同业规则》10条及《工商同业公会规则施行办法》6条。6月11日，湖南省长公署令长沙总商会，改组旧商业团体，依照规则组织同业公会。改总管、值年为总董、副董、董事制。

1926年7月，北伐军进入长沙。8月，市商民协会筹建，多数商民积极投入民主革命高潮。钱业首先成立分会；九、十月间，苏广业、绸布业、南货业、药材业、红纸业等也相继成立分会，与公法团体一道开展反帝示威游行，没收焚毁仇货、捉拿奸商游街，仲裁劳资纠纷，清算商会账目等活动。1927年马日事变后不久即停止活动。

1929年8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完善工商团体的组织，公布《工商同业公会法》，旨在扶持小行业入会（“履业，饮业、面馆业，人力车业、豆腐业、火腿业、理发业、熟货业、邮运业、菜摊业、成衣业、袜机业、火炉业、烛业、帽业以及其他行业”）。随后同业公会骤增。废总董、副董、董事制，立主席和执、监委员制。截至1933年有同业公会85个(附表)。

1938年2月26日，湖南省政府转发国民政府《商业同业公会法》，《工业同业公会法》，《输出入业同业公会法》，令所属一体知照。这次改组的特点是：“……同业公会为法人”；“公营事业纳入了同业公会（国防之公营事业或法令规定之国家专营事业除外）”。其制度仍为执、监委制。

长沙文夕大火后，省垣几成灰烬。1939年2月，虽有长沙临时商会之设立，但同业公会恢复者为数不多。其间，先后经湘北三次会战，直至1942年市商会正式复建后，同业公会逐渐成立者有32个，遂照新章程规定，废主席及执监委制，改理事长、理、监事制。1944年，四次会战，长沙沦陷，市商会随政府流转河西，同业公会亦停止活动。市内虽有伪商会，但未恢复同业公会。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工商业户陆续返回长沙，重新聚集资金开厂设店，市商会亦恢复活动。1946年，全市同业公会登记者有89个；1947年达101个（附表）；1948年秋，国民政府滥发货币，恶性膨胀，不久急剧贬值，不可收拾，市场混乱；1949年，面临解放，少数巨商挟资远走港穗，中小商民多因不了解共产党的工商政策，存在观望心理，停业和歇业时有所闻，市面萧条，仅有78个行业，8,324户。解放后经人民政府大力扶植，号召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市场日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1950年1月，全市工商同业公会先后恢复共有113个（附表），但尚未经过改组整理，仍按旧的规章进行活动。

（二）行业的兴衰。

清末商埠开发以来，长沙市场由自然经济萌发商品经济，生产不断发展、行业竞争日烈，资本主义工商业从20年代至30年代在我市开始露头以后，社会分工日渐细致，一些行业应运而生。它们是：银行、西服、五金、玻璃、火柴、电料、钟表、颜料、图书、针织、百货、绣业、脚踏车、西法洗染以及

为它们服务的转运业、报关业、保险业、轮票业、人力车、西药、浴沐等。一些行业进行分化，成为几个行业同业公会。如米业，这一时期因长沙米市兴旺，营业突飞猛进，分化组成为花粮业、粮栈业（后来名仓库业）、碾业工业（包括碾坊及零售米店）3个同业公会；后来米贩零售店又组成米商业同业公会。一些生产落后为时代所淘汰的行业，因而消失。如马王公会（马鞍业）、碓坊公会、轿业、锡业、扇业等。30年代后期，抗日战争爆发，铁路运输中断，海关他迁。报关业、保险业也随之失去作用（抗战胜利后部分恢复）。长沙解放后，古玩业、金银首饰业、钱业也随着市场变化而消失。又由于文夕大火灾情严重，商民多在火后瓦砾中搭棚营业，出现后来的摊贩业。1942年，由于市场变化，经济中心转向衡阳，长沙市的同业公会恢复仅及抗战前的五分之二。但由于外地香烟来源断绝，本地手工卷烟蓬勃发展，烟作工业同业公会于此时分化为卷烟商业、卷烟工业、烟作业三个同业公会。光复后，卷烟业恢复活动，工厂、商店合并，仍与烟作工业并列于同业公会范畴之内。南货业亦分化为南货业、土果业、糕饼业、糖坊业等。荒货业分化为山货牛皮业、荒货业、碗盏兑换荒货业、大箩荒货业四个同业公会。药业亦分为国药、新药两业。油盐业则分化为油盐花纱业、植物油业、猪油业、油焦业等。绸布业分为布商、土布、呢绒几个同业公会。机坊业也随着市场需要而变化，最初是机坊业，到30年代衍受为葛夏布业、染织业；40年代末又发展为织染布工业、土布工业、葛夏布商业三个同业公会。此外，还有酒酱业一度分开，另成立酱园业和酒作业两个同业公会。名目繁多，不一而足。

（三）行规、条例的形成。

各同业为了自我约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早在公所、公会（类似公所）、同业公会时代，大都先后订有行规、条例

(有关绸布业在清代所订之行规，见另详载)。包括市场划分，支差派捐、革禁陋规，限制开业、限制人数及规定学徒年限，制订操作规程。例如1907年长沙茶叶业即订有行规，1908年，长沙酒酱业亦有行规之设。条例完善者为1933年钱业制订的交易条例。现分别将全文抄录如下：

《长沙茶叶公所茶业条规》

(1) 茶厘照章纳税外，凡地方要公应捐输者，公同酌议，照箱额包额摊派，不得隐循摊派、紊乱商规，违者议罚。

(2) 陋规革禁后，同业人不许钻营，假通声气，私出陋规，至有覬覦茶叶，藉公苛勒者，务须由茶叶公所鸣论斟酌，不许徇隐，私行接受，衅起事端，违即议罚。

(3) 雇经纪无论大号、仔庄，不准浮秤抬盘戕货，收潮湿毛茶，亦不许沟通帮伙，预支佣金，希图脱卸议赔号中欠秤等弊，违即公同斥革。

(4) 收买商户负贩茶叶，兑钱与秤码，仍照向章，不得增减，其钱必须过手足数，免致竞争滋事，违即议罚。

(5) 各号帮伙百工，如查实舞弊确迹，虽斥革不用，亦须告知公董，倘同业徇私或存别见，雇请者公同加倍议罚。

(6) 拣茶工人，应遵号规，拣选尽净，不得迨玩作弊，尤不得恃众喧闹，不服稽查，其拣价视茶多少，均照向章，违即公同送惩。

(7) 船户装运茶箱，不得疏虞，破损沾潮，以重工事，至装茶包花香，更不得踩烂偷漏，希图渔利，其运价均照向章，违即公同稟究。

清光绪三十三年×月×日

长沙酒业公会《行规》

新开铺面，无论吊店及内吊，老铺上下对门要距离七家

方准开贺。对门开业如已歇业，迨后复开者，无论本人亲属均按新店章程，不得仍换〔唤〕老店，以杜弊端，违者重究。新开吊店议出牌费钱四串文，油盐糟坊议出牌费钱二串文，帮伙出备入帮费二串文归公。倘有舞弊支扯，未经清结，同业不得雇用，带学徒无论子弟亲友，均以3年为满，出备入帮费一串文归公祀神。如有违犯，不准帮贺，并公议3年停收。公议派店月捐，每家捐五千文，以助庙内烧香打油，公择总管2人，值年6人，经理牌费公项庆祝事宜，议定3年为满，遇有神庙及同业公事，即须会商议妥，不得擅为处理，以昭公允。

清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初八

《钱业营业条例》（长沙钱业同业公会颁订，1933年8月15日起实行）

（1）申汉汇票收交手续费，每千元至少以一元起码，各埠汇款亦照此例类推。

（2）短期拆放，每百元照息金市价收1至3角手续费。

（3）票贴每千元收2角至5角之手续费。

（4）各项货币交易每一元取一厘至三厘之手续费。

（5）铜元交易每一元得取一枚至四枚手续费。

（6）凡商号属于同业性质的（指非钱业公会会员而兼营金融交易的外行），如有委托交易，亦应遵照此条例。私相授受，据同业人报告查出者，每千元交易，罚金十元，以半数作本会经费，以半数提奖，并对举报人保守秘密。

三、同业公会在各个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

（一）同业公会之组织形式。

行业可以自由组合，人员不属公家编制，在同一地区内，有三家重要商业行号或两业两家工厂以上得组织商业或工业同

业公会。按章选举负责人及理监事(执监委、董事),担负同业公会任务者,均为义务职,不支薪俸。具体办事人员,大行业设有秘书及公丁数人,中小行业只设一二干事,管理综合事务,也有一些财力不济的行业,数业共聘一干事。这些人员的雇佣,同业公会完全自主,不受任何干涉。

(二) 同业公会与商会之关系。

同业公会是工商界自发的、自主的、自愿的纯民间群众组织。不论商会或同业公会都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同业公会与商会,“仅有横的联系,并非纵的组织”。这一点是要特别说明的。同业公会在有充分自主权的基础上,通过商会成为工商界与政府间桥梁,起到调节市场的纽带作用,是适应产品经济发展活跃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

(三) 同业公会经费来源和用途。

同业公会经费全部自筹,它的来源是原公所、公会时代改组为同业公会后承袭下来的固定资产(包括房屋及田产)。新兴行业及一部份小行业的同业公会是无此基础的。此外,还有行业月捐及特别捐款。前者是按月缴纳给同业公会的会费;后者系遇有地方公务需要的一次性捐款。不论月捐或特别捐款,都是按同行资本分权、分席位(如民国27年1月12日公布的《商业同业公会法》第一章第13条规定:“每一公司行号之会员代表得派1人,其担负会费满5单位者得加派1人,以后每增加10单位加派1人,但至多不得超过7人”。又第17条规定:

“会员代表均有表决权、选举权及被选举权”)摊派到人。其次各护照费、手续费也是同业公会的收入之一。如华新羽绒公司参加几次国际博览会,都是通过同业公会证明,申请取得的参展权利。因而同业公会平时收取外出护照费理所应当。又如30年代初期,本市部分经营土特产的大户,参加四省土特产品交流会,也是通过同业公会选拔组织起来的,因而在成交活动

中可以收取一定的手续费。这些费用的取得和支出，则是由同业公会中负责财务的理监事（执监委、总董、董事）具体执行，而经办这项工作的，由驻会的办事人员承揽其事。这些费用的用途，除开支一部分办公用费和雇聘人员的薪俸外，多用于支援慈善事业：如捐资举办长沙贫民救济会、乞丐收容所等；另外是支持消防事业，筹募救火经费等，既维护了本企业的安全，也受益于周围街邻。消防事业的组织有单独的，如1912年坡子街火宫殿的“乾元宫”；1947年下黎家坡的虞安救火队。联合组成的有1912年的“端角福星（新）”（即端履街、八角亭、掘源巷、新街口）；还有青石桥、青石街、东茅街共十五团保组成的多佛寺15团保救火会等等。这些消防组织名称不一，有的名水龙公所，有的名洋龙会，有的名救火会，有的名救火队。1927年一律正名为长沙市消防联合会某某分会。这些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举办，大多通过各地区所在的同业公会及殷实商户筹款进行。除上述两项而外，部分同业公会还兴办教育事业：如钱业同业公会的圣功小学；南货业同业公会的育英小学；纸业公会的忠愍小学；屠行业的养正小学等。同业公会当时能够兴学的原因：一是不少同业公会继承了行会、行帮的很多房产有余力办学；二是当时政府提倡民间办学。会馆、公会有产业而不办学者政府要提去；三是本行业、本帮子弟便于就地上学。时至今日，这种全社会办教育的风气，可供借鉴。

（四）同业公会代表的合法利益。

同业公会是承转商会及政府对本同业的任务布置，也是商民反映合法权益的代表机构。根据现有材料，有如下一些事例。

甲、保证税收、合理负担。

（1）二十年代烟酒专卖税由商会承包，商会负责人左益

斋一度出任当时的全省卷烟吸户公益捐征收处处长。三十年代初印花税承包后，钱业公会的伍芷青，也曾出任过局长，大火前后的直接税，也曾由商会出面总揽，商会承包后将任务分派到同业公会，同业公会再按照分权、分席位，分摊到企业，按期缴纳。还有房捐，屠宰税等等，也有过同样历史。

(2) 坚持合理负担，反对厘金。1928年8月1日，湘省府主席鲁涤平颁布“厘率新章”，此章程实为1925年赵恒惕主湘时的“湖南货物税则新章”的翻版，当时未遑执行。若按章一般土货亦要值百抽三征收两次，大大超过规定税率，较鄂省施行的统税更重。8月24日，省会同业公会代表结队向省府请愿，提出二条要求：“一是仿行湖北统税制；二是收回新厘成命”。当局不允，引起大哗，当场高呼“反对非法加厘”！“誓不承认厘率新章”！同时省内湘阴商民发生暴动，捣毁厘卡，包围县署，酿成轩然大波。目的虽没有达到，但也显示了工商业同业公会团结的力量和作用。

乙、兴办实业、维护权益。

(1) 1898年4月4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清廷与美国合兴公司签订由美承担粤汉铁路敷设权，经湘、鄂、粤三省绅商全力反对，一场维护权益的斗争，如火如荼，经过反复交涉，始将路权赎回。光绪三十一年（1905），以商务总会陈文玮为首的商办湖南铁路公司成立，各行各业认股比较踊跃，后张督之洞，复主借款，路权存亡，危在旦夕，商民力图抵制，一面举派代表赴京争辩，一面开修长株路线。1909年8月开工，1911年1月竣工通车。

(2) 1909年（宣统元年），陈文玮又发起组织湖南电灯股份有限公司，邀同各行各业巨贾凑银50万两，在张公桥临河设厂，初有2000瓩发电机组一套。1911年5月正式开工发电，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用户不断增加，营业日盛。同时并

呈准商部，限制外人不得在长开设电厂，防止了利权外溢。

(3) 1912年初，长沙出现官办经华纱厂，营业不振，谭廷闿三次主湘时，该厂招商承包，由商会会董黄藻奇邀请各行业投资筹组华实公司承包。其时，洋纱泛滥，土纱机坊濒临崩溃。华实经营数载后于1926年仍收归官办（即今长沙纺织厂之前身）。

(4) 加强流通领域，兴办各种银行。1913年，工商界人士朱奎峰邀新化谢重斋和长沙曹舜龙3人筹建湖南实业银行。1914年1月，湖南实业银行假长沙市樊西巷正式成立。推朱为董事长兼总经理，谢、曹副之。共招股银100万元，朱独占股本68万元，另招股32万元（内有部分官股）。发行面额1元的票币，由于该行资本雄厚又兼营茶叶和锡矿等进出口业务，声名遐迩。当时市场上，一般持银元一元须贴水三四枚铜元，方能兑出该行相等的币值1张，信誉超过湖南银行。后以国事日非，1917年，日本中日银行在长成立，市民趋于该行存储，不但无息，且需付出保管费，丧权辱国，兼之军阀连年横征暴敛，银行内部管理松弛，营业衰落，于1931年倒闭。另有民初矿业银行成立，是矿商开办的，行址设黎家坡，也发行纸币，未久即停办。抗战前之长沙市银行、长沙县银行，大部分股金皆为工商同业公会所筹集。

(5) 1932年，轮船业人士，组成民众轮船公司。日商戴生昌汽船局喧宾夺主，对“民众”航运百般刁难，包括烂价在内的各种手段，企图挤跨“民众”，但由于全国及省、市人民反日的怒潮高涨，阴谋未果，直至抗日战争爆发，戴生昌汽船局才奄奄一息，终至彻底覆灭，人心大快。

(6) 筹办自来水公司。1947年7月，救济总署结束，剩余物资中有自来水管及配套器材，市长汪浩召集市商会及各同业公会筹办自来水公司，募股100万元，商界认股一半，等委

会设鱼塘街市银行内，后由于通货膨胀，缴款者无多，终于搁置下来，解放后，阎子祥市长邀请商会和开明人士共商，再度成立自来水公司筹委会。左益斋、曹商隐、黄曾甫、李寿增等4人被聘担任筹委工作。并推黄曾甫等组成清理委员会，接收前筹委员会簿册、机件，同时退还商股，由长沙市人民政府接办。

丙、调剂市场、搞活经济。

(1) 收回永州票。1919年初，谭延闿主湘期间，军费拮据，在永州（今永州市）自印一批银元票发饷，于衡阳铁炉门外马嘶巷设立永州银行兑换处。5月，来长沙后，继续发行永币13万元，但流通不畅，令商会召集会董筹集兑换资金，商会推举左学谦等9人负责成立收回永币办事处，庶几，使永币得以流通市面，各业收得之永币，集中交办事处切角缴销，兑之以铜元，不足之数由办事处出具印收，俟后在盐牙口捐收妥后照兑。

(2) 回收“商协”时期省金库券及辅币。

北伐军需孔急，1926年唐生智进入长沙后，发行“省金库券”及辅币角票。由于信用不高，商民外出办货，均需贴水兑换中、交中钞。马日事变后金库券停止发行。而辅币仍流通市面，有时也无现可兑，商民拒收，贫苦市民叫苦不迭。7月15日，湖南省政府会同市商民协会成立回收金库券委员会，委托市商协会同各同业公会垫款代兑，同时颁发两张布告，贴在长沙总商会门口，现仿录如下：

湖南省政府布告

为布告事，案查省金库券停止使用，组织回收省金库券委员会，现已成立。兹据报以仓后街长沙市商民协会为办公地点，定期7月15日开始收换库券，除指令照准外，合行布告，各界存有库券人等，一体知照。此布。

主 席 唐生智（因公出省）

代 主 席 周 焜

财政厅长 赵恩绶

中华民国16年7月15日

湖南省政府布告

照得金库角票	原准照旧流通
本属辅币性质	以此辅助金融
市场买卖交易	与各钞票相同
现正筹备兑换	准完赋税厘金
不准拒收抑折	藉词阻碍通行
合行出示布告	其各一体凜遵

（3）解放前夕，代铸银币调剂市场。1949年春，湖南省政府迭次派员与省、市商会协议，为了调剂金融，稳定物价，一方面设置物资调节委员会，派程星龄为主任，陈芸田、陈宗陶为副主任，长驻市商会办公，聘主要行业负责人为委员；另一方面，由市商会向各工商同业公会筹集资金，拟发行物资交换券，冀图通过商会发行银元辅币，以资稳定市场。后由省银行行长李维城与市商会协商，委托金银首饰业同业公会余屏翰邀集同业在省银行内设厂，采半手工方式铸造小头（孙中山像）银元并由银行发辅币券，随到随兑，方得暂时稳定。

（4）抗议勒索、保护工商。1919年端节，书业会董张先赞执掌商会期间，湘督张敬尧出走前夕，以军警机关薪饷无着，向全市工商界索取20万元，旋又以“湖南金库券”作抵向商会“借”款40万元，张先赞力陈商场困难，义正严词加以拒绝，致被张督关押，商会又推出萧莱生等出面交涉，勉强应付，旋因张督被驱，此事方告结束。

1920年夏，南军云集省城，6月26日，长沙总商会以督军

谭延闿向商会“借”款100万元，召集各工商同业计议，要求减少50万，并发行临时兑换券，作三期缴纳。谭不许，限令半月内缴出20万元。商会只得按款分摊，至7月2日，尽力搜罗，勉强凑银15000元。谭见情形如此，仍不放松，令商会召集各同业公会（行帮）的殷室富户，发行临时军用兑换券，至7月17日，经各会董多方筹措，勉力应付，市场始免骚动。

1920年6月28日，长沙总商会对代办军需的经常活动，应接不暇，经各业会董吁请总商会呈请护国军总司令谭延闿予以解除，文曰：“张敬尧军队来湘，兵商交易，言语不通，动有齟齬，本会不得已领洋万元，为之代办物品，以保商场。乃此例一开，遂成习惯，本地各营兵之索物者，犹复纷至沓来，日不暇给，甚至荷枪结队，拥挤喧哗，叱咤追呼，迫如星火，拒之则恐生恶感，应之则无可腾挪。困难情形达于极点，以至在会办事诸会董，睹秩序之紊乱，休威武之凭凌，皆视本会为畏途……”。虽然效果不大，但尽到了维护工商界利益的责任。

（5）仲裁劳资纠纷。1926年秋至1927年春，大革命时期，劳资关系紧张，店员及手工业工人，要求改善待遇，增加工资，甚至发生口角冲突。苏广业、估衣业（成衣业）、豆麦业、杂货业等同业公会的店主也申诉其苦，经过分别协商仲裁未果，苏广业店员上街游行请愿，罢工一触即发。后经大会小会10余次研讨，无法取得进展，谈判几濒破裂。最后由同业公会请市商民协会出面，经过充分协商，在郭亮和朱剑凡支持下，由商协左学谦主持会议（参加的人，还有李维汉和陈龙骧）经仲裁六条意见：即年终提红利百分之三十为店员福利基金；五、八、腊发双薪；婚丧病假、开会、学习不扣工资但医药费自理；工时每日不超过12小时，延长时间发工资一角，每日休班两小时，超过时间应扣工资；学徒进店投师和3年期满出师酒，一律取消，不得任意辞退；学徒出师后帮师一年，每

月发工资2元，其余按3、4、5、6、8元，管事16元。以上经双方代表同意后签字，一场迁延达两月之久的劳资纠纷，经过商协和同业公会的努力终获解决。

(6) 同业议价。米业、花纱、钱业、绸布、卷烟等行业，都有同业议价的行规。即各店、坊、行、号每日开市前，约集到同业公会共同议价，通过参加议价的“上街先生”把行情反馈到本字号中去，以便共同遵守。长沙大火前开始，市商会集资筹办了《商情导报》八开版，日出一张，普遍发行，专门刊载各个同业公会送来的“当日行情”，这不但便利了同业，也使市民购买物品时心中有数，这比现今某些不法商贩漫天要价要强百倍，该报火后一度停刊，旋即恢复。沦陷时再度停刊，抗日战争结束后再次恢复。直至解放初停办。社址设在皇仓湾。

(7) 培训人才，办理公益。旅业同业公会主席曹商隐，在长沙大火后任商会常委时，发起在司马里黄氏试馆内创设求实会计补习学校，由各业同业公会保送或推荐学员学习新式簿记。解放初，市工商联筹委成立后，由烟业陈焕焘、颜料业梅子刚，剪刀业蒋秉承等在辅导委员会指导下，继续在坡子街钱业公会主办会计人员训练班。培养了不少新式会计人才，以适应当时工商登记，征收税收，清户核资之需。

关于办理公益，已在“同业公会经费来源、用途”中说明，这里不再重述。

附录一

长沙市会馆、试馆、宾馆、同乡会一览表(1935)

会馆：

广东会馆	安徽会馆	新安会馆	浙江会馆
江西会馆	安成会馆	临江会馆	庐陵会馆

丰城会馆	江苏会馆	江南会馆	滇黔会馆
福建会馆	湖北会馆	四川会馆	资兴会馆
邵阳会馆	中州会馆	云阳会馆	金庭会馆
山西、甘、陕三省会馆			

宾馆：

穗都宾馆、昭武宾馆、文江宾馆

试馆：

安仁试馆	靖州试馆	宁乡试馆	衡清试馆
城步试馆	会同试馆	黄氏试馆	彭氏试馆
茶陵刘氏试馆			

同乡会：

江西同乡会	安徽同乡会	江宁同乡会
攸县同乡会	茶陵同乡会	安化同乡会
新宁同乡会	醴陵同乡会	新安同乡会
平江同乡会	湘阴同乡会	桂东同乡会
常宁同乡会	邵阳同乡会	武冈同乡会
临湘同乡会	衡山同乡会	蓝山同乡会
岳阳同乡会	永兴同乡会	湘乡同乡会
新化同乡会		

附录二

早期的公所名单

淮商公所（福源巷）	生药公所（轩辕巷）
铁业公所（中东长街）	资生公所（藩城堤）
轩辕公所（轩辕殿）	丝业公所（下黎家坡）
煤业公所（三尊里）	集贤木商公所（上六辅街）
鲁班庙石业公所（里仁坡）	船业公所（盐运街）
棕业公所（路边井）	烟业公所（三尊里）

米业公所（织机巷）	鞋业公所（乐新巷）
益阳公所（下东长街）	茶陵木商公所（上六铺街）
鱼帮公所（牛皮墙）	铜业公所（尚德街）
绸布业公所（白马巷）	湖南运磺公所（上六铺街）
纸业公所（小乐嘉巷）	篾业公所（东长街）
云运公所（青石井）	长沙箩业公所（谢词坪）
裱业公所（阿弥街）	漆业公所（东长街）
杠行公所（仓后街）	南帮鞋业公所（义以成仁）
书铺公所（史家巷）	

附录三

清末长沙公所、公会、官、堂、会、庙一览表
公所：

钱业	米业	线业	酒业	烟业	铁业
漆业	染业	裱业	缝衣业	机坊业	木材业
屠宰业	纸扎业	柴行业	煤船业	煤栈业	面馆业
豆腐业					

其中：裱业又称梅葛公所；豆腐业又称淮南公所；缝衣业又称轩辕公所，其他均冠以本业名。

公会：

纸业	茶业	瓷业	药业	香业	南货业
油盐业	古董业	草药业	山货业	荒货业	眼镜业
照相业	纸伞业	纸扇业	靴鞋业	草席业	藤业
轿行业	箩筛业	马鞍业	篾笼业	碓坊业	推磨业
砖瓷业	船行业	轮船业	大箩业	木器业	茶馆业
旅馆业	豆麦业	鸡鸭业	糕点业	铺垫业	经沟业
理发业	吹鼓业	镬锅业	镜箱业	绒花业	人力车业
牛骨制品业	盲人算命业	麻线带子业			

其中：古董业称翠湖公会，马鞍业称马王公会，吹鼓业称音乐公会，绒花业称天孙会，南货业称万育群生会。其他均冠以本会名。

宫：酒席业又称詹王宫

堂：妓户业又称清音堂

会：泥木行、石行统称鲁班会

庙：戏班业又称老郎庙（黎园公所）

附录四

长沙市同业公会一览表（1933年）

五金业	花粮业	纸 业	脚踏车业	人力车业
电料业	钟表业	苏 广 业	颜 料 业	竹木业
苏食糕饼业	豆腐业	印 刷 业	眼 镜 业	丝制业
粤汉株萍铁 路转运业	旅 业	绸布匹头业	药 业	钱 业
烟 业	皮 业	京广杂货业	煤 业	牛肉业
浏阳豆爆业	酒酱业	绣 业	葛夏布业	西法洗染业
染布业	鱼行业	瓦 货 业	靴 鞋 业	炭 业
毡毯业	杂粮业	酒 席 业	皮 衣 业	油盐花纱业
石灰砖瓦业	染织业	粮 栈 业	荒 货 业	山货牛皮业
漆 业	书 业	运 输 业	照 相 业	卷烟业
针织业	轮票业	经理保险业	南货土果业	大箩业
屠行业	猪行业	笔 业	米 业	碗担荒货业
呢绒皮革业	盐 业	猪 油 业	糖 坊 业	估衣业
豆豉业	浴 业	大箩荒货业	鸡鸭腊味业	古玩业
磁 业	铜冶钉业	蛋 行 业	玻 璃 业	油焦煤业
湘岸盐运输业	油盐糟坊	杂货业	金 银 业	而食业

皮箱业 茶、纸、玉兰片业 雨伞业 制业

湖南火酒业（又名公所，未成立）

注：据《长沙市指南》三版（1935）中，有关同业公会记载，较民国22年《湖南年鉴》少苏食糕饼业、运输业、大箩业、盐业、豆豉业、浴业、磁业、湘岸淮盐运输业、雨伞业、湖南火酒业（未成立）共10个行业；而《湖南年鉴》（民国22年版）与《长沙市指南》（邹欠白著）比较又少新到药业、报关运输业、银行业、国医业、律师业等5个行业（编者）。

附录五

长沙市同业公会一览表（1942年）

漆商业	油盐花纱业	油行业	酒席业	估衣业
制糖工业	国药商业	陶瓷瓦货业	铁器商业	纸商印刷业
针织工业	寄卖商业	绸呢布商业	面粉工业	建筑业
洗染工业	肥皂工业	烟作工业	石灰砖瓦业	制箱工业
轮票业	大箩荒货业	煤炭商业	刺绣业	鱼行业
南货土果业	豆麦膏曲业	编炮豆豉业	生花业	茶叶业
玻璃商业	瓷商业			

附录六

长沙市各商业团体负责人名册（1947年6月）

长沙市商会 崔伯鸿	长沙市糟坊
杂货商业 陶宗陶	银行商业 侯厚培
铁器业 黄达望	金银首饰商业 余屏翰
人力车商业 左学谦	中西衣庄皮货商业 左学谦
大箩碗盏商业 盛锡昆	靴鞋工业 刘生柱
杂粮膏曲商业 张凯云	笔墨工业 彭宗安
旅馆商业 许泳皇	炼制工业 张宗鉴

纸张、印刷商业	柳和初	染坊工业	徐天锡
南货土果业	王维翰	营造工业	袁绍棠
百货商业	舒瑞昌	石灰砖瓦业	张聘良
五金电料商业	沈金鉴	水果商业	周云森
油盐花纱商业	易之一	糕点糖果商业	曹岳
屠坊商业	王昌贵	颜料商业	崔伯鸿
新果商业	罗恒松	卷烟商业	萧哲臣
铜商业	沈福昆	沐浴商业	刘华庭
鞋料番线商业	张春华	猪行业	王仲康
宴席商业	胡伏	玻璃商业	王春篪
植物油输出业	陶伏生	钟表商业	钟裕乾
第四区印刷工业	刘士安	竹木商业	戴建生
第二区机器工业	张灏	丝绸呢绒商业	郑增荣
第二区碾米工业	谢绍秋	布商业	郑增荣
鱼行商业	万海南	估衣商业	朱鸿宾
寄卖商业	王定宇	古玩商业	黄铁安
戏剧商业	梁月波	编炮豆豉商业	王伯常
猪油商业	廖华庭	山货商业	盛宗武
瓷商业	王嘉祺	图书教育用品商业	韦兰生
桔饼商业	李立雄	土果商业	王世传
鸡鸭腊味商业	骆林生	砖瓦工业	沈绍三
瓦货商业	沈镜吾	临时电灯厂工业	陈德珊
轮船旅票商业	胡海泉	制革商业	张应祥
钱商业	李寿增	寿服工业	邓克琴
仓库商业	李寿增	皮件工业	刘健革
木器工业	韦振武	酒作工业	罗树声
土果杂货行商业	彭桂生	酱园工业	谢菊生
运输商业	熊桐荪	皂烛工业	文石峰

茶商业	孔松筠	刺绣工业	王梓林
面食商业	甘寿彭	化妆工业	李孟祺
面粉制面工业	谭雅度	西染工业	谢松林
伞商业	陶洪茂	烟作工业	陈德瑞
保险商业	顾仲廉	猪棕整理业	包觉平
脚踏车商业	胡镇鑫	帽工业	杨文远
夏布业	蒋健	照相工业	陈寿眉
眼镜工业	棕荫	汽车商业	谭常凯
土布工业	梁国栋	轮船商业	姜求忠
国药商业	郭厚坤	漆商业	张惠民
蛋商业	刘东云	第一区肥皂工业	文石峰
民船商业	谢琼	第二区金属冶制	刘基磐
煤炭商业	沈厚强	报关业	胡则民
棉花粮食商业	任性村	保险业	梁硕甫
茶食商业	彭海清	第二区针织工业	夏宇平
制糖工业	王梓林		

附录七

长沙市各工商业同业公会名册（1950年1月）

银行商业	百货商业	卷烟商业	国药商业
汽车商业	第四区印刷工业	靴鞋工业	瓷商业
编炮豆豉商业	烟作工业	制糖工业	浴堂商业
估衣商业	帽工业	糖果饼干工业	眼镜工业
寿服工业	鸡鸭腊味商业	铜商业	仓库商业
槟榔商业	盐运商业	钱商业	南货土果商业
第二区碾米工业	颜料商业	第二区针织工业	中西木器工业
刺绣工业	旅馆商业	猪行商业	肥皂工业
营造工业	图书教育用品商业	鞋料番线商业	西染工业

漆 商 业	水果商业	瓦货商业	大箩碗盏荒货商业
蛋 商 业	皮件工业	猪棕整理工业	寄卖商业
丝绸呢绒 布商业	土果杂货 行商业	棉花粮 食商业	织染布工业
煤炭商业	杂粮膏曲商业	新药商业	宴席商业
酒作工业	玻璃商业	面食商业	糟坊杂货商业
笔墨工业	制革工业	枯饼商业	猪油商业
五金电料商业	茶 商 业	运输商业	草席商业
刀剪工业	油盐棉花纱商业	土布工业	纸张印刷商业
土货牛皮商业	竹木商业	茶食商业	植物油输出商业
暑行商业	酱园工业	鱼行商业	第二区机器工业
石灰砖瓦商业	丝制工业	铁器商业	钟表商业
照相工业	人力车商业	轮船商业	戏剧商业
香干工业	湖南面粉公司	磨坊制面工业	中西衣庄皮 货商业
天伦纸厂	湘中火柴公司	电灯商业	酒菜饭馆商业
布伞工业	民船商业	簿账摺工业	公营建湘 农产公司
民营工厂联谊会	寿坊工业	制被丝棉工业	炒坊工业
脚踏车商业	公营和车火柴公司	石油商业	打纸商业
梳篦工业	度量衡工业	砚池工业	同济火柴公司
葛夏布商业	甜酒粉馆商业	纸伞工业	花纸工业
香烛工业	私营烟厂联谊会	(其中有些联谊会、公 司、工厂参加商会为直 属会员，不属于行业公会)	

长沙市卷烟业同业协会的回顾

黄曾甫*

清末民初，长沙市经营烟业者，有闽、本两帮，主要以贩卖条丝烟和土产烟叶为业。闽帮专营条丝烟，由福建人在长开店，其中以汀州、永定、上杭等处客商为多。最早开设在下坡子街的大同烟号，出品的《仙女图》丝烟为最著名，曾经国民政府实业部注册，列为第一名烟。其次如坡子街的黄福昌、红牌楼的百川东，青石桥的赖复新、大西门的赖日新等烟号，均为闽帮名店，历史悠久，资本雄厚，由福建产地雇工肩挑所产烟叶，结队经江西间道运来长沙。店后设有作坊，自扎自切自制，独占市场，风行一时。直到20年代初，纸卷烟进入长沙，丝烟始逐渐衰落。本帮是切丝烟小店为适合本地劳动大众的嗜好，自办宁乡出产漂叶，切成烟丝出售，名叫切丝烟，质粗味苦，销路不广，且多属夫妻商店，自产自销，本小利微，开设在小西门河街一带。

闽帮烟业原设公所于鱼塘街闽省会馆之内，后因与本帮争夺市场，互相约制，协商在三尊里成立烟业公所，由闽帮当总管，本帮当值年，一切大权均操在福建客商手中。当时在长沙市商会中，仍只能算是小行业，占有一席代表地位而已。三十年代中，福建赖复新烟号的后人，出了位赖琰，当上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主任（亦曾称特派员）。烟业一度因而进入市商会当选理、监事。

自二十年代初开始，外商卷烟大量涌进长沙市场以来，市民为图方便，趋向时髦，加之外商不惜代价，巧取豪夺，尽力

* 黄曾甫现任湖南省、长沙市工商联顾问，省市两会文史委主任。

倾销，市民弃烟袋而改吸纸卷烟者，与日俱增。据三十年代中史料调查，每年长沙市纸烟消耗入口在六、七千万银元以上（含由长分销到全省各地）。其中以英美烟公司为第一，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次之，大美、华成等上海烟厂的出品，亦颇不恶。全市经营卷烟的烟行烟店，计有五十余家，均系经销承包外来卷烟性质。英美出品的《哈德门》、《强盗牌》、《小大英》、《三炮台》等牌卷烟，由均益公司总经理；南洋出品的《白金龙》《黄金龙》等，由汉记等十六家承销；大美出品《金鼠牌》等，由裕丰长等十六家经销；华成出品《美丽牌》等，由福利公司独家经理，这些烟商与上海各中外烟草公司签订合同，独揽湖南卷烟市场，以长沙市为根据地，延伸到湘西、湘南各中小城镇倾销，设置分销网络，因而发财致富者，顾不乏人。有些卷烟经销商亦如煤油商一般，人亦称为“买办”，“大班”等。商店日增，市场益广，乃有卷烟业同业公会之创建，而取代烟业公所之权力。同业公会址在西牌楼，湖北汉阳人肖哲臣当选为理事长。后来肖一度还被选为市商会理事、会计科长等职务。抗战胜利后，又竞选当了长沙市参议员。从此卷烟业一跃而为长沙市大行业之列。此时原有的烟业公会已分化为卷烟业公会和烟作业公会两个团体。当年长沙市一位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彭虞陔老前辈，目击外来卷烟，充斥市场，欲图挽回权利，经过艰苦创业，于1927年一度创办华昌烟厂，自办小型机器，制造《美曼丽牌》卷烟，无如资金短缺，技术力弱，无法抵制外地卷烟之侵入，苦撑三年，终告停业。直到1941年前后，武汉、广州相续沦陷，外商被迫退出市场，进口卷烟来路日少，本地手工卷烟应运而生。此时华昌烟厂亦得到复苏，恢复生产一部份机制卷烟，但生产有限，供不应求。据省志史料记载：机器卷烟生产，悉遭沦陷，烟价高涨。于是手工卷烟风起，长沙组织完善之卷烟工厂达五十六家之多。虽仅华昌一家

使用（小）机器，整个手工卷烟工人达万人以上，日产卷烟达四十大箱以上。同时重庆国民政府财政部设立卷烟专卖税局，在衡阳设立湖南分局，长沙设立办事处（主任为广东人李寰平，办事处设北门外大王家巷）。长沙征收的卷烟专卖税一度（42—43年）居全国之冠。专卖税、直接税、地方税捐等均视长沙手工卷烟业为一块肥肉，大家都想问鼎。但手工卷烟工厂，当时多系一哄而起，漫无组织，也多未参加过去的卷烟业同业公会，面临许多问题，无法应付。笔者当时亦与友人合营东南烟草股份有限公司于浏阳门外白马庙，经常与手工烟厂同业联系，乃互相集议，筹组长沙市卷烟工业同业公会，报经市商会转报长沙市党部批准备案，经过与亚中烟厂曹运钧等负责筹备，登记会员，租定会址，召开成立大会，公推华丽烟厂董事长徐天锡为理事长，东南烟厂总经理黄曾甫、亚中烟厂总经理曹运钧，大城烟厂总经理孙稚屏三人为常务理事。华中的肖哲臣、三锡的张锡三、兴业的夏锡璋、金城的孙大寒、百合的陈天佐、金蕾的刘孟坚等七人为理事，华昌的刘山鳌、新湘的熊少谷等三人为监事。旋徐天锡当选为市商会理事长，公推常务黄曾甫代理卷烟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公会设在东茅街潇湘酒家隔壁，聘有秘书（陈石丞、刘掬泉）二人，干事蔡锡昌等二人，通讯工友一人，负责开展会务。凡在长沙开设卷烟厂者，均须老会员二家介绍，先申请加入公会，经过调查，审核资金设备，认为合格，乃转报有关方面，发给营业执照。各会员厂家按资金业务大小，分为甲、乙、丙三级，按级向公会缴纳月捐。同时卷烟同业公会，又须按全行业资金及营业额的比例，按月负担上缴市商会月费。当时长沙市历居首位的钱、绸、金三大行业，多已迁徙收缩，退出市场，因而卷烟工业后来居上，按照当时比例，卷烟工业所担负市商会的经费，几达一半以上，成为长沙市商会中的主要首屈行业。

香烟工业同业公会制订一套制度，每周召开常务理事会议一次，每月召开全体理监事会议一次，会后由代理理事长率领秘书干事执行，处理日常工作。由于当时的特定市场地位，每日应接，亦颇烦忙。每日上午九时，还有一个会外的碰头会，在南正街三锡烟厂营业处饮茶集会，自愿参加的烟厂负责人或代表（经营烟行者亦可参加），按时前往商议烟叶、令纸、香精的进价，及互相品评各厂所出产的手工卷烟的质量和出厂价格，取得互通信息，平抑货价，调剂有无，相互监督，自相约束的作用。虽无明文规定，但能共同遵守，互相维护。即是发扬同行议价，横向联营，自理自治的优良传统，增强了公会服务功能。

卷烟公会当时还起了一些应付政府协调关系的桥梁作用，如市政府要摊派慰劳伤兵、筹募公益捐款，市党部要筹办市民日报募集基金及招登广告等等额外需索，省建设厅京剧团来长演出，委托长沙警备司令部派销戏票等等，都是通过同业公会接洽，协商承办，合理分担，减少各方直接去与各厂家摊索的麻烦。特别是征收税款，商标注册、建厂立案，运销采购证明等业务，如果没有通过卷烟工业同业公会签具意见，盖章证明，税局及各有关部门，均不予受理。同业公会既有管理监督会员之权力，亦有代表会员合法利益和为会员服务之责任。例如1943年夏，传来重庆专卖总局派了副局长谭襄（谭延闿之侄）来湘视察，有要提高卷烟专卖税（出厂税）之说，全市烟厂闻讯，徬徨无计，同业公会星夜召开紧急会议，推举黄曾甫、孙稚屏、熊少谷三人为代表，驰赴衡阳，前往当面陈述湘北三次会战损失惨重，长沙满目疮痍，市场冷淡，烟厂生产濒临前线日处危机，分析裕课恤商的利害，如果政府加税竭泽而渔，必将自食饮鸩止渴之苦。请求维持原有税额，不能加征。几经交涉，得到谅解，长沙各厂方得安心维持生产。还有一次是在

1944年春节前夕，冰雪载途，交通阻隔，运输发生严重困难（当时长沙手工卷烟，要装箱由小火轮运至湘潭板塘铺，再转火车运到衡阳，再装汽车运到贵阳集中，分运云、贵、川三省进入市场。原料来源，也很困难，广东南雄的烟叶，又要由火车、轮船，几经周折，方能运来长沙。令纸香精等，要靠浙赣铁路，走私进来），一旦天时不利，成品积压，资金周转失灵，工资伙食都无法维持。当时长沙直接税局（设在北门外，局长向日华）限期在旧历除夕以前，务须完缴入库。各厂焦头烂额，一筹莫展，纷纷到同业公会诉苦。公会乃与市商会研究，由卷烟工业同业公会出面，央请市政府、市党部、市商会共同担保，要求直接税局体谅实情，延期半月，到次年元宵节后入库。各厂始获喘息，度过年关。当时如果没有同业公会组织出面，运用各方力量，而由各个厂家单独作战，是无法解决以上两大问题的。

最重要的是当时还隐藏着一个严重的劳资关系的矛盾，已如箭在弦上。因为烟厂职工共有万人，工人来源不一，除极少数是各厂股东厂主由亲友引荐而来者外，绝大部份是雇用招来，其中女工、童工亦复不少。自从文夕大火以后，长沙的工会组织大多停顿，卷烟工业历无工会组织，工人意见及存在问题，无处可说。其时有的烟厂在工人雇入辞退的手续极不完备，人工资标准产品定额都没有统一规定，生活福利，各自为政，大小烟厂，各行其道。在工资发放及福利待遇中，参差不齐，造成混乱，互相攀比，时常发生争吵，矛盾重重。卷烟工业同业公会有见及此，及时约集各厂各项工种的工人代表开会，征询意见，进行劳资双方对面协商，共同制定雇用、辞退、奖罚条例，以及制烟、包烟、切烟、抽筋、切纸、装合等一系列工种的工资单价，定额标准，改计时为计件付酬。不仅保证了工人的合理按劳收入，取到多劳多得的利益，也维护了厂方的正

常生产秩序，消除了矛盾，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还有件事也值得一提，由于卷烟工业同业公会与当时政府税局关系处理比较好（即今日所谓公共关系），有时政府颁发的政策法令，不通过市商会而直接发来卷烟同业公会，公会又能及时转知各厂家，信息更为灵通，也有利于各工厂生产计划的安排，而能不失时机，发挥自身的主动性。凡此种种，同业公会既代表了会员工厂的合法利益，又尽力地做到为会员企业服务的作用。会员对公会之间，无形中增加了凝聚力与向心力。这个非常时期的同业公会也相应真正起到了民间群众团体自我管理、自我协调、自我服务、自我约束这些方面可起和应起的作用。

1944年卷烟工业同业公会中少数同业人士出于对京剧的爱好，还组织一个《公余票社》，吸收了警备部、九战区、海关、税局一些京剧爱好者前来参加。因而对前方战事的消息，比较容易听到。当是年5月湘北四次会战长沙沦陷之前夕，疏散工作相当紧张，由于公会通过这些关系，得讯较早，得到的方便也较多。如雇用民船运输，疏散职工家属，皆能有条不紊，顺利进行，通行无阻，损失较小。笔者当时携带卷烟工业同业公会印信公文，偕同干事工友，从长沙出发到衡阳，转桂林、柳州、贵阳到重庆，沿途协助同业烟厂办过许多因军队扣留民船、汽车的交涉，以及迁厂疏散登记的证明。后来东南烟厂在贵阳复业，亚中、金城、大城等厂迁到重庆开业，华中烟厂远迁万县的经过中，长沙市卷烟工业同业公会利用各种关系，还起过一些作用，为会员工厂解决过某些可以理顺的困难。

长沙沦陷以后，也有个别的手工卷烟厂未及撤出，有胡某在1944年冬，在坡子街办过临时的金雷烟厂。但日军已由汉口运来大批《旭光牌》机制卷烟，手工卷烟当然失去了市场，而无法维持。

1945年秋，抗战胜利之后，不久市场恢复，许多烟业人士争购机器，重建厂房，陆续在长沙创建八大机器卷烟工厂，如欧亚、利丰、大业、联兴（即原华昌改名）、新中、华中、美孚、大德等。但没有恢复卷烟工业同业公会，只有卷烟商业同业公会，仍由肖哲臣（华中烟厂经理）任理事长，丑凤陔、舒元定（做卷烟商行的）为常务理事。改称卷烟业同业公会，办公地点设西牌楼，秘书为李某（名佚）。

1949年夏初，大军南下，武汉解放，反动政权日暮途穷，滥发纸币，通货膨胀，长市商场一片混乱，卷烟业公会理事长肖哲臣出走香港，公会工作陷于瘫痪状态。

通过中共省市工委分途派员对工商界进行大量工作，一些工商界进步人士在党的领导下，纷纷组织各种进步组织，如民营工厂联谊会（在利华橡胶厂开会），新商人协会（在太和米厂开会），经世学会（在司门口同华金号开会），纷纷开展护厂护店活动，照常开业，稳定市场，迎接解放的宣传活动。私营烟厂同仁有见及此，也集议联合起来，以利应变迎解。笔者当时与福建人王道宣合营新中烟厂于南门外大雨厂坪。大家要求筹组私营烟厂联谊会，以代行卷烟业公会职务。当推选新中烟厂董事长黄曾甫为主任，欧亚烟厂经理黄志新、利丰烟厂经理黎罗生为副主任，王道宣（新中）、杨振初（华中）、彭镜吾（联兴）、宾岳生（大业）等为委员，李世春为秘书，办公地点设在南正街欧亚烟厂营业所内。又与市商会取得密切联系，黄曾甫又被推选任市商会常务理事，积极参加市商会的应变会及省市和平自救会，为筹划经费，支持迎解，作过不少工作。

解放后，私营烟厂联谊会还为欢迎市税局派员驻厂，筹募支前借款，春节拥军优属，动员去港同业回归及组织北上参观，作出过努力。

1950年春，肖哲臣响应号召，由港返长，卷烟业同业公会

随又恢复活动，改推大业烟厂经理宾岳森为理事长。私营烟厂联谊会至此完成了历史任务，即宣告撤销。

1951年后，在长沙市工商联的领导下，卷烟业同业公会积极认购胜利折实公债，参加评税缴税，重估企业财产，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

全国卷烟工作会议之后，国家加强计划管理，纠正卷烟生产盲目发展状况，长沙市卷烟工业首当其中。1950年夏，新中烟厂即率先转让与湖南军区后勤部接办，改为国营建湘烟厂（即长沙烟厂前身）。大德烟厂因经理久滞香港不归，陷于停顿。及后五反运动开展以来，加上各方面原因，欧亚、利丰、大业三厂，相继停业，遣散员工。美孚也因故相继结束。华中、联兴二厂出品《白毛女》《鸭绿江》机制卷烟，由省百货公司监制包销，后转入专卖。1953年夏，联兴烟厂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奉准转业，在市产联工会大力支持下，年老职工合理遣散，中青年职工作了妥善安排，除劳动局转调充实有关单位企业50余人外，经理彭瑞强与长沙面粉厂负责人谭晓洲另组五一线带厂（市经编厂前身），卷烟机械设备与华中烟厂联营，厂房合并于联华被单厂（长沙床单厂前身），各安排职工40余人，信息传开，对稳定当时长沙工商界情绪，起了积极作用。至此，烟业会员既多转向，发生了变化。卷烟业同业公会也相应地并入其他工业小组。

1955年，华中烟厂公私合营，后迁郴州，更名为郴州烟厂。长沙烟厂就在长沙一枝独秀了。（以上资料得到原联兴烟厂彭瑞强经理补充核对，并此致谢。）

长沙酒酱业同业公会

杨昌炳* 彭芝亮*

长沙酒酱业同业公会始于同乡会，开始由苏帮（苏州人），设立苏州会馆，尔后逐步发展，增为苏南（南京人）、本（湖南人）、浙（浙江人）四帮，均各自设立会馆，如浙江人设立浙江会馆等。帮内同仁集资组建会馆拥有较雄厚的财产，会馆负责人，由有一定权威的人担任，对内团结协作，对外协调各方。帮内各店，非同乡人不得雇用，既来之无论股友、雇工、学徒一律安家落户，对生养死葬负责，有难互帮，共谋发展。

由于从前并无公所公会，酱园行业各店，多系酿酒制酱综合性经营。至清代咸同年间，因乡间贩酒者充斥城市，城区酒业同仁因维生起见乃组织酒业公会，禁止乡贩进城卖酒，乡贩进城卖酒者，须入酒业公会，方许肩挑贩卖，否则扭送官厅究办。又勒令城区酒业领照纳税。此后，酒业遂成为正式行业。至光绪初年，酒业销售日广，新添之店愈多，抢行夺市，低价滥卖者，时有所闻。为整顿行规计，邀同业开会议决，每家收牌费银洋20元，公举总管2人，值年6人，总管三年一任，值年一年一任。每日酒价行市，由各店上街者按日至酒业公会共同议定，划一价格，不得有私自涨落之弊，违者罚处。至民国初年，警察厅抽收酒业执照费，该业同仁，因税赋日益加重，营业维艰，又召集同业开会议决，将酒业公会名义取消，购置孚嘉巷房屋一栋，改为酒业公所，以公所名义向杂税局统

* 杨昌炳原系中共长沙市蔬菜公司党支部书记。

* 彭芝亮原系长沙市酒酱业同业公会主任。

一承包，按月由公所向杂税局缴纳酒税，公所内推举一主任、一文牒、一会计，其费用在所收各户月捐项下开支。1929年公布工商同业公会法，改为长沙市酒酱业同业公会。

同业公会是在有关同乡会的基础上，为求生存求发展自愿组建起来、为工商同业公会法所认可的，具有一定法律地位的民间自治性组织，它代表了会员利益，并为会员服务。它在以下方面发挥了作用：

（一）开业歇业

开业：凡新开厂店须先报经公会审查，除经营性质、经营范围、经营方式、资金、人员所必备的条件外，对开设地址，须根据市场需要进行综合平衡，确定有无开店必要。对在繁华街道开店的规定是：对面左右侧，上隔七家，下隔八家，避免互相争夺。对已歇业，迨后复开，无论本人或亲属，均按新店章程办理，违者稟究，新开设店必须交牌费，如顶置改牌者，仍按新店出牌费，新开设店一经同业公会审查报工商部门批准开业者，即具有会员资格，并履行其权利与义务。

歇业：凡因营业不振，无力继续经营的铺店，需歇业者，必须报经公会查明原因，能扶者则发动同业共帮，以利继续经营，否则批准歇业。该行业除文夕大火被毁十七家无力复苏外，在此前后歇业者寥寥，且发展户数有增无减。

（二）统一价格。

购进原材料定价：凡购进原材料，在史家坡河西梨、湘潭等各鲜菜加工原料基地者，均由经纪人负责对口联系，由公会统一议价，各酱园不得自行抬价或压价收购，违者议罚。凡经纪人联系好的产销对口，在价格、质量、数量、时间等方面的协定，双方必须履行，如一方违约，公会出面仲裁解决。但

由于双方对经纪人的信赖，很少有不守信的纠纷。经纪人对双方生产进行了可行的安排而得到双方的信赖，因此口头协定胜似成文协定。

销售定价：凡本业产(商)品，均由公会议定统一价格，不定期印发送各店户。各店户必须遵照执行，违者议罚。对各店衡器、量器，每年进行一二次检查，无合格标记者不准使用。

(三) 税 收。

纳税是会员必尽的义务，公会为维护会员合法利益，除督促会员按期交税外，对确有困难无力纳税的会员户，则与税务部门协商，提出减免意见，以利继续经营。建国后到公私合营以前，公会专设有公会、工会、税局所组成的税评会，对保证国家税收，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

(四) 协调各方。

同业公会起着协调会员之间关系和社会各方关系的桥梁作用。解放初期，支前借款，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第一个五年计划，购买胜利公债等均经由公会统筹安排，根据各会员户的不同情况分配任务。由于公会对各户情况比较了解，分配比较合理，因而都能顺利完成任务。凡有重要问题，通过公会与工会所组成的劳资协商会议解决，如六项措施的落实，分配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使“五反”后曾一度低沉的企业很快恢复了生机。

(五) 行规店约。

行业不成文的规定、规章、制度，自古有之。如跨业经营、无保开店、无证开店，掺杂使假、短斤少两，变相涨价、抬价压价、抢行夺市、聚众赌博、奇装异服、买空卖空、投机

倒把、超越比期久拖货款、冒牌顶替等都属违规。合股经营的
在职股东或业务人员不得利用职务之便经营与本业（本店）有
关的业务。凡有赌博、偷窃行为又屡犯不改的，无论在职股
东、雇工、学徒，都给以口头通报，全行业不得雇请。招收学
徒要有可靠的介绍人作保证，并写徒师字（1927年取消）。这
些规约在1938年文夕大火以前是执行得比较认真的，行业得以
正常发展。文夕大火和1945年抗战胜利后，由于外来新增之
店（贩）日多，变相滥价、不顾产品质量、抢行夺市等混乱现
象时有发生，虽有公会管理，行规店约的执行情况就大不如前
了。

长沙西药业的药品质量和物价管理

马国奇 * 李家赞 *

西药行业既不是大行业，也不算小行业，在未成立同业公会以前，附属于苏广业（百货业）。追溯历史，长沙市开设药店最早的是日本人。他们经营杏林堂和广贯堂，日军侵华后，在中国人民抵制日货中关闭。后来在长沙陆续出现了一些药房。如坡子街的中西药房、新坡子街的五洲药房、金线街的中英药房、南正街的华英药房等。这些企业资金最多的有一、二万，最少的三、五千，经营的品种约500种，货源主要来自上海、广东。后来，药房由几家逐渐增至80余家，从业人员达300多。

同业公会正式成立于1938年文夕大火前，首届理事长为程前鹄，换届继任的有周海泉、沈印心、罗桓松、庄表富等。同业公会会址设在学院街，建址费用由会员企业根据营业额的大小分摊负担。从购置地皮到基建房屋共耗资5000余元（银洋）。同业公会设理、监事会，理事会有委员7至9人，监事会有委员3人。常务理事连任的有罗国钊、马国奇，监事会由罗寅基驻会管理日常工作，所有理、监事除驻会工作的有薪金外，其余均为义务职。

同业公会在培训新药人才，提高职工技能和服务素质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西药业不同于其他行业，它有较强的知识性和技术性，它关系到人民身体的健康。从事这一工作的人，不仅要具备药理知识、医务常识，且要有一定的外文水平，因为，进口药是外

* 马国奇曾任长沙西药业同业公会常务理事。

* 李家赞原经营西药业，现为长沙市工商联会员。

文，医师处方是外文。他们还要熟悉药品的性能，配伍禁忌、用途和服用剂量等。若不熟悉业务，就难辨真伪，就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因此，西药业同仁对人才的培训极为重视。早在1933年上海市西药业举办药学进修班，给长沙市新药业分配三个名额，我们选派罗寅基、汤念观、李雁菁等赴沪学习，取得药剂士资格。这一举动在青年中掀起了学习热潮，多数人都报名参加了青年会组织的英文学习班。由于是自觉地参加学习，所以都很用功。同业公会在时间上、经费上给予大力支持，造就了一批人才，为新药业的发展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1952年，药业同仁为使落后的服务和管理水平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经同业公会组织会员反复讨论研究，决定举办药学班，培训一批中级技术骨干以继承和发展新药事业。当时的作法是：一、请市卫生局药政处的蒋义斋药师与同业公会的罗寅基一起驻会办理有关事宜。二、邀请湖南医学院叶丙文教授、刘泽民教授，湖南制药厂陈浩然药师、曹渺药师等医药界名流授课。所开科目有药物学、调剂学、物理学、有机无机化学、植物学等。三、办学经费靠同业自觉捐献或按企业大小及营业额多寡通过动员劝说筹集，学校设在同业公会内。

开始只打算办一期，通过学习大大提高了入学人员的业务水平，对新药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又连续举办了四期（高、初级各两期），共收学员200人。学员毕业后一部分留在原企业，一部份被其他企业所招聘，他们都成了各个医药行业的骨干。

过去，衡量药品质量的好坏是很少有科学根据的。当时较大的药房还自制药品。如何赢得顾客的赏识，就全靠信誉和信息反馈。同业公会对药品质量的好坏极为重视，他们收集有关资料，根据所掌握的情况制定了行规。对顾客反映无效的药品或以甲代乙图谋暴利的（如用磺胺代替大健凰、哌唑代替代净

等)给予处罚,任何人不得徇私。由于行规严谨,一般都能恪守执行。同业公会不仅要求企业薄利多销、勤俭节约、降低销售成本来求发展,而且对药品物价也严加管理。1946年长沙市各主要行业为打击投机倒把,稳定市场物价,成立了议价委员会。其主要内容有:1.议价限于零售价;2.所定售价应按进价加20%至25%的毛利;3.违反议价,擅自抬高物价的处以罚款;4.由行业大中小摊派代表3至5人组成议价组;5.分区定人、定时、定点进行检查。在当时货币贬值、市场混乱、物价一日数变,人心惶惶的情况下,同业公会依赖信息灵通、检查督促、奖惩兑现三条,为稳定市场物价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如1947年同业中的西药房向顾客卖阿斯匹灵,每支应为0.4元,营业员以0.5元出售,引起一场不小的风波,被警备司令部处以封门一周的处罚,经手人被禁闭数天。此事经过多方疏通周旋,才得以解决。建国后,在国家未实行统一调价以前,同业议价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建国初期同业间矛盾的焦点是中小企业进货难,中小药房由于受资产限制,无法大量进货,只能向行商或较大的同业批进,受到中间人的盘剥。同业公会为解决这个问题,创办了联购行,由同业集资向申穗药房药厂直接成批调货。联购行不取利润,这样为中小企业降低了成本,在进货时又统一了售价,保持了合理利润,得到同业会员一致的支持,对物价的管理和稳定起了积极的作用。此外,在药品质量和物价管理方面始终抓住了以下五条:1.尊重人才,注意人才的培训;2.依靠信息和信息反馈;3.制定群众乐意接受或能够接受的规章制度;4.加强群众监督、检查;5.奖罚兑现。这样使西药业在消费者中一直保持较高的信誉。

长沙市饮食业同业公会

王正球 *

长沙市饮食业同业公会，原系茶居业公会。茶居业、面粉业、粉饼馄饨业等供雷祖菩萨于轩辕殿，寓意于不浪费粮食，免遭雷击，筵席业酒菜饭馆业供詹王菩萨于詹王宫。就茶居业来说，开茶馆包子铺，买卖不大，收入也少。旧社会一般都是抄本业出身，俗语说“三个行时师傅，顶不得一个背时老板”，佃得间铺子摆几张桌子，就可以当老板，因为易起易散。

抗日时期，为了取得食盐分配的合法权益，杨义全、陈东湘等发起成立了茶居业同业公会，并加入市商会为会员，杨义全任理事长。建国前夕，同业公会改选，由常鑫坤任理事长。

杨义全任同业公会理事长期间，为筹集公会基金，与长沙面粉厂协商，由同业公会批条子到面粉厂购面，其回扣由同业公会结算作为公会基金。同业公会掌管行业店铺开业，按行规规定，凡茶馆的开设必须按上七下八的距离，否则同业公会不给批准。在经营价格方面也必须遵守行规。

抗战胜利后，茶馆业务盛况空前，同业公会属商会会员，同业老板的身价也就随之提高了。按照行规店俗。雇用工人均为言所约法，三节请人常规之理，工人有受雇之权，店家有请人之理，这些章程都是彬彬有理的。

建国后，长沙的面粉业、筵席业、酒菜饭馆业、粉饼馄饨业等自然行业经过工商登记、清产核资、五反运动，在市工商联筹委会的领导下成立了饮食业同业公会，先后由黄家声、于仲初任主任委员。同业公会在支前借款，治淮工程、工商登记、爱国守法教育、粮食统购统销、端正经营作风等方面协助

* 王正球现任长沙市工商联执委。

政府做了很多工作。

1.茶居行业资金少、利润微，在国家对私营企业进行改造过程中，普遍的感觉是税收负担过重，且到期难以完成入库任务。同业公会根据这一情况，组织成立了储税小组，按日按星期按营业额储缴税款，减轻了同业一次缴不出税款的困难，如期完成了税收入库的工作，深得税局和上级工商联的好评。储税纳税的经验在全市各行业得到推广。

2.捐献飞机大炮。同业公会在接受上级分配的捐款数目后，在全行业会员中进行认购。会员均感难以完成。同业公会根据这一实际情况印发了分期缴款卡给每个会员，每收一次捐款就剪卡一块。通过分期缴款既减轻了会员负担，又提前完成了认捐任务，同时也避免了行业会员之间负担倚重倚轻现象。

3.1954年物价普遍上涨。当时一个包子售价为5分，根据市场行情必须调整到6分。但同业公会认为不能涨价，因为包子一涨价就会影响市场物价。如人力车工人就会说一角钱吃不到两个包子等。同业公会决定不涨价的做法，得到市领导及各方面的好评。

4.协调劳资关系。从我们行业来说劳资关系比较突出，因为，有时业务不振，营业衰落，解雇歇业，店员要求改善工作条件，增加工资，店主也来诉苦等情况常有发生，遇到此种情况时，同业公会就与职工会协商，出面调解，这样劳资关系往往能得到缓和。

5.全行业公私合营。国家对私营企业的利用、限制、改造主要是靠党的政策和感召，但同业公会在此时也做了不少工作。就我们行业来说，会员户多、分布面广、资金少，若无同业公会进行组织和管理，工作就会出现杂乱无章的现象。当时市工商联和各同业公会协助政府对会员进行教育，清产核资，顺利地完成了公私合营，受到政府的嘉奖。

长沙南货业同业公会的几点回顾

莫浚源 *

长沙南货业的前身是由行、号、铺、店组合成的万育群生公会，祖师庙设在东茅巷，是个很穷的行业，负责人有肖董生（经营恒太行）、王鹤卿、彭桂生（经营中和行）、邱绍鸿（经营裕太祥号家）、周华美、周春煊（经营恒顺森批发号）、王维翰（经营怡丰兴零售店）等。另外还有江西帮八大号家，他们办公地址设在铜铺街庐陵会馆。

1950年，南货业同业公会在德沅南货批发号内成立，主任为王世传，笔者当时是副主任。为了创设会址，自建公会，我们随即筹集资金。当时资金的主要来源是行号大户。我们购置了振兴长颜料号在朝阳巷左太清宫巷内的地皮200多方丈，动工建筑，添置设备，光是会议凳子就有200多条，整个费用达1.5万多元。这么大的工程，我们没有向上级要分文。成立同业公会，在当时起了如下的作用。

一、协助工商税务部门进行工商登记和评议税收

1950年，工商局要办理工商登记，公会积极协助他们对会员进行宣传教育，并摸清了会员资产的底细，防止资产转移，从而顺利地完成了工商登记这项任务。

评议税收。这是个艰巨的工作，因为要让店户把钱拿出来交公还税，关系到个人的切身利益。建国后，党对私营工商企业采取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即利用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税收是改造企业的关

* 莫浚源曾任长沙市南货业同业公会副主任。

键。当时税务局提出三种征税的办法：①评分定质；②民主评议；③自报查账。并规定南货业要上缴60亿营业额的百分之几的税收。据说这个数字是税务局根据所掌握的情况而定的。我们行业负责人认为这个数不准确，若按此数纳税，那么很多店子将要倒闭。为了纳税也为了让一些店子继续营业，我们决定在全行业开展一次摸清家底活动。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终于摸清了行业店底，做到了心中有数。大家认为税一定要交，但交完税后，还要让店子开得门，否则就会造成杀鸡取卵的结果。我们行会的负责人主动找税务局，将摸底情况如实地向他们做了反映，经过双方协商，税务局决定按13亿的营业额的百分比收税。缴税数目协商好后，我们又要争当纳税先进行业，带头入库。有些店子接受所缴税收数后，但一时又拿不出钱，对此我们就帮其垫款入库，受到税务局领导的好评，也受到会员的赞扬。公会真正起到了上情下达，下情上报的桥梁作用。

二、扶持企业 交流物资 活跃市场

1952年，五反运动结束后，一些人消极经营思想相当严重，他们宁愿拖垮企业打伞出门，也不愿继续营业。对此我们公会也做了很多工作。首先向他们说明困难是暂时的，其次动员全公会发扬以大帮中，以中带小的互助精神，从资金、货源等方面帮助他们，使他们有勇气继续营业下去。对确实无法再继续营业的企业，我们公会就帮助他们调解劳资纠纷等问题。

1953年5月上旬，市工商局尚子锦局长批准我们行业组织贸易访问组（组长刘茜聪，组员莫浚源、朱季枚、彭俊杰、周锦标、黄厚培、徐文俊），到武汉、北京、天津、沈阳、济南、青岛、上海、宁波、杭州等地参观学习，同时参加各省市的物资交流会。会上我们签订合同、购进商品的金额达50多万元。这些物资陆续运回长沙，由行业业务改进委员会，按成

本加运杂费用，统一价格，分配给各店销售，对协助政府调节市场物价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也协调了行业之间和行业内部的关系，提高了行业会员对同业公会的信任感。

三、创造条件 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

建国后我们行业经营的有些物资由政府统购包销和加工订货。行家客货无来源，对维持企业平衡确有一定困难。当时政府号召节约开支，精减费用，实行企业内部改造。这个改造首先就触及到个人的切身利益工资问题。这一工作又落到了同业公会负责人的头上。因为，当时行业负责人都是企业的经理，月薪在百元以上，你自己不砍，怎么好让群众精减。我们只好硬着头皮砍，最后只评个11级，每月工资57元，还没剩下原工资的一半。另外有的号家为了创造条件，节约开支，将正街门面佃出，在后面接受加工洋蜡烛等，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就是这样度过来了。

长沙照相业同业公会

朱振三 *

长沙市照相业同业公会由全市各照相馆组成，以店为会员单位，由各店负责人代表本店参加同业公会的活动，公会设委员、理事，常务理事主持会务工作，所有委员都是兼职不兼薪。建国后，由市工商业联合会派一名干事与本会雇请的一名杂工料理日常工作。同业公会的主要任务是：代表会员向有关方面反映会员意见，完成市工商联下达的各项任务，协调会员之间的关系，开展生产经营。他们的具体作法如下。

一、由同业公会按各店的规模、生产设备、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分一、二、三级，发给全市统一的照相营业价目表，各店一律按所发价目表挂牌营业收费，各店所收费用不得高于价目表上的规定。

二、共同遵守商业道德，不许以次充好。凡不合规格的照片应及时返工重拍保证按时交件，如遇顾客所取的照片因冲洗不当而变质，应免费重制，短少、丢失顾客的照片应补足、赔偿，不容许任何不道德的行为发生，如发生严重事故，责任属企业的，由公会限期停业整顿；如属个人责任，即除出行业。

三、建国前后，参加和平起义，迎接解放，动员会员恢复生产，遵守共同纲领，安排就业，做到了劳资两利。

四、支援前线，支援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劝募寒衣、推销公债，超额完成任务。

五、踊跃交税，在本行业公会成立税评委员会，发动会员

* 朱振三曾任长沙市照相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

实行民主评议，各期税负实行先期储税，当本业难以及时交缴税金时由公会代向外行业借款入库，并组织会员自查补报税金，健全会计制度，大部分大户都达到自报自查的水平。评税分月评、季评、年评，在评税时经常开会评议至深夜，使各纳税户心服口服，行业委员还带头纳税，代筹税款，并做到全部归公，从未发生损公肥私，行贿受贿事情。税评委员在工作中经常受气挨骂，但他们从不计较，仍千方百计地完成任务。

六、动员会员投入爱国守法、“三反”、“五反”运动，积极进行企业内部改造，争取早日参加公私合营。

七、调解本行业各店之间的矛盾和各种劳资纠纷。当时照相原材料受到帝国主义的封锁，同业生产发生困难，同业公会就出面向政府求援并得到支持，使原材料紧缺的问题得以逐步解决。

长沙百货业申庄二三事

张 鉴 之 *

笔者1933年在长沙市经营百货业（过去称苏广业），正月间跟随裕阜长百货批发号经理张辅卿先生去上海，住金陵东路金门街长沙商栈。张辅卿先生两个多月后回长沙，由我常住上海，当时称为裕阜长申庄。9月，唐农阶先生来上海，住到年底，随着商店不断改组更名，我驻上海的申庄招牌亦几经更迭，直到1948年出任振湘源百货号经理，才结束驻申庄生涯，总计从事百货业申庄工作16年，亲身经历及亲见亲闻，有若干行业性史实，兹略记数则于次，作为同业公会史料补遗。

一、汲收上海厂商铺底资金 扩大经营

上海厂商对有一定信誉的申庄，采取赊销分期付款的办法，凡当月8日以前开票的，月底开始付款，8日以后至23日开票的，下月15日开始付款，23日以后开票的，下月底开始付款，每月付款一次，每次付余额的百分之三十，年底清结。每年到11月半左右，一些实力雄厚的厂商，就开始放“开期”，所谓“开期”，即次年元宵节后才开始付款。这样的厂商不多，放的对象亦有所选择。据我所知：长沙市百货批发商十几家，根据各自的经营规模，分别汲收上海厂商投放的赊销商品，十几万至三四十万不等，为自有资本的10至20倍（如裕阜长资本不过1.4元，欠上海厂商的货款，经常保持25万元左右，高峰时达30万元。大德昌资本1.3元，承受上海厂商的赊销商品还要多）。估计全行业承受上海厂商投放赊销商品资金达三四百

* 张鉴之现任湖南省，长沙市工商联顾问。

万元。有力地推动了长沙市百货行业的发展。

二、“庄余”上交过程

绸布、百货、南货等行业店员中，曾普遍流行一种说法：“若要工作好，一是‘上海道’，二是‘长沙关’。”“上海道”指的是出庄上海，“长沙关”指的是下河提货人员，经常和海关、厚金局打交道，有应酬费报销，可以从中捞些油水，本文不加细说，仅就“上海道”一词，谈点百货业申庄情况。

申庄采购商品，除有些新产品，跑街人员（推销员）送些样品试用不收费外，没有索取回扣的习惯。不过有些厂商到12月半以后，按全年购销产品金额返还部份现金，其幅度为购销金额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一·五，均以现金支票送到庄客手中，不要收据。如此送返还金的厂商，只有大中华橡胶厂、义生橡胶厂、永和实业公司等少数厂家。大部份厂、店是通过年终结算时，采用抹尾扣点方式。交往金额不大的，抹掉尾款，彼此客气一番，双方均不计较。交往金额较大的，协商扣点。讨价还价，争论一番，最高的不超过百分之一，最低也不少于千分之五，以千分之七八居多。此外，运费回扣率很高，大部份货物是通过轮船水运到汉口，再由铁路转运到长沙。汉口至长沙的运费由长沙结算，庄客路过汉口时，受到转运公司一些招待而已。上海至汉口的运费，由报关行经办，按统一运价开票，申庄每月约付若干（不超过开票金额的半数），年终结算。在航运业不景气的情况下，怡和、招商、三北等轮船公司，互相烂价竞争，八折、七折、六折，最低一年以五折结账。运费基数虽小，由于折扣大，每年收入亦相当可观。综合以上各种收入，据笔者经办裕阜长申庄1933至1937年5年的情况回忆，最少的年份为8000多元，最多的年份为1.6万多元，平均为采购金额的百分之一左右。

过去这笔收入基本上均落入庄客的私囊。再加上每年两次的送往迎来宴会，应接不暇，气派非凡，人称“上海道”，亦不为过。

全行业将申庄收入作为“庄余”全额上缴总店，是唐农阶先生率先实行的。唐农阶先生在大革命时期，以玻璃行业的少老板参加商民协会，原名罗阶，因赞成以农民为主力军的革命运动，而更名为农阶，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潜往上海，通过德和阜百货店老板张树藩先生牵线，于1928年与百货业巨头陈福生和张辅卿、张启鹏等合伙组成裕阜长百货批发号，由张辅卿任经理，唐农阶任上海庄客。就是这位新加入百货行业的人，在驻申庄不到两年时间内，揭开这个奥秘，并倡导“庄余”上缴总店，使一些老驻上海庄客黯然失色，不响应不行。在此以前，畅记百货号申庄陈伟能七公，早已上交总店，未向同行业公开，只能视为洁身自好而已。

三、全行业联购分销总店——公益号的天折

1935年，唐农阶先生又倡导组织全行业联购分销总店。从5月份开始酝酿，经过三个月时间的磋商，一致同意成立公益号。号址设于臬后街（后来德丰昌即设于此），公推莫德怀先生为总经理，唐农阶先生为驻申总代表，聘请张仲实先生为驻申秘书兼会计。中秋节后开始联购活动，首先召集全行业驻申人员会议，商定对冬令针棉织品大路商品（如棉毛衫、绒卫生衣等），统一联购。各家自行登记数量，统购后按登记数分配，确定五和织造厂的鹅牌、振丰棉织厂的虎牌、景福棉织厂的蝙蝠牌三家中比质比价，择优选定一家，五和织造厂以老厂名牌自居，只承诺按出厂价回扣百分之三，振丰棉织厂承诺按出厂价回扣百分之五，景福厂说折扣好商量，唐农阶先生要求回

扣百分之八，谁愿意，就和谁厂签订合同。面临入选者将独占湖南市场，落选者将退出湖南市场的严峻选择，谁也不愿丢掉湖南市场，都不关闭谈判之门。正在紧锣密鼓谈判之际，大德昌百货号经理林绍元先生来到上海，他申明不参加联购分销，并向厂商宣布，他愿意和任何厂商直接贸易。如此一来，公益驻申办事处门庭冷落，大德昌申庄来访洽谈者应接不暇。公益号于10月份解体，就此夭折了。当时，同业很多人抱怨林绍元先生，说他是行业大户，不该拆行业的台。其实，唐农阶先生急于求成，在未统一意见，没有订立章程的情况下，即贸然从事，大户怕担风险，此亦人之常情耳。

四、百货业申庄募捐赈济湘灾

1946年，湖南遭受严重水灾，方伯雄（鼎英）先生以旅沪湖南同乡名义，召集湖南同乡聚会于斜土路湖南会馆，共商募款赈济湘灾事宜，会上成立湖南旅沪同乡湘灾救援委员会，公推章行严（士钊）为主任委员，方伯雄为副主任委员，委员若干人。要急于成立办公室开展工作，都认为湖南会馆地址过于偏僻，对开展工作不利，苦于无适当地方。笔者在场表示：为了共襄盛举，我愿腾出长沙商栈的办公室一间，作为开展救灾工作之用。次日，方伯雄先生带领孟文寿（新化人）、彭某某（某师副师长，记不起其名）来我办公室，介绍之后说：“具体工作由他两位办，工作如何开展，就偏劳老弟了。”我奉命积极开展募捐工作。章行严先生凭其声望邀请海兰芳、马连良、金少山等京剧名角举行义演，我则发动百货业驻申人员，凭借各自与厂商的关系，分途向厂商募捐。大德昌林绍钧先生与我一道向大中华橡胶厂募得1200万元，向正泰橡胶厂募得1000万元，义生橡胶厂募得600万元，黄祥林先生向永和实业公司募得600万元，其他驻申人员均联合或单独向针棉织厂和绒线店

等募款50万至200万不等，所有驻申人员均投入了募捐行动。由我发出的募捐册一一收回汇总，总计募得捐款二亿二千余万元。京剧义演另有人经手，除掉开支实得8000余万元。合计三亿余元由复兴银行电汇给湖南省参议会赵恒惕议长收。为支援灾区人民作出一点贡献。

在募捐救灾的同时，笔者与利华总经理肖伯修先生合资购进地处沪西长寿路的利康橡胶厂，更名振华橡胶厂，我投资法币二亿元。当时抛出黄金700两，只得款一亿九千三百五拾万元，凑600余万元现金才足额。推算出当时黄金每两价值为276,428元，可知救灾款约折合黄金1210两。从而明确当时法币的价值。

长沙绸布行业条规四则

“行有行规，店有店约”，这是工商界的信条。长沙绸布行业自清嘉庆年间至民国，先后公议颁布行规四次，现摘录于后。

一、光绪十八年（1892年）省城绸布庄条规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十二月十六日，遵湖广巡抚大公报断定章程，凡带徒弟者，无论铺户、作坊，准其请客十五人者，年半带徒弟三人。之后：到光绪初，有聚昌厚绸布庄，刘华之经手，购白马巷口、房屋一栋，成立绸布业公会，因此在光绪十八年（1892），省城绸布庄定条规八则：

1.议：起造庙宇，用费浩繁，同仁等每人捐钱二千文，内一千捐作宇费，一千文作文质会蓄积，将芳名泐石，倘有违抗不出者，庙内招贴姓名，永远不许帮贺，如有各店延请，值年登门拦阻。

2.议：财神瑞诞定章，演戏三部，酒席三日；文财神寿诞演戏一部、酒席二桌；七星会寿诞定章演戏二部，酒席二桌，其余各会期寿诞、归锦云会办理，外人不得妄参末议。

3.议：会期寿诞，总管、值年先三日齐集庙内，商议一切，书帖分三天轮流，恭请各备衣冠拈香上表，以昭诚敬，其演戏、酒席，归值年经理，毋得推卸不到。

4.议：会内总管三年一换，值年一年一换，其钱银出入，归总管经理，凡会期寿诞所有一切用费，该总管、值年共同核算，招贴晓单，以示公正。

5.议：凡我同行入，务须循规蹈矩，各守本分，倘有苟且不

法情弊，一经查实，公同议革，永不准本行贸易，毋得徇情隐匿。

6.议：蒙师学徒，每人上会纹银四两，归锦云内，二两归文质会，做酒之日，由店东派人送交各会值年收讫蓄积，以作公项。

7.议：外处人来省帮贸，公议入帮会五串文，如无现兑，该引荐人说明其钱归店东承认扣取三月，如数归楚，毋得迟延推卸。

8.议：以上各条稟请宪示，刊刻石碑，凡我同行务期照规遵行，如有紊乱规章，公同议罚。

二、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綢布庄条规

1.祀神建庙，为齐集同行，以昭划一，牌名“锦云集庆”又曰“文质合庆”均具有成例，两班入庙办理祭祀等事，总以锦云为先，文质以后，毋得争端更章，惟岁修庙宇，两班公出用费，商量办理。

2.州官设尺，原以量物长短，近有射利之徒，名虽加尺，实则欺蒙，我行公议，嗣后用尺，总以官尺为准，每年较准一次，不得擅自增减，有滥成规，公同稟究。

3.我行通商务，必开设门面，悬挂招牌，交易公平，方有信实，近有射利之徒，肩挑夏布、棉布、青绢等项，负贩沿门无非取巧，鱼目混珠之意，此种恶习，准其禁革，倘有不遵，公同稟究。

4.“锦云”“文质”列为两班，每班择一人总理，八人值年，凡更举两班值年，毋得推卸，以每年七月为限，两班总管，以三年为期，其总管、值年期满，皆不得恋充。

5.两班值年办事，必须商酌，各总管然复施为，毋得擅专称能，即上班值年举荐下班，须老成练达之人，倘下班亏空银

钱，上班值年认赔。

6. 綢布两行开设门面，行号、新立牌名，议纳牌费十二两，或原牌添记一字，捐纳银五两，归锦云、集庆入公泐石，以期同心共济于公事，实有大裨焉。

7. 外来帮伙，无论何处人等，照例出备入帮钱五串文，交文质合庆泐石，先提一半归锦云集庆，以作建庙之资，为违不出，归值年向引荐店中是问，倘有徇情隐弊，公同议罚。

8. 帮伙须凭同行引荐认保，如有抽掣等弊，店东投鸣两班总管、值年理论，出革，并向荐保追赔，自革之后，不准延请，如违公同稟究。

9. 账项帮伙经手，即责成经手归原，如有滥赔、私收、支扯等弊，投鸣总理、值年、向荐保追赔，倘未归清，别家不得延请，若徇私情延请者，准其前项向伊赔完，如违稟究。

10. 收带生徒，必须凭引荐认保，总以二进二入为常，多则三人为止，每人出入帮备纹银四两，交文质、合庆泐石，先提一半归锦云、集庆，以作建庙之资，该徒倘有抽掣支扯等弊，向荐保追赔，如违稟究。

注：1898年《湘报》“商务行情”银两湘平、价值为一千三百六十四文一两。并附革条于下：

善化县葛、麻业革条

立革条葛麻业全体同行，因本业大西门顺康庄，窝藏长毛销脏，业经查实。我等公同商议，革除该顺康，永远不许再入善化县营业，以整同业规章。特此告白。

大清咸丰四年三月初七日

三、清末宣统元年（1909年）再设花布帮公议条规

1. 鹿角办布，宜拣选提庄，开通客路，以期永远销行。

- 2.客商买布，无论本城外埠，只准拣札、不准拣匹。
- 3.铺户来我栈买布，及送铺户看者，落价后不得退换，价不翻悔。
- 4.本城期票，自初一至十四归上比，十五至廿九归下比，经纪一比现清，不得拖延。
- 5.外埠客商来栈买布者，现买现兑，无论多少尾数，概不计账。
- 6.卖布价值，听鹿角买价涨跌，不得高抬低减。
- 7.卖布听经纪挨次轮流派卖，任客看布，不得自行搬看，花边、钱票，随市估价，不得任意高下，以上各条务期永远遵行，毋得自误，如有违反，公同议罚。

四、1947年长沙市布商业、丝绸呢绒商业同业公会行规

1947年农历八月初十日长沙市布商业丝绸呢绒商业同业公会为整顿会务，经九理、三监联席会议，讨论事项，本会为整饬行规、开展业务，兹依照第17次理、监联系，及营业负责人会议之决定，并采纳本会物价评议会第14次议价会，所提供之意见，特拟具左列整理行规办法，提请审核修正案。①根绝放尺折扣等不良陋习，由公会印制“同业公议绸洋各货，一律平价、不折不扣、不放尺、不赊账，如违从严议处。”分贴各店，以昭信实。②不放尺，暂取对外作用，因本业放尺风尚，已完积习，一时紧缩，于营业上必多阻碍，故对内仍不得超过加一放尺为原则。③为抵制负贩拦街叫卖之滥价行为，将当头货降低价码，以资抵制。④如有构成折扣及超过加一放尺，处罚于次，（甲）第一次违反者，由本会去函申斥，并悬牌示儆。（乙）二次者罚国币50万元，该店经手人来会道歉。（丙）三次者罚100万元，如情节重大者，得依同业公会法：“凡会员不遵守共同议决案者，可呈请政府短期或长期停业之处分”。

⑤本会为整理行规，保持同业旧有信誉，用公会名义刊登广告，开展业务，扩大宣传，而争取各界人士之信仰。⑥健全本会议价会之组织，开诚布公，根除猜忌，严格执行决议案，纠正错误，检举弊害，以凭办理。⑦本决议案，经各店盖章，以示遵守，不得反悔，自公布日施行。

（朱运鸿整理）

惨淡经营航运业的历程

彭六安 *

我年逾古稀，欣逢盛世，桑榆虽晚，而报国之心倍切。爰在公余，将毕生经营航运业的主要历程，濡笔记之。惟苦于耳目闭塞，记忆衰退，挂一漏万之处，在所不免，敬希知我者，给以指正。

辛酸的童年

我于1912年1月出生在汨罗江畔的河夹塘大洲彭的一个农民家庭，这里是彭、胡两大姓和周、杨、陈等民族的围垸，他们聚族而居。由于围湖筑垸，破坏了水利体系，水灾频仍，人民长期处于“十年九不收”的多灾状况之中。我的童年和少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1925年，我刚满13岁，汨罗江畔，洪水成灾，遍地哀鸿，民不聊生，我不得不辍学，到沅江南大膳，投靠在该镇工作的堂兄。慈母怜我年幼远离，再三叮嘱。从此，我离别故土，走上了人生的漫漫征途。

立志经营航运业

到南大膳镇后，通过堂兄的介绍到该镇一家南货店学徒，劳动十分繁重，只有在晚上才可以抽空自学一点文化和业务知识。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总算熬过了三年的学徒生活。老板认为我工作负责，勤奋可靠，便留我在店中当店员。我受到老板的器重，每月给光洋12元的工资，数虽微薄，但在同事中我的待遇

* 彭六安现任全国工商联执委 湖南省政协常委、省工商联副主委。

却是最高。1926年北伐军兴，南大膳成立了区农民协会，在商店也有店员工会的组织，我们积极参加店员工会及其查禁日货等一些爱国活动。我当店员期间，深受老板信任，经常派我到长沙、汉口、岳阳等地采购货物，旅途中深感交通不便，如从南大膳到长沙，须由南大膳乘帆船到白马寺，再由白马寺转轮船到长沙，另一路是乘轮船到营田，由营田步行到汨罗，再由汨罗乘火车到长沙，途中几经辗转。同时，目击帝国主义的船只，凭藉着不平等条约所攫取在我内河航行的特权，在湖南内河横冲直撞，目中无人。此情此景激起了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爱国激情，从而在我的寸衷中开始孕育从事航运业的理想，而且立志要把这一理想变成现实。

艰难创业

1935年，我的理想终于得以实现。我凑足200银元，与人合伙租用了一条名为“保定”号的小火轮，行驶在南大膳到长沙的120公里的航线上，客货兼载。这条航线秋、冬水涸，每年只有六七个月的航行时间，其他主要航线又多被帝国主义的船只所垄断，我们船小本微，暂无法涉足。就是我们经营的南大膳到长沙的航线，途中的濠河、樟树港、铁灌嘴、靖港、铜官、霞凝等码头，每天也有长湘、长益、长南等六家公司的船只停靠，运货载客。我们是在与他们竞争中求生存。我们的竞争之道是，以优质服务取胜，改进服务方法，从业务到生活，给顾客以便利。如替沿江一带集镇的商店，把他们收集的农副产品带到长沙卖出，然后又帮其购回所需要的商品，我们只从中收取应得的运费，顾客称便，从而招来不少货运业务，我们也经常随船带货，做些小本生意。另一方面改善船上客餐，做到价廉物美，优于其他公司船上伙食，其价钱不但比别家船上的便宜，而且比岸上的一般饭店还要好。因此，旅客多在船上

用饭，免了上岸后找饭店的麻烦，这样，在伙食上虽不赚钱，但这一措施争得了较多的运输业务，从而在竞争中站住了脚。不到两年的时间，就盈利银元2000余元。

发 展 与 挫 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外轮撤走，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人民纷纷逃难，交通运输，一度紧张，内河航运暂时出现繁忙景象。此时我利用外轮撤走的机会，大力发展客货运输，于1938年集资购造了第一艘轮船，取名“华胜”寓祝中华胜利之意。当时这艘轮船主要担任汉口至南京之间的军差运输和长沙至湘阴的客货运输。1939年春，我以船只入股，参加湘沙轮船公司，并担任该公司业务主任，其航线主要是湘潭至沙市。投入营运的，最初有“新鸿庆”、“德兴”、“泰运”等轮，每3至5天开一班次，是时武汉已经陷敌，来湘客货或由湘去鄂的客货，均以武汉上游的沙市为之中转，故这一航线的运输业务比较兴旺，经济收入亦较可观。另与长津轮船公司经理王毓麟合伙，在长沙碧湘街、太平街分别开设联济织布厂和人生米厂，又与人合伙在沅江南大膳开了一家南货店，牌名公福厚。此时我又以轮船入股长湘轮船公司，并兼任长湘公司经理。

湘沙与长湘这两家轮船公司，虽同是以船入股，但管理方式各异。湘沙公司是入股者各自保留船只的所有权，在营业上共负盈亏；而长湘公司则是各船自负盈亏，我虽是经理，但对船只不能统一运营，经理的任务仅是负责内部联络、协调关系以及组织客货、应付军差等等。正因为入股方式和管理方法上存在弊端，调度失灵，运营不畅，加上时局混乱，湘沙轮船公司不得不于1942年瓦解。

此时，我所经营的事业，虽有发展，但其间不知经历了多少惊涛骇浪，艰难险阻，最终还是毁于战火，个人在烽火中深

受颠沛流离之苦。

1937年和1941年我曾先后两次被国民党湖南省建设厅船舶管理所和第九战区的船舶管理所以“莫须有”罪名加以扣押，饱尝铁窗滋味，虽经多方奔走，花钱费力，保释出来，但无幸受辱，如今忆及，犹觉愤懑难平。

1941年8月中秋，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九战区的官兵要从湘潭湘河口以上开回长沙，派人打前站，在湘潭湘河口征用了13条轮船作运兵之用，我的“永大”轮也被征用。当时从湘潭到长沙的航线上布满了鱼雷，“永大”轮因船体轻巧，被派在前面领航，船上坐有一个营长监航，后面12只轮船排成6行，责以性命作担保，不准有半点差错。当时我在船上，心情是复杂的，既庆幸会战胜利，日军败退，又担心夜间行下水，既没航标，又怕触雷，只好用竹竿在船头探航，摸索前进，直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多钟才安抵长沙。

1940年七八月间，日本侵略军的飞机轰炸长沙，我座落在长沙北门的住宅被炸中，所有财产全被炸毁，家属亦险遭劫难。接着“永大”轮在洞庭湖被炸沉，“湘雄”号驳船在乔口被炸，烧毁沉没，损失惨重。在日机狂轰滥炸下，湖南民营轮驳，遭到空前浩劫。先后被炸毁的有：1938年被抽调担任军运的“新长江”等三轮被炸沉于湖北田家镇；1939年第一次湘北会战前后，“民康”、“新大”、“公福”第十多艘轮船，先后在长沙、三义矶、沅江等地被炸毁，我所建的“建湘号”木驳，也是这时在乔口被炸沉的；1941年第二次湘北会战时，“新福兴”等轮在湘水触雷炸沉，“新胜利”轮在鹅羊山附近触雷，伤亡惨重；第三次湘北会战，有“新太和”等十多艘轮驳被炸毁；1943年日军窜扰滨湖各县，在常德、桃源等地又炸掉了“沅昌”、“泰昌”等十多艘轮驳。

1944年长沙沦陷，民营轮船公司的船只，绝大部分撤退到

衡阳、祁阳一带。我把自己所有的轮船和驳船撤退到衡阳以南的归阳镇。同年7月，衡阳陷敌，为了不资敌用，与船员商量，将“普济”、“华胜”、“新大有”等所有轮、驳凿沉江底。至此，我十几年的心血，尽付东流。

据不完全统计，这个时期湖南民营轮驳在湘水流域的长沙、乔口、湘潭杨梅洲、湘河口、衡阳、零陵以及祁阳、白水、冷水滩、归阳等地自动凿沉的船只有89艘；在资水流域凿沉的有8艘，此外还凿沉了木驳拖船59艘；以上损失占当时湖南航运业全部资产的92%，所剩下来的，仅有沅水上游的大小轮船11艘。

自动凿船，免资敌用，体现了中国民族工商业者，在国难当头之际，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个人利益之上，毅然毁产，共御外侮的一片爱国赤忱。

我凿船之后，一无所有，率全家逃往桂林，迫于生活，变卖衣物，流落异乡，饱尝颠沛流离之苦。

重振旗鼓 再图发展

1944年，我绕道湘西回到沅江南大膳，设法筹资与人合伙，继续经营公福厚南货店，并在津市至南大膳之间做些临时性小买卖。这个时期，长津、民众等公司在沅水上游保存的11艘轮船，组成了民营湘西轮船局，由津市开常德，常德开桃源。至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们首先恢复了长津、长常等航线，担任复员运输。原有经营航运业的同行均先后由外省回来，成立了湘江沉没轮驳修复委员会，组织打捞战时沉没的船只，经过两年多的努力，陆续捞起和修复的轮船共58艘，另外新造轮船28艘，共计86艘。

1945年10月我回到长沙，立即组织人力打捞在归阳凿沉的船只，首先打捞的是“华胜”轮，从打捞到修复只花了一个多

月时间，改名为“新华胜”（意即祝中华取得新的胜利），很快恢复了运输。接着又捞起了“普济”和“新大有”等轮，行驶在长沙至靖港、湘阴、南大膳、汉口等航线上。1946年与王毓麟、高少斌等人，创办复华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寓复兴中华之意），由我担任总经理，王毓麟任董事长，高少斌任汉口分公司经理。该公司于1945年年底以4艘轮船先开长沙至宜昌，长沙至汉口不定期班，1946年年初正式开始营业。由不定期到定期开航，长汉班首先只有货班，后又发展到客班以及客货兼载，长宜班也由货班发展到客货班，后来随着业务的发展，与重庆民生公司办理联运，开展跨省运输业务，稳步向前发展。

复华公司最初的股东只有我和王毓麟、高少斌等几个人，以后逐步扩股增资，拥有股东30多人，打捞、修复、改建及新建轮船“复源”、“都匀”、“新鸿运”、“曲江”、“建华”、“复丰”、“复强”、“新楚南”、“华康”、“复华”、“联华”等11艘，新造驳子8只，依次编为复华1—8号，新造客货驳两艘，在长沙、常德、汉口等地都建有趸船、仓库、货栈，便利客货运输。同时在汉口设有分公司，宜昌、沙市、常德设有办事处，岳阳、湘阴设有照料站，职工发展到400余人，是湘省省内规模较大的一家轮船公司。

狠抓管理 锐意经营

复华轮船公司，吸取了以往办企业的经验教训，结合本公司的实际，制订了一套适合于本企业的经营管理的规章制度，而且能够贯彻执行，持之以恒。

首先是改变入股方式。轮船业过去一般是以船入股，船只仍归船主所有。复华公司则采取以船化股，第一步是将入股的船只作价，归公司所有，船主只有股权，按月领取租息，第

第二步是取消股息，改为年终分红，股东分红所得可自愿投资，增加企业积累。船只既归公司所有，对船只的营运、职工的使用和管理则可以统筹安排，以利于企业的经营和发展。

其次，在人的方面狠下功夫，我们认为人是办好企业的无价之宝，关系到企业的兴衰。因此复华公司用人唯贤，不论亲疏，用而不疑，充分信任。我们雇用工人和技术人员是以业务熟练，技术过硬，工作负责为准则。复华公司的几个大股东的子女亲朋没有一个在公司当权，如某大股东的儿子大学毕业而且是学经济专业的，但没有工作经验，也只能在公司任一般会计员，先资锻炼，而另一位王某既非大学学历又与我们无任何关系，但有丰富经验，工作认真负责，公司则委以会计课长重任。

在选拔船长上，更是严格把关，不仅要求熟悉航道，有夜航经验，而且要求具备维修船只技能和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船长选定之后，我们就充分放手使用，赋予船长以一定的自主权，如船员由船长挑选，这样既能发挥船长的积极性，也能确保船员的技术素质，而且船员既由船长选用，多能服从船长指挥，齐心协力，共同搞好业务。

公司的业务人员也是经过精心挑选的。

船长和业务骨干是公司的支柱，对他们的待遇我们是适当从优。由于我们的条件优于其他公司，很能吸引有才干的人到我们公司来工作，如楚利轮船公司有两位很得力的业务人员就离开楚利到复华公司。我们认为人才是企业最大的财富，这并不过分。

用人唯贤，给人以充分信任，固是用人之道，但尊重人和关心人，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在尊重人的方面我们取消了雇用工人须先交押金的陋习。在航运业中不少公司雇用工人，实行一种被雇用者须先交押金若干元，有的多达200银元，

直至解雇或退出该公司时方可退还，这一陋习不但将许多有技术而一时拿不出钱的工人拒之门外，而且是对人的不尊重，会影响受雇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复华公司一开始就取消了这一不合理的陈规陋习，得到职工的欢迎。

关心职工生活，是复华办好企业的一条重要经验。在旧中国通货膨胀，物价极不稳定，职工经常航行在外，其家属的生活、就医以及子女就学等问题，公司都给予充分的关心并负责解决，使职工能在外安心工作。如1944年，我的船只全部凿沉于归阳，公司派人守船，家里照样付给工资，家属照样得到照顾。

职工如有婚丧大事，公司负责人或派员登门祝贺或吊唁，过去职工伙食是由公司免费供给，公司即设法办好伙食，标准比同行较高，职工吃得好，干事的劲头也足。

在国民党崩溃前夕的1948年下半年，金元券恶性膨胀，物价狂涨，为了保持职工及其家属的生活稳定，我们采取了将收入的客货运费，随时购进粮食和燃煤的办法。稻谷由我所开的人生米厂碾成大米，同时将工人的工资折算成大米发放，但职工可以领大米也可以按放发时的米价折领现金，使之不受货币贬值的影响，稳定了他们的生活，使之无后顾之忧。

在职工的管理方面，奖、罚严明，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职工除工资外，实行奖金制度，如装货运费按运费额的5%—10%归船上职工所得，但必须以运输质量、无安全事故、出全勤为条件，按船分配，人人享有。船上所用机油等消耗品，凭船行时间结算，节约部分归船上职工所得。公司收入增加时，出力的职工，随时有增加工资的机会。年终分红，增加福利。派军差没有装货奖金，就采用各船只轮流派遣的方法予以解决。

第三，以快取胜，争取顾客。顾客的心理，不管是客运还是货运，都要求快，于是想尽办法以快取胜，这是复华公司争

取顾客，与同行竞争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经验。特别是货运，货主要求资金周转快，但我们的船有一部分比别家公司的航速慢，如何达到快的要求，我们采取了两项措施。

1. “呆鸟先飞”慢中求快。我们采取晚上航行，因当时航道无航标设施，一般不能夜航，也不敢夜航，因我们公司各轮的船长素质较好，具有夜航经验，又给职工以夜航津贴（一个夜班发两天的工资），大家都争相夜航，昼夜兼程，从汉口开长沙的货班，别人的船要5天，而我们的船只要3天。

2. 预报航程，货到即提。我们采取发预报的办法，争取了时间。如从汉口到长沙，只要船在汉口启锚，即派人乘火车先送水信，通知长沙方面，船只将于某日到达，船过岳阳又发预报，通知长沙方面，船只将于几点钟抵达长沙码头。公司即据以告诉货主准时到码头提货，这样既为顾客加速了货运时间，也提高了船只的使用率。

第四，加速船舶周转，提高船只利用率。复华公司的船只行驶四条航线，又与重庆民生公司联运，跨省运输，但只有11条轮船，10条驳子（另外租了一部分驳子），而且每遇大风又被阻于洞庭湖，所以加速船舶周转，就显得十分重要。除及时发预报缩短停港时间外，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1. 管理部门面向船只，一切为运输服务，船只不论什么时候到岸，日夜都有人值班，船靠岸后管理人员先为之办好手续，所需补充的燃料、油料、食物以及工资等都由管理人员备好主动送到船上。如船上发生问题亦即时处理。2. 改革修船方法，做到小修不进厂。船还在航行中，船长就将修理部分所需要的材料向管理部门预报，管理部门即根据预报作好修船准备，船一靠岸，即行修理，大大缩短了修船时间，如中修、大修则须事先作好计划，并在船只停航以前，预报修理项目（预报准确率须达到80%以上），然后与船厂签订合同，由船厂派人跟船考察，确

定修理项目和修理时间，在这个基础上作好材料和器材、配件的准备，有计划地安排船只停航修理，避免修理时停工待料。修船期间，不辞退员工，这是复华公司独到之处，有不少同业在修船期间，把工人全部辞退，或只发50%的工资，我们却不是这样，修船期间，不但工资照发，而且还要他们参与修船工作。因为职工留船参与修理工作，既可以监督船厂的修船质量，又可以让他们熟悉船上的机械情况和学到一些修船技术，在航行中遇有小毛病可以动手修理。因此，与同业修船时间相比，要短得多了。3.提高调度水平。从宜昌至汉口，常德至汉口，长沙至汉口等几条航线都要经过岳阳城陵矶作为中转站，进行统一调度，往往将常汉线的货物，由常德运到城陵矶，再转由长汉线的船运抵汉口，既节约了能源，又提高了船舶的利用率，加速了船舶的周转。

第五，诚实经营，讲究信誉。要争取运输业务，就要讲究信誉，来不得半点虚假。复华公司采取的是开船准时，如果与货主有约定，船不满载也准时开船。经常派业务员打听货运信息，听取货主意见，对于货主的货物保证运输质量，保持稳定的运输价格，即使是货运多的季节也不加价，赢得了顾客信任。

第六，注重信息，发展联运。复华公司在各地的分支机构，都设有业务员（信息员）。他们接洽业务，了解货运信息，听取货主意见，到市镇收集运货情况，特别是招揽业务，全靠信息灵通。

我们与重庆民生公司组织跨省联运。如由华南地区运往西南地区的货物均由复华在长沙中转宜昌，再由民生公司从宜昌转运西南；西南地区运往华南的货物亦在宜昌由复华接转长沙。联运工作配合得很好。从上海运往长沙的货需在汉口中转，只要上海方面船一启航，我们就能得到信息，在汉口将货物接运长沙。

第七，精简管理人员。复华公司在长沙设有总公司，汉口有分公司，常德、宜昌有办事处，沙市、岳阳、湘阴设有照料站，而所有的管理人员只占公司职工总人数的7%，人数最多的总公司也只有15人，最小的照料站只有1人，全公司管理人员中没有一个闲人，而是人人有事干，事事有人干。

第八，安全航行、勤俭办企业。安全航行是复华公司的好风尚。各个环节都有人负责安全问题，而且管安全的人都极为认真负责。如管码头仓库的吴秋生，只要船一到码头，他必到现场，检查安全工作，安排装货、运输一丝不苟。复华公司制订了有关安全方面的制度。如出了安全事故，则取消奖金和货扣，人人注意安全，形成了风气。所以复华公司从1946年创办到1954年公私合营，将近10年未发生重大海损事件。勤俭办企业成为全公司职工的自觉行动。从一些很小的例子就可以看出来，如船上所烧的煤炭，均从宁乡煤炭坝和青溪用小船运来后，采取对船过，既省时间也节约了装卸费用，货运转口，也采取同样的方法。发电报及挂长途电话，一般都在晚上，因晚上只要半价。收入的运费等款项当天解送银行。由于管理工作有条不紊，繁而不乱。复华公司在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下，企业越办越兴旺，成为我省民营航运公司中较有影响的企业。

迎接解放 为新中国建设服务

建国前夕，轮船业大多数同行，对中国共产党的城市工潮政策缺乏认识，加之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蛊惑，对共产党心存疑惧，纷纷暂避乡下。我也有顾虑，但我在进步人士的帮助下逐步消除了顾虑，并认准了航运事业在解放后将有一个飞跃的发展。当时，我在经济上颇有基础，在航运业亦有一定的影响。好友崔寅龙思想进步，与地下党长沙工委早有联系，在长沙西长街经营鼎中庄，藉以掩护党的地下工作，崔为利用我掩护其

工作，乃动员我投资鼎中庄，成为鼎中庄的股东，从而我们的关系更为密切，经常促膝畅谈革命道理，并通过他我阅读了许多有关党的城市政策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新的经济政策》等进步书籍，使我对党的政策有了一个较为明确的认识，解除了疑虑，为迎接解放作了思想准备，因此在具体行动上做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事情。

1949年4月，在长沙面临解放，同业纷纷下乡的情况下，我毅然根据汉口分公司电告以300两黄金在汉口买了一条旧船，又花了200两黄金修理，取名“复丰”号，船比较大。当时复华公司在长汉线上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楚利公司，买了这条船后增强了企业竞争能力，不论在货班和客班上都超过了楚利公司。在当时，我们12条船对开长汉线，水运繁忙，业务发展很快。

武汉解放之后，白崇禧窜踞长沙，匪特横行，肆行破坏，为响应地下党护厂保产的号召，复华公司采取人不离船，将所有船只掩蔽在湘阴乔口内烂泥湖、南大膳一带，将船只掩蔽在烂泥湖的还有长湘、民权、长津、长潭等公司，避免反动派挟船南逃。我抓紧这段时间，抢修船只，以便一朝解放，即可投入运营。我本人亦未离长沙一步，还资助长潭公司银元400元，维持该公司员工伙食，将船只开往烂泥湖。

1949年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复华公司于6日便恢复了航行，担任支前运输。当时长沙的铁道和公路均遭破坏，未能即时恢复，所有长沙至衡阳，汉口至长沙，汉口至益阳等地军运，都依靠航运。在抗美援朝期间，我们从宜昌接运由四川输送的兵员和粮食及军用物资等项，为支援抗美援朝作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曾受到中南军政委员会的表扬。

在支前运输中，我们也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解放军纪律严明，即使是军差，亦照章付给运费，并服从调度。我们航运业在旧中国深受国民党军队强拉硬派之苦，一旦与秋毫无犯、

公平交易的解放军接触，才领会到人民军队爱人民的真正含义。

建国后，航运事业翻开了新的一页，我个人的生活也由此步入了新的历程。当长沙甫告解放，军管会交通接管部部长袁福清同志即约见我，勉励我积极经营，发展航运事业，为建设新湖南作出努力。袁福清同志于是年9月1日改任湖南省交通厅厅长，我一直在他的直接领导、教育和关怀下，锐意经营，为湖南航运事业贡献了绵薄之力。

1949年10月长沙市军管会聘我为代表出席长沙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上通过协商，推定我与向德等39人筹备长沙市工商业联合会工作。

1950年我到中南区军政委员会参加交通会议回湘后，交通厅袁福清厅长与我商量，意欲委我以省航运公司经理职务。经请示，省政府副省长袁任远认为我继续留在复华兼管工商联工作更能发挥作用。同时，决定让我协助省交通厅整顿私营轮船业，这是党对我的信任，我愉快地服从了这一决定。是时长津、开济、庆兴、永安四家轮船公司因经营不善亏损约30万元，无法继续经营，以致波及职工生活。袁福清同志命我在此基础上创办新湘轮船公司，对原亏损的长津等公司的债权债务进行登记，至于新湘公司的开办费，由交通厅和复华公司垫付。交通厅调配了干部，复华公司为之输送了一些业务人员。在我和夏绍濂以及新湘公司全体职工的努力下，很快扭亏为盈，仅一年左右时间，就还清了债务，后将船只交给了航运局。

接着我又接受了协助省航运局整顿航运业的任务。首先进行登记，然后审查，最后批准。采取“三统”政策，即统一安排航线，统一货源，统一运价，将全省几十家私营航运企业整顿合并为10家，即：复华、长湘、民众、民权、楚利、富国、长潭、飞达、湘津、联华，建立了正常的水运秩序。复华公司

并向国营轮船公司输送了不少技术干部和业务骨干。

1952年党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我和所经营的复华公司积极投入运动，经受了考验。从1949年到1953年公私合营以前的几年中，由于积极接受国营经济的领导，努力经营，在同业诸多亏本的情况下复华公司却得到了发展。

申请公私合营 走社会主义道路

1953年，国家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之后，复华公司即召开董事会，决定申请公私合营，当时交通厅对此很重视，厅长孙国治同志也参加了会议。但申请之后，董事中有的人认为复华公司船好，资金多，根据当时交通厅以大带小精神，存在吃亏思想。全省40几家轮船公司，经整顿之后并为10家，交通厅要等一等，10家先搞4家，即以我任董事长的长湘公司和我任总经理的复华公司两家带民众、湘津两公司先批准公私合营正式成立湖南省公私合营湘江轮船公司，成为湖南航运业中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我被安排为该公司董事长兼副总经理。

在此以前，复华公司也为国家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如1953年洪水成灾，靖港以下湘江大堤溃决，人民生命财产遭到严重损失，交通厅急命复华公司派轮参加抢险。当时河水自决口倾泻而下，波涛汹涌，船只难于进入险区，复华公司轮船不顾船覆人亡危险，冲入险区抢救了人民的生命财产，省交通厅为了表彰此种不畏艰险的精神，召开了千人大会予以表彰，我们从中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教育。

1955年10月，全国工商联召开执委会，湖南由向德、陈芸田和我参加。会议期间，我们在中南海怀仁堂与全体与会同志一道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同志的接见，这是我终身难忘的会见和一生中感到的最大荣幸。毛泽东主席在接见时，作了题为《认识社会发展

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报告，我受到了极深的教育，这次会议主要是解决私营工商业者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回长后，我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宣传党的对私改造政策，并以自身的经历说服工商界同志主动接受改造，愉快地走上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

1956年当工商业者迎接改造高潮的到来和航运业全业合营时，我所在的公私合营的湘江轮船公司已过渡到国营，交由省航运局经营管理了，我被安排为省航运局副局长。

1957年1月，我到党校高干班学习。学习尚未结束，便通知我到北京参加全国工商联秘书长会议（当时我任省工商联代理秘书长）。会议主要议题，原是想解决公私合营企业中一些具体问题，中央对此很关心，特别是对公私共事关系，要建立制度。但会议进行到后一阶段就转移到帮助党整风这个目标上。会议期间很长，约有两个多月，首先摆问题，即开始“鸣放”，这个时候，反右运动开始了，在全国工商联刊物上我概括了当时工商业者的思想情况写了一篇题为工商业者在思想上有“两顶帽子”“三个包袱”的文章，阐述工商业者搞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的包袱；原企业小，公私合营后，企业大了，“怕工作做不好”的包袱；“五反”以后，亲戚朋友不相往来，职工和党员怕接近，“感到孤立”的包袱。这本来是反映了当时广大工商业者的真实思想，说了工商业者的心里话，但是有人硬说我这是代表工商业消极一面的言论。在反右运动中我的思想很紧张，在一段时期里埋头工作，不敢发表个人意见。一直到1960年全联召开“神仙会”以后，思想才逐步安定下来。

经过一年多的反右整风运动，仍回航运局任副局长，在航运局的十多年工作中，心情还是愉快的，有职有权，虽然有点的思想路线的影响，但党对我还是很信任的。我分管调度、机

务、航道、供应以及所属工厂等工作，我遵循毛泽东同志“以企业为改造基地”的精神，深入基层，与群众同工作同劳动，那里有广阔的天地，有用武之地，但是当时全局有职工两万余人，范围广、战线长，企业大了，能否管好，这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

从1959年至“文革”前，每年的8至11月的洪水期间，均由我带领粮食、帆运、航运等部门的干部四五十人，往湖区抢运粮食和木材，指挥所设在茅草街，每年要抢运粮食50万吨，木材70万立方米到长沙、汉口等港口，如果不在洪水季节抢运，到了冬季水枯，船只就要绕道临资口，该处河道狭窄，而且路程要远60公里，所以抢运工作时间紧，任务重，但都按期完成。每逢节假日客运繁忙时，我则深入客运站，检查工作或到工厂蹲点，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在深入到生产第一线过程中，发现原来船只修好后一个星期还不能投入运输，其原因配备船员领用杂物层层办手续，便果断地采取在验收船只时把船、机务、劳动工资、供应等九个科的干部全部带上船的办法，有什么问题，当即拍板解决，提高了工作效率，为了加速船只周转率，实行安全生产奖金，考核学习、请假、工作等情况，进行评定，效果很好，但这些制度都因十年动乱而遭破坏。

在工作中也处理了某些比较棘手的问题。如1963年因航运局挖泥船在湘阴刘家坝施工不当，影响到大堤的一些基脚，危及28万人口、40多万亩良田的安全，地方有关当局联名向上反映。大堤发生险象的原因，虽不完全是由于施工不当所造成，但与施工有着密切的关联。事情又牵涉到施工技术员的所谓“历史问题”，事情就更复杂了。当时，中共湖南省委交通部部长孙国治同志派我去处理这一问题。问题的解决，必须赶在春汛到来之前，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很大。我接受任务之后，立

即带领一批干部去湘阴，与县人民政府密切合作，积极备料（麻石、土方），由湘阴县解县长负责组织劳动力，我负责原材料的运输和整个工程的施工，提前10天完成了大堤加固任务，并根据原预算节约了3万多元，通过验收，地方满意，省委交通部也予以充分肯定，受到嘉奖。

我在航运局分工管理航道工作，每年都要到航线上调查，特别是枯水季节，保证通航，要采取措施。1964年冬，调查时，了解到河床障碍物很多，我将这一情况及清除障碍物的方案，详细向局党委汇报，得到同意，根据我提出的方案，开展了一次冬季全面扫床工作，以湘江段航道为重点，资、沅、澧全面铺开，扫除了大量的障碍物。如在三叉矶段打捞出抗日战争时期遗留下来的鱼雷、炮弹，橡树港打捞出大量钢铁、矿石及其他很多物资，彻底清理了河床，疏浚了航道，为确保安全航行，起了积极作用。

在航运局工作期间，深入基层得到不少锻炼和提高，当然，有时在工作中，由于某种偏见，也不免受到过一些挫伤，如在管理调度工作期间，有次军区召开新兵运输工作会议，局里派我参加，但到会不到半个小时，又电话通知我回去，原来军区认为我参加这样的会不合适，说是运输新兵是一项很重要的事，局里只好另派人参加，因调度科长不在家，派的又是一名原工商业者——调度科副科长出席，不过影响和名望比我小一点而已。诸如此类，对我们的工作积极性带来一定的影响。

1966年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开始了，我受到了抄家、罢官、游斗、劳动改造以及全面专政的不公平的待遇。家属子女亦受到株连，即在此黑云翻滚，险恶环境之下，由于我多年来受到党的教育，因此始终未动摇我对党的信念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报效国家的一颗赤子之心。如在劳动改造中与我在一起改

造的省航运局牛局长，发现局里有100多担桐油沉淀物，多年未加处理，仓库视为包袱，根据我的意见，我们两人把这些沉淀物熬成了几千斤桐油，变废为宝，群众风趣地说我们这两个“走资派”还真有点用处。

工商联工作

建国后，党给了我更多的工作机会，除继续经营管理航运工作以外，相当一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省、市工商联的工作上。

1949年10月，我参加长沙市原商会工作，即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支前借款和负责协助税局预征税收工作。翌年长沙市工商联筹备委员会成立，我又担负着推销胜利折实公债和经济建设公债等工作，并被政府聘为长沙市工商业税民主评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负责评议税赋，一直到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受到中央及中南财经委员会和省、市人民政府的嘉奖和表彰。如中央财经委员会高度赞扬“长沙市完成税收成果，为过去所未有”。“足资全国楷模”。

1950年1月2日长沙市工商联筹备委员会成立，我当选为副主委，同年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燃起了战火，我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并肩战斗，举国上下开展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11月4日我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号召集资捐款，支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长沙市工商界积极响应，于11月11日发表了《长沙市工商界开展支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宣言》，在筹委会向德主委的主持下，由我负责组织，具体办理，于1951年春节捐献慰劳金41250万元（旧人民币以下同）、慰劳品折价5000余万元；同年冬天，发动各行各业捐献优抚基金15亿元；1951年7月全国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长沙工商界捐献“长沙工商号”战斗机9架，捐献人民币135亿元。

1951年淮河流域四省水灾严重，同年11月长沙市工商联筹委会响应政府号召，成立救灾分会推动募集御寒衣物工作，亦推由我负责组织，经全市工商界同志的共同努力，募集寒衣17000余套和寒衣代金14亿余元，汇寄灾区，以解决受灾同胞的暂时困难。

在我平凡的一生中，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仅为党为人民做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工作，但党和人民却给了我很高的荣誉，历任长沙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长沙市第一、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长沙市政协常委、湖南省一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湖南省工商联副秘书长、代秘书长、秘书长、全联执委、历届省政协常委、民建长沙市委常委和省工委委员等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民建湖南省委和省工商联恢复活动，我当选为民建湖南省委副主任委员、省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执委、省政协常委、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与国家大事，深感才疏力薄，有负党和人民的信任和期望。

实业家章克恭事略

章执中*

家庭出身及少年时期

先父章克恭（1879~1935），字勤济，湖南长沙人，祖父仲和公以寒士悬壶问世，一家仅获温饱。先父六岁发蒙，至19龄迄未应试，赴苏州奔祖父丧，迎柩归湘营葬。其时，堂叔馥骏已毕业日本士官第一期，归任清朝新兵训练处教官，出资助先父于1903年进入明德中学第一班。1905年，湘巡抚端方保送该班学生去日本留学，先父入选。初入弘文学院补习日语，次年入横滨早稻田大学学习经济。1911年初毕业回国，应清末经济特科廷试，赐举人，时年三十有二。

从政与成家

1911年秋，武昌首义举发，南方各省相继响应，谭延闿出任湖南都督，任命周砥为湖南银行行长（又称总理），先父任副行长，不一年周辞职去汉口，先父继任行长。于是筹备银两作准备金，发行钞票，并在湘潭、衡阳、常德、岳阳等县城设立支行，是为我省地方银行发行钞票之创始。谭延闿与仇鳌组国民党支部于长沙，谭、仇分任正副支部长，经济组由周砥及先父负责，军事组则程潜、陈嘉祐任之。

1912年10月，先父与先母许璧（1887~1957）结婚，先母曾留学日本东京实践女子师范，习音乐，归国后，在周南女

*章执中系章克恭之子，现任湖南省工商联执委、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经理。

校、稻田女子师范授课。

1913年9月，执中生，湘督汤芑铭受袁世凯之命疯狂镇压人民。先父以“身居地方金融要津为民党筹集军饷”罪名被捕入狱，同时入狱者达数十人，其中如财政司长杨德邻等四人入狱不久，即遭杀害。先父与肖仲祁、陈光晋、曹耀材、黄镁等同时被捕，后得先堂叔营救脱险。先父从此不再履官场，改抱实业救国之志，投身于工商企业，尤潜心于我省矿产之开发。

实业救国——办矿

1913年冬，先父被聘为湖南华昌铋矿公司业务部经理。次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铋金属作为战略物资，交战国双方竞相争购致使铋价暴涨，而华昌又适时备价20万银两向法国赫伦士米厂取得技术与设备引进权，并在国内申请专利，从而垄断国内纯铋及铋氧之生产技术，省内各地的铋矿石均集中由华昌冶炼成纯铋后出口外销，华昌一跃成为扬名海内外的企业。华昌创办人梁焕奎有兄弟5人，分管采矿、冶炼及经营。其五弟硕甫正借眷留学美国，焕奎命其筹备驻纽约机构，并派在美国皇家矿业学院深造的门生亲戚李国钦为业务部副经理使美协助梁硕甫工作。先父与李国钦在国内共事期间，力主废除华昌与英商廓克逊洋行独家经销华昌（矿点在益阳板溪，称久通铋矿）的铋矿矿石及生铋产品的合同。废约谈判以赔偿英商十余万银两而告成。华昌乃获得自由贸易主权，为在纽约设立机构创造了条件。

先父在华昌期间，除梁氏兄弟及湘潭杨度外，还结识了江西旅沪巨商周扶九，长沙著名士绅朱菊尊兄弟、教育家曹典球、前清翰林汪诒书、名孝廉黄俊，以及洋商如美国慎昌洋行潘伯士，德国礼和洋行韩礼生，英商怡和、太古，日本三菱、三井商社的大办与华办谭莪生、谭笃余等人，其中与先父风雨

同舟，安危相济，互慰平生者，莫若曹典球老人，使人感念难忘。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结束两年，铋产品滞销，面临负债破产危机，梁氏兄弟及华昌其他股东因先父秉公办事，不谋私利，乃推举为总经理。先父虽勉为其难，终以负累太重，挽回不了败局。延至1922年华昌终于宣告清理。

先父出任华昌业务部经理期间，通过派赴各地勘察矿产报告，首先，确定创办兴裕钨矿公司，开采湘南宜章、资兴、郴县交界处的瑶岗仙钨矿，经取样送英美两国化验，确认为高品位黑钨。兴裕公司公开认股，梁氏五兄弟共认股10万银两，先父认股5万银两，其余为各界人士近100人分认，共集资20万银两。公推先父担任总经理，派郭国瑞担任驻矿山经理，除招工承包在矿区内掘进坑道取矿以外，并收购当地农民在矿区拾得的零星矿石。越年，开采矿石递减，公司入不敷出，决定停办结束。

与此同时，经发现江西大庾岭赣州等县有钨矿裸露于地面。我父复商得梁氏兄弟同意，邀在美国李国钦参与，共同投资20万银两，于1920年组设裕厚公司，由先父任公司经理驻长沙，梁鼎甫主持收购驻江西。李国钦在美国负责推销。由于收购西广，而主持收购者常逗留九江租界中，很少亲去矿地检查督促，致运销业务进展迟缓，引起李国钦不满，合伙仅一年余即告结束。

自华盛顿九国公约（1922年）签订以后，美国【对【华【坚持“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政策，乘机打进中国市场，如友华银行（Asia Banking Cooperation），便是一例。该行设总行于上海，在天津、北京、广州、汉口及长沙设分行。经李国钦在美国介绍，先父被聘为长沙分行华人经理，以对收购湖南矿产、桐油等土特产运销美国的客户融通资金为业务。当

时，经营这类物资出口贸易的还³有驻湘³的英、日、德等国洋行，竞争激烈。为了不使资金闲置，由先父与友人集资创办湘盛长钱庄，友华通过湘盛长钱庄向长沙市同³业各可靠³钱庄拆放，当时对活跃市场经济也有积极影响。旋湖南省长赵恒惕借联省自治招牌，谋扩充其军事实力，提出向友华银行借款 100 万银两，以常宁水口山铅锌矿产权及全部财产作抵押，先父为维护国家权益竞予拒绝，时省会各公法团体亦通电全国，反对出卖水口山产权给洋商，赵被迫中止签订合同，先父为了表明个人心迹，亦即辞去友华银行华人经理职务。

1922 年，先父向湖北官矿局承租了湘省安化县柑子园的铋矿，并与友人合资创设惠安公司（后改称通和铋矿公司）。总投资 4 万银元，引进华昌炼铋技术，建立一套氧化铋冶炼升华、回收生产线，另设有纯（精）铋冶金炉 10 座。具备月产纯铋 120 至 150 吨能力。先父担任公司总经理。这个矿山的开发一直延续到 1938 年，才因战争影响停业。共出产纯铋 1.1 万多吨，平均每年 700 余吨。1924 年到 1926 年，每年产量过千吨。该矿实为先父后半生经营企业之中心。为了使产、供、销、出口外销一条龙，他与文菊盈在汉口设立菊记公司，直接与当地洋行和远洋进口商成交，将湘省的铋、钨、铅、锌、锡等矿产品，销往海外。这是当时矿业界中较为突出的特点。

1923 年，先父与伙友在邵阳龙山天禄公司投资 4 万银元，成立协通公司。因矿区居于海拔千余米之山巅，燃煤须从蓝田运进安化县境，路远，耗费多，成本高，乃在山麓杨家滩镇，建设炼铋分厂，将高品位的铋矿石运到分厂炼成销售。这些计划设施虽逐渐建成，但未能得到有效利用。主要由于采矿的主坑掘进工程艰巨。经 10 年时间，直至先父 1935 年逝世时，还未完成主坑道穿通任务。建国后，此矿经主管部门进一步勘测，发现有黄金与硫化铋共生，因而暂予封山，以备大规模开采。

1933年初，又决定独资开办湘潭昭潭煤矿公司，以开采该县潭家山烟煤，此矿煤质甚好，固定炭素及挥发物均优于湘乡洪山殿所产，而灰份及含硫量均低，适合于炼焦。根据地质勘测，矿床系倾斜——向斜层结构。每一倾斜向斜两层各有内、中、外三层煤槽，每层叠煤厚度约为3至5米。如按最佳设计方案，应在倾斜与向斜相结合中心开一竖井，以贯穿三个隔叠层地质深处，然后将倾斜与向斜各个煤层向地面反回开掘采煤坑道，利用地心重力作用，使各煤层的采集自然下落到地下竖井中心煤场，然后再用垂直转扬机通过竖井装吊输送至地面。但这一方案基建投资约需10万银元，非先父财力所能及的。他只能首先采用耗资不多的开采工程。于是，即确定在矿区牛形山麓以20余度倾斜度向内槽层掘一坑道。据执中后来亲自考察，大约坑道只掘进30米，即进入煤层。随即与此坑道相距15米另掘进一平行坑道，然后互相联通以利通风，继续掘进。这一对坑道终于向前掘进约200米，而逐日将坑道煤层全部运到地面。但由于坑道不是通过岩层，而是在煤层之中，为采掘带来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出现了坑道两维空间上下左右向坑道挤压，造成塌方危险。须用树杆作成井字形支架撑持，同时不可能使坑道按同一倾斜角度，成直线向前掘进，从而形成一条不规则的歪曲矿道。不能在坑道内铺设铁轨，以利用机械化吊车运出原煤。这是该矿在当时不能创效益的缘故之一。其次，该矿在明朝期间，即被民间开采，遗留老矿窿不少，矿下集水甚深，在掘进中，遇到老窿，整个坑道被淹没，虽有蒸汽泵抽出积水，但影响了开采进度并增加了成本。再次，从矿区到公路约3公里，到湘江边约22公里，当时限于财力，未能接通公路，煤采出后，雇工承运至湘江边易俗河镇，每吨耗运费2元，增加了销售成本，先父为此矿几乎动用了毕生全部积蓄，还负债10余万元。先父逝世时，执中正在大学肄业3年，为了继承父志，

维持此矿继续经营，协助我母清理先父生前债务，不得已辍学，去昭潭矿山襄理后继主办人工作两年，有幸陪同丁文江、谢家荣两地质学家到矿考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此矿即移交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接办。我向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孙越琦、黄兆煊等人办理移交，以煤产供抗战需要。

经营其他工商业

湖南盛产稻谷，素有鱼米之乡之称，先父早在湖南银行行长任内，即为银行投资经营稻谷购销。1917年复与浏阳熊绍南合伙在长沙市朝阳巷开办高廩栈，经营稻谷、杂粮的购销、仓储、碾米业务。1925年，购置了一套柴油动力机及碾米机械，是本市最早用机械替代人工碾米的企业。这一合伙企业投资只数千银元，先父与熊绍南各占一半，通过逐年滚存积累，至1935年，先父弃养时，我家拆伙分配投资本息，计得约8万银元，得以偿清先父生前办矿的部份债务。高廩栈以作风稳重闻名于同业之间，它还寓社会福利于经营业务之中，每值年终或自然灾害之年，常无偿散发义赈于社会，以赈济和缓解贫民之忧。盛暑季节则向码头装卸工友赠送十滴水、仁丹等物以防中暑，从而赢得广泛的信誉。

1912年先父与友人合资创办麓山玻璃公司于南郊，延聘日本技师数人来厂，引进了熔融石英砂的八卦坩锅炉设备及吹制玻璃制品的工艺。这是我省最早的玻璃工业基地。以生产煤油灯座、灯罩为大宗，供应当时市面改用洋油（煤油）照明之需。宝山玻璃公司即是继承麓山公司发展起来的。

1918年，又与市商会左宗澍等人合伙创办光华电灯公司于沿河大道草河地段。有250瓩的发电设备和相应的蒸汽锅炉，与湖南电灯公司以今中山路为界，分供南北城市用户照明用电。1927年，光华因政局影响停办。

1920年，与友人伍某合伙创办耀华教育文具用品公司，在郊区朱家花园邻近，购地十余亩，设立文具制造工场，生产学生教学用具如三角板、米突尺等产品，并购置机械设备仿造日本进口的学生用具。又在市内南阳街购置三个铺面，修建一大营业间。开办仅一年，即因营业不振，伙友意见不一致而停办。拆伙时，先父分得南阳街房屋及从日本购来的大量动植物标本以及彩色铅笔、粉笔、橡皮擦、石板、石笔等物。除将标本捐赠给隐储学校外，又开设启新商店推销积压存货，结果得不偿失。

先父人品端重，深受社会各方器重，1919年，倡议购置一艘汽轮船行驶由长江到上海航运，即得曾国藩、左宗棠之孙辈曾重伯、左菊荪等两人极力赞成，取船名“华运”，可载乘客200余人，统装货物约400吨。由先父在长沙负责，船上由左菊荪负责，上海由曾重伯负责。可惜先父与曾、左二人都不了解航运业务的复杂性，特别是上海，作为一个五方杂处的十里洋场。国内外航业界竞争激烈，当地黑社会青红帮垄断了船舶码头的停泊与装卸特权。当华运轮首航抵上海时，船驶入黄浦江后，因未事先洽妥停泊码头，只好先停在江心，随后交涉了可泊靠码头，殊不知其泊船地段，仅有一个刚好容纳该船长度的位置。而当靠拢码头一瞬间，船头刚好撞在前面一艘船的尾部，两船都有轻微撞伤，当本船打反车后退时，又撞翻一艘舢舨。船夫落水，虽得救，但已构成一海事纠纷。华运驾驶员被扭送入租界巡捕房关押，还将华运扣压索赔。据说，最后将华运卖给了上海帮的航运业，赔偿了海损，余款支付了航员工资，全部投资共5万银元，就这样赔光了。

1916年，投资与吴寿民等合伙办湘鄂印刷公司于长沙市织机街，备有凸凹板胶印机，独家承印精美印刷品。长沙历史上最早发行的《大公报》，即由湘鄂公司承印，为传播文化和信

息起了积极作用。抗日战争中，公司设备毁于战火。

1922年，与友人王少泉、王段生合伙开办北绘素楼照相馆于长沙药王街。延请上海技师，传授摄影与冲洗技术，备有摇头摄影机为众多集体摄影，这一些经营与技术均首创于北绘素楼。1938年文夕大火，该馆被焚毁结束。

1928年，与友人潘叔愚及魏乔年各出资2000银元，开设百合电影院于西牌楼青年会旧址，随后迁至中山路百货公司的后面，即今银宫电影院所在地。以放映国内外名片吸引观众，传播文化。

与友人曹典球、刘润湘合资2万银元，于1923年开设正大五金号于小西门河街。经营进口五金器材、水泥等。供应省内的工矿企业需要，历时五六年。其间所派生的福华印染厂，成为当时长沙市独家承染纺织品的工厂。后由于出现了亏损，先父将股金抽出退伙，由刘润湘继续经营。

先父与著名实业家范旭东是连襟，又同在日本留学。回国后虽异地不同功，却同具“实业救国”之志，故始终保持了联系。1915年，范氏创办久大精盐公司，1922年，办青岛永裕盐业公司，先父均出资出力。又为打开久大精盐市场，付出了心力。在久大精盐问世以前，政府仍沿用清朝的引岸制度，全部民食特别是湘、鄂、赣、皖、苏诸省食盐均属引岸范围。在湖南，通过先父及其他地方人士的努力，终于在长沙、湘潭、岳阳、常德等市县，取得了精盐销售权，并获批准设立分销经理处，打破了引岸垄断局面。这是当时盐政的一个革新。1932年，在久大股东大会上，先父被推选为公司监事会监事。范氏创办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原称永利制碱工业公司），先父首先介绍在纽约华昌贸易公司的李国钦与范相识。李国钦对永利在美国协助采购碱厂以及随后创办南京合成氨厂的设备、器材、原材料等均全力支持。又为永利觅聘专家、物色留美学生回国

到厂供职，在组织引进技术谈判和设备价款的商务谈判等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另一是1930年，永利纯碱进入湖南市场，缓解莫商卜内门的垄断，也是通过先父为之策划而取胜的。又一事例是范氏在1931至1933年期间，在争取举办合氨厂过程中，原拟将厂址设在株洲，我父鉴于谭家山煤矿煤质适合炼焦，可为合成氨提供水煤气的原料，毅然开办谭家山（昭潭）煤矿，为之配合。后来，永利合成氨厂（原称永利宁厂）在南京大厂镇现址开办，先父只得一人承担上述昭潭煤矿的沉重负担。

更有进者，1922年，北洋政府收回日本在青岛盐田，范氏以80万银元购得经营权，成立永裕盐业公司，曾力邀先父去青岛主持其事，但因在湖南的事业一时不能摆脱而辞。当北伐战争发展到长江流域，国民党政府设在武汉湘鄂两省的军需民食不可或缺的食盐，因淮盐运输受阻而感到威胁时，先父商得范氏同意，在汉口成立信孚盐业运销公司，将青岛永裕所产的盐直接租赁外轮经东海进入长江达武汉卸货，再转运湘鄂通商大邑。此举由先父先去汉口拜访老友谭延闿（当时任国民政府代主席），又通过原湘雅医学院院长颜福庆介绍往见财政部长宋子文，几经商讨，宋同意先预收100万银元的税款，允可将青岛的盐运武汉30万担。先父为信孚代筹巨款缴纳后，便陆续将永裕的盐源源运来销售，为迎接北伐胜利，接济军需民食作了贡献。但是半年之后，时局有新发展，汉口国民政府因财政收入不敷出，大量发行中国、交通两银行钞票，超过了发行准备金，市面发生挤兑风波。信孚终受钞票贬值的影响而停业。所幸已运销的盐价收入已将预垫款收回。先父在汉口交清手续后，仍然回长沙经理其自身业务。

两度任职湖南第一纺织厂

湖南第一纺织厂是民国以来湘省公营企业中成立较早、规

模较大的企业。它创办于民国初年，一度由于经费不济，曾招商经营，1929年秋，省建设厅委任彭鼎芬（斟稚）任厂长，原会计主任鄢菊亭辞不继任。鄢在职期间，厂已有积累约七八十万银元，他力主先父接替他，以免积累散失，后由当局发表，先父出任该厂会计主任。根据国民政府主计制度，规定该厂会计主任与厂长平级，以示会计相对独立，不受厂长领导，以期互相牵制。先父到任后，协同彭厂长将该厂3万纱锭规模扩充到5万纱锭，又添置500台织布机，使之由单纺纱进而既纺又兼织，配套成龙，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工厂职工由1000余人增至2000余人。先父在厂一年余，深得社会舆论与工人群众好感，但却不能为贪官污吏所容，彭厂长被免职，先父坚持与彭同进退而辞去。1931年夏，省建设厅长易人，纺织厂经一年余上下摧残，又出现了负债亏损局面。新任厅长谭常恺商请先父再作冯妇，先父提出须彭斟稚任厂长，才允考虑复任该厂会计主任。彭氏与先父再度联袂分别出任该厂原职务。当时，厂的营运资金枯竭，且负债颇多。先父利用他个人在银行与钱庄的信誉，前后借得300余万元，作为周转资金。当年，长江、黄河流域洪水成灾，河南、湖北等省产棉区，尽成泽国，先父率领工务科长任理卿工程师去上海，亲自采购美棉花运回，以供生产需要，终使此厂得以复苏。1933年春，彭斟稚厂长病逝。省当局任命先父为厂长，另派人接替了会计主任。及至1935年春，先父因心脏病加剧而辞职，改由范新度继任厂长，先父任厂长期间，由于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持续波及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为了维持第一纺织厂的纱、布继续生产，先父建议成立省纱布交易管理所，凡外省或外国进入湘省的纱布，均课征一定的地方税，以保护本省这唯一的纺织厂，经得住竞相降价出售产品的危机，终于使该厂维持了再生产经营，度过了难关。

支持教育和其他社会事业

先父除毕生从事经济事业之外，对教育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也显露了他的高度热忱。他认识到发展经济，振兴实业，要靠人才，要发展教育。

1914年春，由在湘与旅京人士35人发起组织湖南育群学会，推举当时总统府顾问，我的堂叔章谔骏为会长。根据湖南医学院（今湖南医科大学）院史资料第一集所载：“湖南育群学会代表湖南省政府出面与美国雅礼会合作，于1914年7月21日签订了联合创办一所西式医科大学——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由育群学会和美国雅礼会各举10人，成立董事部，再由董事部推荐7人组成干事部”。9月选举先父为湘雅医学院董事部部长兼干事部部长。在连续任职期间，结识该医学院院长颜福庆和医院院长胡美（美国人），曾协助历届院长筹集学院部分办学经费，使该学院保持了“高标准”，“严要求”的治学精神，为国家造就了不少优秀的医务人才。

先父出任湘雅医学院董事之后，又与西医界陈怀皋、何芷姜等医师相结识，支持陈怀皋联合地方士绅，在接管红十字会医院基础上，创办仁术医院（即今省人民医院），先父一次乐捐200个床位的设备投资。何芷姜所主办的省立公医院（即今市立一医院）也得到先父参与策划与财力支援。这两所医院为维护长沙市及邻县人民的健康作了重大贡献。

先父支持胡元倬办明德学堂，曾一次无偿提供大米百担，缓解学校燃眉之急。楚怡学校是著名教育家陈润霖所创办，也是我们兄弟的发蒙学校。先父曾捐款楚怡工业学校一次购置200张高低双层铁床，作为学生寄宿之用。先父还为修业学校捐赠数千元，作为修建校舍之用。他捐赠最多的是长沙县东乡距市区120华里福临区开慧乡的私立隐储女校，该校是最早开办的

湖南私立女子学校，由我外祖母许黄萱祐毁家兴办的。解放后，学校更名为县立中学并迁他址。先父除曾捐赠图书、仪器、动植物标本外，每遇学校发生断炊之虞，常解囊相助。为了扩大校舍，还将东乡安沙夏湾的私有房屋一栋数十间，一次捐赠隐储，支持外祖母开办隐储分校。上述明德、楚怡、修业及隐储等校均聘先父出任学校董事。

先父自1914年进入华昌炼铋公司任职时起，曾先后担任湖南省矿业公会常任理事。1932年，邵阳、新邵、安化、溆浦、沅陵、湘乡、益阳、东安、郴县、桂阳等十县成立铋业同业公会，推举先父出任公会理事长。从1914年至1935年，曾参与长沙市总商会某些重要决策会议，一度被推举为长沙总商会会董。还多次担任过义仓平糶的管理工作。先父还出任熊希龄所主持的华洋义赈会及保育堂等慈善机关或团体理事，受聘担任长沙基督教青年会董事。为募捐及吸收会员出钱出力。

生活情趣与生命息止

先父一生勤俭，严于律己，平生与人合伙经营或主办公营企事业，廉洁奉公，一丝不苟。他不仅没有做过损公肥私的事，就是社会上所习以为常的佣金与回扣的收益，均予以拒绝。例如：1931年，他出任第一纺织厂会计主任，到上海采购进口美棉时，该美安洋行在成交后一次付佣金8000银元，他将此款移作偿付的货价款，赢得当时舆论的赞扬，因而也受到美商洋行的尊敬。

先父一生谦虚谨慎，干实事，不尚空谈，厌恶阿谀奉承、趋炎附势，且乐于助人。如1927年马日事变发生后，他得知隐储女校教员曾出任长沙县农民协会委员长的中共党员余俊武（西近）出走时缺乏川资，便一次赠送两百银元，使余脱离虎口。解放初，余任解放军某炮兵旅长，返长沙探亲与执中相见时，

谈及此事,才为人所知。至于经常资助戚友子弟缴纳学费,犹其余事。先父个人生活简朴,无任何不良习嗜、不纳妾、不置田,身后仅有东茅街住宅一所,亦不幸毁于抗日战火,一生矢志实业救国,几乎将其全部精力用于他所追求的事业上。在公余晚餐之后,除与来访者与家人对话以外,一般即伏案看书读报。他常阅读报刊有本地的报纸外,还有上海《申报》、天津《大公报》、日本《朝日新闻》,刊物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为主,从这些报刊所传递讯息供他在经营事业中决策参考。因此,他在思想上并不固执、僵化,不断追求新知识,而且胸襟豁达,处事公正,待人谦和,常为友人家庭纠纷排忧解难,做“和事老”。以致在亲友中享有相当声望。他患心脏病多年,但仍勉强支持了纺织厂长工作重任。同时还处理自营的铋、钨、煤矿业的经营管理工作。特别由于独资经营煤矿,深受资金周转不灵的困扰。为了应付急需,将所有的有限积蓄和房地产变卖以为挹注,企图度过难关,但终无济于事。他在重病、负债的双重压力下,于1935年5月溘然长逝,终年57岁。

记青年企业家发明家朱培立

江立仁*

在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集企业家、发明家和工程师、律师于一身的人恐怕不多，在青年人中就更难找了，但朱培立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湖南湘潭人，生于1953年5月，曾于1969年3月上山下乡，1978年9月到湘潭市塑料五厂当机修工。不久，任车间主任，厂工会主席，党支部委员。1983年10月考入湖南省第二轻工业学校进修企业管理专业；同时参加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闭卷考试学习，成绩优秀。1986年7月毕业后任湘潭市布鞋厂厂长，1987年7月任湘潭市塑料工业公司经理和党委书记；同时兼任湘潭市塑化机电技术研究所所长，系湖南省塑料工程学会理事、科技和技协成员。他曾先后被评为湘潭市“活雷锋”、湖南省劳动模范和特等功荣立者、轻工部科技先锋、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朱培立既是一位杰出的企业家，名列《湖南当代企业家辞典》、《中国经济强人辞典》；又是一位著名的发明家，《中国现代发明》等手册上介绍了他参加首届、第三届全国发明展览会和八八年国际发明展览会的项目；还是一位优秀律师。

1982年朱培立在湘潭市塑料五厂时，就带头打破大锅饭，实行承包，使企业经济效益增长数倍；改革开放的1986年又要求到濒临倒闭的湘潭市布鞋厂任厂长，几个月就使企业摆脱了

*江立仁系湘潭市文协副主席、《南湖》文学杂志主编。

困境，一举扭亏为盈，因此评为全省轻工系统优秀厂长，继而又冲破重重阻力，大胆改革，带头领导湘潭市塑料工业公司将原来的行政性管理机构转为经济实体组织，使公司成为了一个十分兴旺的集经营、生产、科研、服务四位一体的全民所有制中型企业，取得了极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全方位的改革探索了经验。湘潭市人民政府给予他记大功并晋升一级工资的奖励。朱培立还刻苦钻研科学技术，1985年以来，他发明了十四项科研成果，其中七项填补了国内空白，五项获专利权，六项分别在国家及省、市获奖。他发明的《微型多功能节电无级调压开关》参加了1988年国际发明展览会，还有《三相电动机通用断相保安器》与《自通式内部电话》分别参加全省首届第二届发明展览会。

朱培立近几年来还受湘潭市司法局湘江区法律顾问处的指派和有关单位聘请，担任了七个企业的常年法律顾问，参与了数十个案子的诉讼活动，为法人和公民提供了有力的法律帮助，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88年《雨湖》文学杂志第二期所发表的报告文学《第800个人生》，全面地描写他悉心注视人类生存智慧的发展趋势，努力撷取现代生存的新文化、新价值、新姿态，成为一个多值追求者。该文被收入在光明日报出版社为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报告文学丛书《群星璀璨》之中，

长沙大盛绸庄的生意经

省市民建工商联

大盛绸庄，为过去长沙市绸布行业中，资金较为雄厚，营业亦称鼎盛的呢绒绸布商号，创设于1921年，其时股东30余人，集资银元8万元，由钱炳卿任经理，李溪亭、罗宪章任副经理。1928年因股东异动，重新组合，改为福记大盛，股东40余人，资本仍为银元8万元，另吸收社会闲散资金4万元，合为12万元，由李溪亭任经理，魏韵篁任副经理，在职股东及职工人数达到80人，最多时达140人，年平均营业额在120万至300万元。1938年文夕大火，全店精华，付之一炬。

火后，长沙元气大伤，市场冷落，原大盛的股东及职工，多分营小型批发业务，以维生计。1947年由魏韵篁、李笃斋等在大盛旧址重建铺屋，合营大信绸布门市店，原大盛的发起人李溪亭、肖桂初等均入股，遂又恢复大盛牌名，是为兴记大盛，于1951年10月响应人民政府号召，投入公私合营长沙企业公司，1954年12月再转入建湘企业公司。

大盛绸庄，在建国前，虽经两度易股改组，但始终保持着活力，因该店有一个事业心较强，经验丰富，既分工而又合作团结的经理班子。他们首先注意对店中劳动力及业务人才的合理组合与着意培养，储才备用；其次对业务来源的门市顾客、批发往来户采取了较为诚实的经营方法，积蓄和扩大了企业的利润。在管理方面，更有一套在经营中逐步完善行之有效而又能严格执行的各项规章制度。该店地处繁华的八角亭，备货齐

全，货真价实，对顾客热情接待亦起了重要作用。

注意信息 以销定购

大盛基本上是以销定购。首先根据批发经营所了解的初级市场情况及门市部营业员各自拥有的基本顾客的购货需求，其次是按实际销售情况，结合历史资料和市面存货以及店中资金运营情况，制定“人弃我取，人多存我少进”的原则。大盛主要从上海进货，占全部进货量70%以上，以机织棉布为大宗，呢绒、绸、绫次之。汉口为华中商品集散之地，与长沙相距较近，当上海来货缓不济急时，即从汉口购进，因汉口产品，如本厂线呢、粗布约纱等亦为长沙的适销商品。在本省采购的货物仅为土布及麻纺织品，占进货量的10%左右。

上海既为其主要的进货地区，又为全国金融贸易中心。上海商情的变化，对各地均有一定的影响，故大盛派得力人员赴沪设庄，名曰申庄，既负责采购货物，又提供商品信息。大盛还规定驻申人员经常以书信、电报与店中联系，还规定驻沪人员每年回两次长沙，汇报行情并到货房仓库查询存货情况。批发处、门市部负责人应向驻沪人员介绍各货走销畅滞、利润厚薄情况，并提出建议为采购人员回沪进货之参考。至于负责在其他各地和本市进货的人员，都应在进货之前充分了解库存和市面销售以及同行、地区之间的一些进、销情况，以避免盲目进货造成“背盘”“积压”。

大盛在组织货源时，即每年于春节前办夏季货，端午后办秋冬季货，这样较好地适应了本市及部份外县消费者的要求。大盛审时度势，对于进货一般原则是淡季定货，旺季运销，将销时猛进，旺销时少进，销路步落时停进，货价将涨时进足，已涨时不进，货价下落时少进或不进，候落到槽或小回头时再进。

货真价实 珍视商誉

珍视商誉，货真价实，备货齐全，接待热情，服务周到，态度诚恳，专人经手，分地包干，这是大盛绸庄在销售业务方面取得发展的要诀。

大盛批零兼营，零售是以本市居民和四乡农民为主。大盛对门市零售注意商品的品种和花色的配备，务求齐全，以满足不同顾客的不同要求。对顾客不分生意大小，成交与否，都是和颜悦色，“百拿不厌，百问不厌”，迎进送出。对经常往来的顾客，固定专人接待，经常联系，建立信任，适当进言，代为“参谋”（俗称蓄主顾）。

营业人员对顾客不仅在态度上必须诚恳，而且在可能的范围内还要帮助顾客解决困难，如顾客买错了货要求调换，或者买去的货发现毛病，要求退换，只要顾客提出理由，经手的营业员应根据顾客意见，经营业主任认可，予以解决。为联络顾客感情，对往来大户的婚丧嫁娶，由经手人员前去应酬，送礼费用，由店开支。

大盛对门市营业人员的衣着仪表亦甚注意，如热天不准赤膊、赤脚，不准穿短裤拖鞋并督促勤理发、勤刮胡须，仪表衣着保持整洁，对顾客彬彬有礼，形成了一种具有大盛特色的文明礼貌之风，时人誉之曰“盛派”。

至于批发业务，大盛一贯与门市并重，其批发地区遍及湖南全省，而以湘东生意为最，湘中、湘西次之。外省如江西之萍乡、莲花，广西之桂林，贵州之铜仁、镇远等市县亦有批发往来，最高时年达营业额银元200万左右。

大盛经营批发业务，是按地区固定专人分管，叫批发经手，所有接待、谈盘、清货、分包堆码、包成、发运，均由分管的批发经手包干负责办理，例如接待初来新户，视对象大小，

大户由批发部主任接洽，一般户按地区由该管批发经手接待洽谈，老往来户，原已有批发经手，进店后彼此自动招呼，稍事寒暄即谈盘看货，各路批发户在长沙住宿常有一定地址，批发经手须往作礼节性拜访，往往于拜访之时即洽谈业务。

在大盛批发的往来户中，大致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资金殷实，现金买卖，即使赊购，货款到期即付，对此类型，货要削利，批价较低；另一类是资本不多，靠大盛上架子，买货赊购而且货款到期，不能一次付清，货物由批发经手作价，还可以酌量搭配滞销货。大盛对此两类往来户分别对待，对前者多备硬货（畅销货），并以稍低于市面一般价格批售，俟取得信用，再建立赊销关系，争取全面往来，对其来信添货，优先十足发给，在作价方面始终考虑平稳薄利以巩固往来关系。

对于后一类往来户，根据来单配货，少去名牌硬货，配搭花色货，硬货根据市面行情作价，花色货酌量提价，但应考虑到对方有利可得，对其来信添货，看架面程度，酌量减发部分，当旺季大批进货时适量搭去一部分滞销货，总的原则是，要让对方有利可图而能继续营业维持其一定的经营能力。

大盛与批发往来户的联络，除书信往来外，还由批发经手抽闲分赴各管区催收货款，同时了解往来户的经济变化情况及商品销路与顾客需求，以利于店中综合各地情况，从中摸出购销规律，作为决定和修改营业大计的参考。

大盛不多注重登报宣传或张贴广告，而是以诚待客，热情周到，货真价实，如抛尺抹尾和必要的包退回换等，给顾客以实惠，使其对大盛信得过，于是顾客之间，亲串亲，友串友，彼此传播，无形中为大盛作宣传，扩大了影响，招来了顾客。其次采取独特的方式联络广大的劳动群众为之宣传，如暑天免费赠送解暑凉药，对患有肺病者赠送仙鹤草，药品包上都有“大盛绸庄赠送”字样，赠送对象并不限于现场顾客，门市索取，

无论何人，有求必应。

严格考核 待遇从优

大盛企业内部由经理向股东会负责全权处理店务，设副理一二人协理店中事务，经副理主要抓申庄（进货机构包括商品信息）、银钱房（财会）、批发处和门市部。这四个部门的负责人多是以在职股东中的骨干分子担任，或由经副理本人兼任，大盛对于各项人员的职务很少调动，使其能驾轻就熟，尽量发挥专业专长，同时注意培养副手，以储备后备力量。

大盛认为营业人员态度的好坏，与营业的兴衰至关重要，因此，对营业人员的考核极为严格。根据各人成绩好坏（包括拥有基本顾客若干，每月营业额的比较以及服务态度等等）由营业主任向经理室汇报，作为营业员年度和节关考绩的标准。成绩好的，按年增加工资；成绩最好的可提为红股股东；成绩不好就得不到晋级加薪，个别对顾客态度不好的，经理在年节讲话时指名批评甚至斥责以至辞退。

大盛对营业员的表现，在日常的营业中亦随时留意，如每当顾客进店，营业主任或在场人员都注意是否成交，倘生意未成，即询问接待的营业员，如答复理由不够充分，即认为“生意未成是言语不到”，或者是服务不好，接待欠周。又如顾客看货甚多，而购货甚少，顾客离店时营业主任即派人尾随，如顾客走进别家绸布店而又购货较多，营业主任便向原接待之营业员查询接待经过。于是“不轻易放走一笔生意”成为大盛绸庄全体营业员一致努力的目标。

营业员绝对不容许与顾客发生争执，即使顾客提出了无理要求亦须向顾客耐心解释，如稍有争吵，营业主任不问营业员的理由如何充分，总是抑制营业人员，因此营业员在进行业务时，不得不耐心接待，避免与顾客产生矛盾。大盛认为顾客是

企业的生命，是全体股东职工的“衣食父母”，经常告诫营业人员树立顾客至上的思想。

大盛对职工待遇从优，对工资、工伤病假和生活等均有具体规定。如职工工资一律以银元计，每月为15元至30元，在职股东工资（包括副理）36元至50元，分两次发给，一般不得预支，倘遇特殊事故，通过经理同意，可以预支一至二月，如在职股东超支在两个月以上，即转帐计息。每年在春节、端午、中秋三节各加发工资一个月。

职工例假，住城者每月3天，住乡者4天，凡超过了规定的，按天数扣发工资，休息未足例假天数的，补发工资，谓之余薪。遇婚、丧、疾病可以请假，短期只须向店中管人事的说明原因，如属长期须经经理同意，假期工资照扣，至于零星事假，不满一天者不扣工资，如逾假不归，按逾假时间扣发工资。

大盛每年都有盈余，按16.6成分配，股东红利占10成，职工按6.6成分红，经副理在6.6成中占20%，其余80%按全体职工工资总额分摊，得出各人应分数，再由经理按各人表现，酌予损益，如成绩突出者，另由经理批给特红或加工资以至提为红股股东，对于表现不好或违犯店规者，给予劝告，申斥以至开除，奖罚严明，无论亲疏，一视同仁。

由于大盛绸庄在经营管理上具有以上特点，因此成为长沙过去绸布行业中的佼佼者。

“精神”追踪录

——记改革大潮中的湖南制药厂及其经营之道

李秀方

当你步入湖南最大的制药企业——湖南制药厂的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迎门照壁上“艰苦奋斗，求新创优”八个大字，与其交相辉映的是两块镶嵌在左右门柱上的大理石奖牌，一是“湖南省级先进企业”，一是“湖南省质量管理奖”企业。“艰苦奋斗，求新创优”是该厂引为自豪的治厂精神，奖牌则标志着“精神”所结出的硕果。让我们沿着该厂的发展线索追踪一下该厂是怎样在“精神”推动下，从50年代走到了今天；在改革大潮中是如何发扬这种“精神”，取得了新的成就。

靠艰苦奋斗起家

1950年12月，在长沙市内一条小街上，出现了一家“药品制造所”，当时的26名“所员”就挤在一间租赁来的民房里，开始制造药品，那时的生产，确实是集简陋和原始于一室，品种也很单一，仅有针剂、片剂和“酏”、“膏”。压制药片，必须用手不停地摇动一台单头压片机；针剂的“灌装”，是靠注射器；针剂“封口”是用脚来回踏动一台现在谁也描绘不出模样的所谓“皮老虎封口器”。这就是湖南制药厂的前身。而如今已是占地27万余平方米，跻身于全国医药行业重点企业的大厂，主要就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该厂蜚声海内外的“拳头”产品——咖啡因，1953年刚投产时，是用茶叶作原

料,用一个大木桶用水浸泡,再用明火蒸煮,硬是从茶叶中提炼出了咖啡因,还荣幸地到莱比锡博览会上“亮相”。后来,由于茶叶供不应求,而且成本也比较高,为此,该厂职工又着手研究用化学合成方法生产咖啡因,通过工程技术人员的艰苦努力,在原料缺乏、设备不配套的情况下,用化学合成法生产出了咖啡因,又经过20余年的生产实践,数十次工艺改进,终于使咖啡因成了国际市场上的抢手货。因此,该厂职工对于艰苦创业的过去,总是津津乐道。因为,38年的建厂历程,在历史长河中,虽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对湖南制药厂的职工来说,都是踏着坚实的步伐,踩平自然的或人为的崎岖;跨越历史的或现实的沟坎才艰难地走过来的,对其创造的成果,当然也就倍感珍贵:

——由26名职工发展到2820名;

——由简陋的生产工具扩大到拥有2000余台各类制药设备;

——由单一制剂开发到能生产15种原料药和6种不同剂型的制剂210余种;

——到1988年已累计上缴国家利、税2亿余元,为国家同期投资总额的8倍多。

有人可能会说:50年代艰苦奋斗诚然可贵,但80年代,人们向往的是“全自动”、“流水线”,再提艰苦奋斗,就欠合时宜了。可是该厂领导和职工却牢记着他们的治厂精神,靠艰苦奋斗起家,也要靠艰苦奋斗发展。近两年来,在引进、移植、研制开发新产品时,就坚持“少花钱、多效益”的原则,引进国外“甲基多巴”生产技术就做到“货比三家”,委托上级有关部门联系了意大利、美国和西德三家公司,经过实地考察,多次接触、商谈,最后选中价格最低、技术最先进的美国一家公司成交。1988年3月,该厂在国内领先实验新型、高效灭菌剂戊二醛的全合成工业化生产,有人以为这个赚钱的“宠儿”定

是在一座现代化的新厂房里“临盆”，而实地一看，却是一栋多年闲置稍作整修的旧厂房，就连那80多台设备，有些也是厂内自行设计、制造或利用闲置设备修整翻新的。该厂的实践，生动地告诉我们：为了加快四化建设的步伐，资金要用在刀刃上，这样，在改革的大潮中，仍然要高高扬起“艰苦奋斗”的风帆，在“四化”征途中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从“求新”中奋起

药：只要有病就离不开，特别是新药，对症病人更是梦寐以求。湖南制药厂的领导对此感受尤深，1988年3月中旬，该厂的新产品消毒剂戊二醛一问世，在新华社发布消息后的15天内，就收到求购的来信两百多封，使他们对“求新”的重要性、紧迫性又增添了新的认识，想到的就不仅仅是企业本身的经济效益，而是看到一个新药问世，所产生的良好社会效益，当然，他们的这个想法，并非自今日始。1986年初，该厂就把“生产成效好，国外俏、国内缺”的新药，作为全厂的奋斗目标，而且，在实践中，也朝着这个目标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可是药品求新，谈何容易，它要求有多方位的信息源；它涉及到门类繁多的新技术、新工艺；它需要医疗单位的配合作临床验证；它要靠新闻媒介为其降生呐喊……

为开发新药，该厂千方百计寻觅信息，同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等八所医药研究机构建立了联系；同湖南医科大学等十余所高等院校的附属医院也有交往，及时地把新药研制信息，同医院临床用药的需求结合在一起，选出引进、研制的目标。为得到海外医药科研和生产的情报，厂技术图书室就订有40多种国外期刊，确定专人翻阅、摘录、汇总，为生产新药做基础准备。他们也走出去，厂长殷乾青就说过：“求新，闷在家里是求不到的，不走出去开阔眼界，连什么是新也搞不清楚。”因此，

厂领导先后出访美国、意大利、英国、法国、西德和香港地区进行考察，洽谈和技术验证。还接待了来自美国、荷兰、西德、日本及港澳地区的八家制药公司的专家和客商，并在珠海特区同丽珠制药公司共同开设“联营部”。这样走出去，使决策者及时了解国际医药工业技术的发展态势和国外新药的开发动向。

为开发新药，他们广集新人才，引进新设备。该厂近十年来，每年分配的大学生寥寥无几。1987年初，厂领导或亲自主门，或寄发专函同21所有对口专业的大专院校挂钩联系，反应企业渴求人才的心情，得到广泛支持，同年的8月底，就把38名应届大学毕业生迎进了厂门，1988年，又有40名大学生进厂。该厂领导对国际上先进制药机械也多方寻求，从西德引进的“水针多功能联动机组”，使有30多年历史的水针生产车间在设备上迈出了新的一步，这种能把五道工序联动完成的新设备，生产全过程都置于“层流”新技术的保护下，产品质量完全有保证。

新药问世，要使医生、患者认识它，使用它，就要借助新闻媒介为其鸣锣开道，该厂确也从实践中品出了甜头，当众多高血压患者为老一代降压药疗效不好而苦恼时，长沙街头竖起新一代降压药“甲基多巴片”的路牌广告，使其看到了新的希望。该厂还派出技术人员参加医药学术会议，从纯学术角度介绍新药的药理，了解医药临床使用的疗效，这样，对临床医生新药知识更新，改变患者用药结构，扩大销售市场有着明显的效果。

湖南制药厂的职工，为了人类的健康事业，奋力求新，从求新中奋起，取得了可喜成果。两年多的时间里，妥布霉素、维霉素、戊二醛等新一代原料药相继问世，降血压新药甲基多巴片，高效抗溃疡药“雷尼替丁”胶囊和抗菌素类药“磺苄青霉素钠”已进入医药商店的橱窗。他们在改革大潮推动下，寻

求新信息；广集新人才；引进新设备；开发新产品的全方位“求新”实践，生动地告诉人们：只有不断推出适销对路的新产品，企业才会生机勃勃。

靠“创优”扬名

企业靠什么扬名？要靠产品质量，而制药企业的产品质量，更是同人民健康以至生命息息相关，容不得半点假劣，湖南制药厂的职工是深明此理的。早在1980年，我国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尚处于初始阶段之际，当时的厂长和书记就领着一批人到重点车间试点，后来，就年复一年地在加强质量管理上下力气，一套质量保证体系，也在逐年充实、提高中形成。历任厂长都直接管质量，各级都有明确的质量责任制，全厂质检人员就占了职工总数的7%，他们如同“哨兵”在各工序“把关”、“守口”，对不合格的原材料敢于“挡驾”，不合格的半成品有权“拒收”，不合格的成品坚决制止出厂，有时，发生质量“官司”，上诉到厂领导，“胜诉”的总是质检部门，经济责任制的考核项目中，“质量”不仅举足轻重，而且拥有“否决权”。

为了确保产品质量，他们是舍得花钱的，矗立于厂区中央的四层化验大楼，引来兄弟药厂同行们的啧啧称羡；用外汇进口的“高效液相色谱仪”等“四大件”，系药品检测中的高、精、尖装备，也在全国同行中领先配齐。

有人以为，一套完整的体系，一批先进设备，一本规章制度就能保证产品质量，那是天真的想法。他们从实践中认识到：优质产品只能靠加强生产环节中的质量管理才能产生。关键是要提高人的质量意识和培养遵纪守法的观念。多年来，他们坚持质量意识教育，长流水、不断线。新工人进厂第一课，上岗头一件事都是讲“质量”，要求他们严格遵守《药品管理

法》、各个产品的《工艺规程》、原材料和成品的法定标准。生产的每个环节都要按章办事，不容许虎头蛇尾，我行我素。正是这样，该厂的质量信誉长盛不衰、扬名于国内外，日本八代制药厂董事渡边先生来湘考察时就说过：“日本对质量要求很严，进口原料都要再加工，而湖南制药厂的“咖啡因”能省去加工可直接制剂。”多年来，该厂出口产品从未发生过“口岸退货”、“外商索赔”的事。原料药咖啡因、磺胺嘧啶分别获得国家质量金、银质奖后，始终保持着金、银牌本色，还有13个产品分别得到部、省优称号。该厂还是连续8年的长沙市质量管理先进企业，1987年又荣获湖南省质量管理奖企业。该厂产品经得起抽查，从1986年至1988年，国家和省两级药品监督机构，共抽查该厂104个品种322个批号都全部合格。

湖南制药厂靠“创优”扬了名；靠“创优”得到客户好评、外商信赖、海关免检，当然，也靠“创优”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就拿1986年至1988年三年来看，确实是一年一变，逐年跨越了三个高度。实行经营承包前的1985年实现利税768.52万元；1986年增加到909.87万元；1987年又增加到983.74万元；1988年突破了千万元大关，达到1367.12万元。这一串闪光的数字，标志着该厂“艰苦奋斗、求新创优”精神的升华。也使该厂迈上了“省级先进企业”的新台阶。

湖南制药厂的职工在新的一年里，将深化内部改革，增强企业内劲，挖掘内部潜力，争取实现：“一发”（把余热发电搞上去）“二调”（调整产品结构、调整科室机构）“三改”（改造好锅炉、磺胺嘧啶、氨茶硷）“四上”（开发甲基多巴、安布霉素、枸橼钾、小诺霉素四个新产品）“五降”（降低原材料消耗、降低能耗、降低成本、降低费用、降低计划外用工数）。使艰苦奋斗、求新创优的治厂精神，在改革的大潮中，更加发扬光大。

建国前的湖南电信业

王 钧*

我国电信事业，创设于1879年（清光绪五年），当时清政府直属总督李鸿章鉴于南北洋军务紧要，奏准清廷架设自大沽北塘海口起至天津卫的第一条电报线路，试通军报。次年又奏准架设津沪电报线路，自天津起经大沽口、济宁、清江浦、镇江、苏州而至上海，并在沿线各地设局，于1881年（光绪七年）12月28日竣工，收发电报，公开营业，是为我国有线电报服务的开端，嗣后即以此日为电信纪念日。

湖南的电信事业，始于1896年，由于地方封建割据，发展是不平衡的，主要分成两大类：一是属于中央政府交通部领导的省电信管理局。首先设立湖南省电政监督处，继而改为湖南省电政管理局，最后改为湖南省电信管理局，掌管湖南隶属于中央的各市县镇电信机构。各市县都设有电报局，后改为电信局。一是属湘省府建设厅领导的省电务局。最初成立湖南省长途电话局，继而改为湖南省电信局，后又改为湖南省电务局，统辖全省地方电信，并在各市县镇设立电务局，这是建国前湖南电信事业的大概情况。现分述如下：

一、属于中央政府交通部的湖南电信业

（一）有线电报。湖南创办电报业务，始于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当时业已成立鄂湘区电政管理局，局址设在武昌，并由武昌至长沙架设长达448公里的电报杆线，即在长沙设

* 王钧建国前曾担任长沙电信局局长。

立长沙电报局，局址设南正街(今黄兴路)收发官商电报，是为湖南电报设局营业之始。其后由长沙展线设局，逐渐推广，遍及全省。至1932年共有电报局及支局47处，职员330人，工人266人。1934年共有电报局、支局及营业处55处，1943年共有电报局、支局、收发处及代办处85处。

(二) 市内电话。长沙市内电话，创办于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6月，湖南巡抚端方令在抚署左右立杆挂线，安装电话，后渐推广于重要文武衙门和各局，但对外不营业。1911年(宣统三年)巡抚余诚格令在署内装置磁石式100门总机3部，雇佣值机员数人为官方交换通话。

1912年湘督谭延闿委派顾问曹耀材为长沙电话局局长，并将署内所装总机移装置前玄帝宫内，成立长沙电话局，开始对外营业，由都督府直接管理。曹某为扩充市内电话起见，与长沙德商瑞记洋行签订合同，采购西方电气公司共电式总机1000门和单机若干部以及电缆和一切工程设备，由该公司派工程师来湘安装，完工后，即由该局派员负责维护，并开放通话，每月向用户征收租机费银洋7元。

1927年长沙电话局划归湖南省建设厅直接领导，其后中央政府交通部以电话系属国营事业，应收归部办，曾向湘省府交涉多年，均未得结果。惟该局总机和地下电缆因使用日久，障碍丛生，此修彼坏，通话困难，因此用户纷纷责难，湘省府以工程浩大，经费支绌，无法筹措，于1935年决定移归部办。交通部当即派湖南省电政管理局局长黄仁浩、长途电话管理员潘克涵，省府派长沙电话局局长胡荫槐、建设厅技正徐刚为部省双方估价委员。经双方估价、付款后，于1936年1月1日办理接交手续，交通部派湖南省电政管理局长途电话管理员潘克涵正式接收，并奉交通部令将原省电话局改称为交通部长沙电话局，仍派原任胡荫槐为局长，职工薪级由部重新核定，其他一

切章则悉按部章规定办理。

1938年1月1日该电话局奉令合并于湖南省电政管理局，原有局名取消，改为市话课，负责办理一切市话事项。

(三) 无线电台。我国无线电报，发轫于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袁世凯为北洋大臣时，在天津筹设无线电学校，聘请意国海军少佐葛拉司训练人材，为装设电台之准备。嗣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因吴淞至崇明岛海底电线毁损，乃在各处装设无线电台，收发官军电报，是为我国无线电报服务社会之始。

1929年10月交通部派工程师尹天保筹设长沙无线电台，至12月正式成立，名为“交通部长沙无线电台”，台址设在青石桥（即解放路），收发官商电报，工程师由交通部委派，工务、报务、业务、会计、事务等人员，则由交通部电政司派充。1935年4月，交通部将该台归并到长沙电报局，组成无线电报房。

(四) 长途电话。我国长途电话萌芽于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即从收回丹麦人璞尔生从天津租界经北塘、塘沽至北京私自架设营业的长途电话线开始发端。

1933年，交通部湖南省电政管理局以湘省办的长途电话业务发达，为挽回利权与之竞争，利用拍报间隔时间，开放本省各地长途电话，每次通话时间为5分钟，后因设备简陋，音量太差，当时业务不甚发达。同年交通部成立苏、浙、皖、冀、鲁、豫、湘、鄂、赣9省长途电话工程处，并派工程队先后来湘架设长汉、长筑、长赣、长衡、衡郴、衡桂等长途电话线路，至此交通部办的长途电话通信设施初具规模。自1936年湘省以长沙为中心，与省内较大城市相装开办长途电话业务，并与鄂、黔、赣、粤、桂、蜀等省衔接通话。

(五) 管理机构的变动。湖南省各电报局原隶属于鄂湘区电政管理局，1916年该区电管局奉令撤销，分设各省电政监督处。湖南电政监督处于同年成立，由长沙一等电报局兼任监

督。1927年全国电政监督处裁撤，分别成立各省电政管理局。

湖南省电政管理局于1928年成立，局长由交通部简任，各地电报局局长由交通部委派，各支局主任由省管理局长遴员派充，报部备案。约在1920年至1931年之间，湖南电政多为地方军政机关所控制，如全省电政监督或管理局长，大都由他们直接委派或保荐，报交通部加委。1936年以后，湖南省电政管理局机构继有变迁。是年省电管局兼办当地业务，长沙电报局撤销，在管理局报务课下设置有线、营业两股，经办长沙市的业务。1938年11月发生文夕大火，管理局搬迁沅陵，并在衡阳成立省电管局湘南办事处。1939年省电管局由沅陵迁衡阳，湘南办事处撤销，另在芷江成立湘西办事处，1940年该处又奉令撤销。1944年日军侵入长沙，衡阳省电管局撤至芷江，于7月15日正式复局办公，并奉令改为湖南省电信管理局，各地电报局亦改称电信局。1945年1月1日，交通部第三区电信管理局在贵阳成立，管理鄂、湘、黔、桂等省未沦陷地区的电信局。同日芷江省电管局撤销，改为结束办事处，归贵阳第三区电管局管辖。同年5月10日，另成立交通部派驻第四方面军电信联络专员办公处于芷江，管理辖区内有关军事的电信事项，仍受贵阳第三区电管局管辖。6月5日结束办事处撤销。日军投降后的9月中旬，该专员处移长，办理恢复前方及湖南全省通信和接收敌伪通讯物资等事项。长沙电信局亦同时恢复。1946年2月专员处撤销，湘省电信归汉口第三区电信管理局统辖。9月奉第三区电管局令，指定长沙、常德、沅陵及衡阳等四局为湘省电信中心指挥局，办理当地业务。

（六）收支盈亏概况。1913年至1916年湖南全省共有35个电报局所，每月电报营收共约3.2万余元，除开支外，尚可盈利万余元左右，所以每年必须报解交通部10万多元。

其后军阀连年混战，南来北往，湘省首当其冲，从而作为

通信命脉的电政，亦多为地方军政当局所控制。凡局长任免、电款盈亏等事项，交通部无权过问，也无法过问。而当时湘省电政当局亦多存五日京兆之心，对于军政机关任意拖欠官军报费，毫不关心。同时各地商业萧条，商电锐减，以致电报营业收入一落千丈，昔日盈余一变而为亏累。除长沙、常德等局稍有盘余外，其他各局收支多不能相抵，虽可由常德等局设法调拨，但亦不能按月拨足，因此员工薪津，亦就不能按月发足。

（七）国民政府对电信事业的控制。国民党政府为了巩固其统治，对于全国交通系统（路、电、邮、航）尤其是邮电系统加以控制。如：派员驻局检查电报。凡电局所收的来去转官商各报，必须先送驻局检查员检查盖章后，方可放行。电文稍有涉及政治或言论进步的均认为有共党嫌疑，除将其电报扣留不发外，并呈报上级调查处理。这些检查员有的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派，有的是地方政府机关或驻军所派，其平日检查电报甚为认真。尤其是解放前夕，检查员驻局轮流值班，一刻不离岗位。又如：进行调员受训。自1935年下半年起，交通部在全国交通系统中，选调年轻干部往江西庐山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受训，分学科、术科，其内容有军事训练、军事知识等。六个月半业后每人发给蒋介石赠的佩剑和照片，仍派回原单位工作，俟有机会即予重用。当时长沙等电信局曾先后被调去数批，共约10余人。再如派员进入电信系统。约在1936年交通部曾派军事交通研究所毕业人员余某和李某两人来长沙电报局实习，他们号称为二等报务员，实际上他们的理论、技术都相差很远。究竟他们来长沙电报局搞些什么？就无从知道了。此外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最后还向外招收了一批学生，训练3年，毕业后即分发路、电、邮、航各界工作。1941年在衡阳湘电管局充任材料股长的余某和在常德机务站任机务员的岳某都是该班毕业的。

(八) 电报工会的成立及其活动。1926 年北伐节节胜利，当时全国加入工会的工人，已达280 万人，至马日事变前夕，湖南全省有组织的工人已达40万人，仅长沙一处即有 130 个工会，湖南省电报工会亦是这个时候成立的。是年10月在全省总工会领导下，成立了湖南全省电报工会筹备处，随即成立各地电报工会支部，设书记干事等职，所有电报局职工，一律加入为会员。局长、领班等主管人员亦可以加入，惟只有选举权，而无被选举权。当时全省计有电报工会会员约800 余人。于是召开湖南省电报工会代表大会，各电报局到会代表共计40 余人。开幕时省总工会亦派员参加。大会主持人为朱炜，他首先报告筹备经过，继由代表们踊跃发言，都说：这次成立电报工会，一定要发扬民主，为多数人谋福利，不要成为少数人的工具。会议历时 10 天，通过了会章，讨论了提案，颁发了“发扬民主共谋福利”八字的纪念章和镰刀斧头式的会员证，选举了马瑛、朱莹、朱炜、朱镇耀、陈之楷、李藩、李觉非、李昌涛、王振培、丁良桢、黄康侯、敖明枢、邓嵩、姚学余、屈毅等 15 人为执行委员，吴明山、陈锦章、陈展等为候补执行委员，并公推马瑛为委员长。最后省总工会委员长郭亮也到会讲了话，分析了赤色国际和黄色国际的区别，以及革命是曲线发展不断前进的，必须坚定斗志，采取联合战线奋斗到底，并指出了工人运动的努力方向。当时省电报工会就加强了集体领导，明确分工负责，进一步分清敌我，提高阶级觉悟，整齐步伐，向着反帝反封建和反官僚军阀、土豪劣绅的压迫剥削的总目标前进。同时群众情绪无比高涨，省电报工会即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如逼走无能电政主管刘梁，监督局方财政，统一收支，厉行节约，反对军阀干涉电政，选贤任能，合理地重核职工等级，要求局方不得无故调动工会负责人员，以及撤查不法渎职的各电报局局长等，

例如衡阳局罗敏，道县局程茂林，常德局董作澄，邵阳局袁增、王进、平江局温某，南县局李某等。这些人有的是贪污舞弊，侵吞公款，有的是压迫职工欠薪不发，甚至还有个别霸占职工妻室等严重罪行，经工会派执委李觉非、汪振培等分别前往查明属实，即洽商行政方面，予以撤职法办。这对历年来屈服于作威作福的电政人员恶势力下的职工们来说，可谓扬眉吐气，大快人心。不料长沙突于马日发生反革命叛变，省市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及一切革命和进步的组织均被反动军阀，许克祥派军队分途袭击，捕杀共产党员及工农革命群众。因此各行业工会被迫纷纷解散，从此湖南电报工运不得不随着革命低潮的到来而告终。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约在1946年2月）重庆成都的电信职工，鉴于经历了多年的困苦生活，迫切要求电信当局改善生活待遇，因为当时国民党当局不但不改善职工生活待遇，反而决定取消米代金，冻结生活指数，进一步把职工们投入贫困的深渊，他们为了抵抗这种凶恶的措施，就发动了怠工运动，反对取消米代金和冻结生活指数，并要求发给复员救济金。长沙电信局职工，积极响应这次怠工运动。这次怠工坚持了半月之久，交通部电信总局被迫承认保持生活指数和米代金，并且每人发给复员救济费，当时法币五万元，此次斗争获得了胜利。大约在1948年长沙电信局成立了地下党组织，积极领导电信局的工人运动，不久在第三区电信工会的指示下，又成立了长沙电信工会。当时该局地下党即以收集群众签名的方式，提出了自己的候选名单，进行了秘密串联发动群众的活动。选举结果组成了既有顽固力量，又有进步力量的黄色工会，当时右派占三分之一，中间份子占三分之一，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

（九）交通部为军事通信设置的电信机构。国民党统治时期，交通部为了军事需要所配设的电信机构，分为两种类型，一为专属，属某一军司令部的通信机构，即所谓“行营报房”

“莫机班”，“快机班”等，统称为“通信行营”。另一种在抗日战争时期设在军事前线，不固定配属某一军事司令部的，即所谓“通信队”。

湖南于1930年开始设立通信行营，它是固定配属于某一军事司令部之内，即属于该军事司令部的组成部分。主要任务是担任军事电报通信，称“某某行营”。采用人工机方式通报者，即所谓“莫机班”，与该军驻在地电报局或邻近的转报中心局开放直达电路通报。它在通信工作和具体行动上直接受军方指挥，所有机务、报务以上人员，分别职务授予尉官、校官军衔，办公费、军服、军粮、食盐等由军方供给，并发给相当于本人工资数量的津贴，非技术性的人员由军方配备。它同时受驻在省的电政管理局领导。其通信设备、材料、班主任、报务、机务等人员，一般由交通部调遣配备，工资和其他生活待遇亦由交通部发给，电报费收入由军方与电政管理局结算。湖南曾先后设有以下通信行营：（1）1930年4月何键四路军总指挥部电务室在长沙成立有线报房，名曰“何行营”，采用人工机方式开放直达电路与长沙电报局通报。（2）1938年冬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快机班由江西进驻长沙，因薛岳系该战区司令长官，放称“薛行营”。该班通信方式采用重锤式韦斯登自动收发报机和长沙电报局及衡阳电报局直达通报。该长官部与湘北、湘东北、鄂南、赣北等地前线驻军往来的电报由长沙电报局接转，其他方面往来的电报由衡阳电报局接转。（3）1943年开始成立“莫机班”，原配属国民党王耀武部驻桃源。继则配属于王耀武第四方面军司令部，称“王行营”。采用莫尔斯人工机与驻在地电信局开放直达电路通报。1945年6月，电报数量增多，交通部根据军方要求增加设备，增派人员改组成立“第四方面军快机班”，随王部驻辰溪田湾。通报方式采用重锤式韦斯登自动收发报机与洪江、沅陵直达通报。

1938年，武汉沦陷以后，湖南位居前线，湘北地区各县电报局相继后撤，交通部为维持前方军事和民用通信，设立临时通信机构，即所谓“通信队”。通信队以担任电报通信为主，分有线、无线两种，视当时情况而定。凡电信杆线没有完全破坏者，一般以设置有线通信为主，如杆线完全被破坏者，则设置无线通信队。通信队队部一般设在前线驻军司令部所在地，并在附近设若干收发处。通信队不固定配属某一部队，亦不受当地驻军领导。通信队番号由交通部电信总局统一规定，通信方式采用简易人工机通报，个别业务量较大者，采用自动机通报。其营业收入全部上缴省电信管理局，开支亦由省电信管理局统一下拨。通信队人员除支领工资及同电信局职工一样享受生活待遇外，另享有相当于本人每月工资的战地津贴并发给军服。1938年后湖南有下列通信队。（1）1938年11月，长沙市文夕大火，长沙电报局全部撤退湘潭后，该局业务长李藩受命组织第10通信队，进驻长沙恢复通信。至1939年3月长沙电信局正式复局后，即予撤销。（2）1939年3月成立第4通信队，驻湘北地区并设有若干营业处，采用电话机用话传方式与长沙电报局直达通报。1945年8月改为第45通信队。（3）1941年12月，日军第三次进犯湘北，交通部令长沙电报局组成第5通信队进驻平江，担任前方通信，采用15瓦无线电收发报机各一套。1945年8月，日军投降，该队奉令扩编为第46通信队。1938年冬第6通信队由湖北进驻平江，并在长寿街九岭，金井等地设立收发处担任湘东北、鄂南的有线电报通信，采用韦斯登自动机与长沙电报局直达通报。1945年10月奉令撤销。（4）1945年7月交通部电信总局令第四方面军电信联络专员办公处组织成立第12通信总队，以联络专员兼任总队长，总队之下，设立45、46、47三个工程队，三个通信队，担负随军修线、设线、装机及恢复通信，接收日伪通信设备等任务。1945年10月

底，第12通信总队奉令撤销，所辖各队相继撤销。

(十)电信员工在抗日战争时期因公殉难的情况。(1)1940年派驻湘阴新市的长岳线路抢修工程队队长曾广修，因公经过湘阴县属李家墩地方，遇敌机投手榴弹，被炸伤腰部甚重，不及救治身死。

(2)1941年9月，日军第二次向湘北发动攻势，长沙危急，长沙电报局报务员张庆浏，奉令留守，最后撤退至株洲，不幸中途被围，遇敌殉难。

(3)1944年2月，石门电报局主任周自新、话务员朱芷青由石门向后撤退，在途中遇敌被掳，生死不明。

(4)1944年5月，第四电信通讯队白水收发处主任陆锡寿，率通信员江训卿、线务员马金华随白水长官部总机撤退至易家湾，遇敌便衣队，陆殉难，江马被掳。

(5)1944年6月，湘潭电信局报务员袁健撤退衡阳，途中遇敌被掳，约月余始逃出，因受伤过重，在南岳病死。又该局会计员钮长清由湘潭向南撤退，行至石潭遇敌，改乘该局疏散材料船，复遇敌追劫器材，当被打落河中溺死。又该局职工李杏甫亦于同日南撤遇敌，改乘该局料船并将全部器材护运至民家隐藏，被敌侦知搜劫烧屋，该员前往抢救，遭敌人枪杀。

(9)1944年6月醴陵电信局报务员廖达人奉调攸县局工作，在泗汾皇圃领中弹毙命。

以上各员均系直接被敌所害而殉难者，其他被敌间接伤害致死或无下落的，如1944年8月衡阳电信局报务员方鲁青，冷水滩电信局事务员石剑鸣等等，撤退至郴州就无下落了，尚无法统计。

(十一)解放前夕长沙电信局护局保产和装设秘密无线电台概况。解放前长沙电信局储存通信器材共达800余吨，后因解放

战争日趋紧迫，汉口第三区电信管理局又运来主要报话机器300余吨，责成该局负责保管。

1949年7月14日，驻在长沙的白崇禧长官部，曾派通信参谋数人持该部密令来长沙电信局检查库存材料并令该局即日将重要电信器材悉数装箱运往衡阳，其不及运走者，于必要时尽量予以焚毁，违者严惩不贷。本人当时正担任该局局长，只得一面虚予周旋，满口答应遵办，一面暗嘱长局应变委员会和地下党员协同局方材料人员赶紧将废旧机料装箱运往衡阳，同时将重要机料设法星夜偷运小吴门外二里牌、水陆洲及河西咸家湖等三处秘密储藏。7月20日上午长官公署又来电话催促，同时他们派驻车站的通信参谋阙某也来电话，以车皮业已调妥，器材尚未运到深表不满。他说：“王局长你好大的架子，这个时候你还不到车站来督运，倘有半点差错，当心你的脑袋。”在此情况下只好将料库的一些废电池、废木担和废旧机器等从速运去。车抵衡阳后，长官部令衡阳电信局派技术员负责检验器材，当发现都是废旧机料，便告知长官部。该部异常震怒，立即通知省府主席陈明仁，将我逮捕押往衡阳法办，幸陈已决定起义，我才得免于难，这些情况都是事后陈明仁将军亲口告诉我的。

1949年5月，长沙尚未解放，驻武汉第四野战军司令林彪的秘书刘梦夕的助手张大平同志，持武汉电信局局长尤箕照和副局长祝秉珩的联名密函潜来长沙与我接洽，因那时候我经常与一般开明人士，如易鼎新、刘岳厚、殷梦晖、刘公武、宋仁楚、陈明仁等往来，思想上大有改变，所以立即予以接见，张说明来意后，就密召长周机械股长彭谦吉和报务股长罗良宣两人会商，决定在长局刘忠壮祠职工宿舍彭的家中装设无线电收发报机一部，在局关祠一条巷罗的家中装设无线电收发机一部，并将张大平同志留住，在刘忠壮祠职工宿舍内。他们

在晚上秘密拍收长沙程潜陈明仁两将军与汉口林彪司令员和北京毛泽东的往来电报，后来金井会谈和湖南的和平通电等都是由那个秘密电台拍收的。这对湖南的和平解放起了沟通和促成的作用。当时白崇禧总部驻扎长沙，特务密布，杀人如麻，因此该台晚间活动异常秘密，拍收密电由罗亲自动手，机器的装设、维护及调整，由彭亲自主持。当时长沙警备司令部通信科长郭某微有所闻，曾一度来局向我提及此事，并嘱共同严密侦查，后由局方送了他300银元，他才不再追究。

二、属于省建设厅的地方电信业

湖南省地方电信，主要是由省至县的长途电话及各县的乡村电话，各专区的无线电台和部份市内电话所组成。在1933年以前，省内军阀混战，各据一方，他们为了加强对所辖地区的统治和各地驻军的通信需要，开始在防区内架设电话线。随着军事局势的动荡，各军事防区的范围也时有改变，电话线路逐渐增多，部队离防后，电信线路一般由县府接管，逐步发展为乡村电话线，仍为军用。1933年湘省府开办湖南省长途电话工程处，1937年9月该工程处扩充为湖南省长途电话局，开放营业。1938年1月为适应抗日战争的军事需要，湘省府呈准中央军事委员会及交通部，建立无线电通信网。8月成立湖南省无线电总台于长沙。至1939年12月全省各县市普遍成立区台、分台共计76座，专收发军政电报，是为湖南省办无线电报之始。1943年3月湘省府将长途电话局、无线电台及各县市的电信机构合并，成立湖南省电信局。抗战结束后，为避免与交通部电信局名称混同，改为湖南省电务局。该局设正副局长各1人，下设工程师1人，并设置工务、业务、总务3课，秘书、主计、视察3室，除视察室外，其他各课室均设有股。此外还有修理处、工程处、省会电台，浏阳、衡阳、郴县、醴县、邵阳、零陵、

沅陵、洪江、永顺等行政督察台10处，长沙、湘潭、常德、沅陵、益阳、津市、澧县、阡市、临澧、平江等电话局11处，桃源、金井、石门代办处3处，以及各市县政府电讯室等，均归该局领导，共计职员 268 人，工人 271 人。

机线设备：自从该局成立湖南省长途电话工程处以后，即从事架设省内各重要市县间之长途电话线路，每完成一线即开放营业。于1937年止，其主要干线次第完成，共计长度为1620公里。嗣后又逐渐增加，至1942年计有长平、长浏、长株、长衡、衡邵、长潭、长邵、长常、邵洪、常津、常沅、平南、平龙、衡邵、株潭、沅淑、邵新等17条线路，总共长度为2450公里，其中铜线1593公里，铁线857公里。至此，省会与区县，县与乡镇之间的长途电话，均能畅通无阻。至于湘与粤、桂、赣、川、黔等省的长途电话亦均能衔接。1944年湘省大部分地区沦陷，所有长话线路毁坏殆尽，所留无几。抗战胜利后至1949年6月止，经抢修整理以及从新架设线路，先后恢复长平、长潭、长常、常津、常沅等线并接收十七集团军所架之临澧至石门线，全省长途电线线路共计 741.5 公里。市内电话部份，有长沙等地11个电话局，共计配备交换机28部，共计585门，其中以长沙电话局容量为最大，计325 门；常德次之，有110门，其余均在 100 门以下。无线电部份，有省会电台，10个区台，64个县台，其他设有南京、广州、重庆（以上政务电台）、武昌、广州（以上省府电台）、安江、冷家溪、黄金洞、华石、杨梅山（以上厂矿电台）等10个台，此外尚有临武、蓝山、东安、大庸、龙山、古丈、永绥等 7 台。这些电台大多是采用15瓦特收发报机。

经营业务方面：该局经营业务分为话务、报务两部门，兹将该局1949年上半年度各直属无线电台收发电报次字数统计如下：计收报31195次，1980424字。所发电报计23732次，1661630

字。至同期各电话局处所发出的长途电话次数，共计 42687 次。

电信事业是有全国性的，本应统归国营办理，中央政府交通部既在各地都设有电信局，自不能允许该局及所属各局处的存在，惟当时中央政府亦莫可如何。因此该局在省府扶植之下，虽其规模狭小，人力、物力及财力远不及部办电信，但仍能维持其存在，直至建国后不久，才并入部办电信局。

民国时期的币制及沅江工商业市票

刘剑秋

民国初年，政府发行了成批的孙中山图象的银元，人们叫光洋，在全国流通使用。因此，沅江当时的市场交易以银元为主，辅之以铜元。

由于军阀混战，国民党中央军政机构未达统一，不可能在全国建立起完整的管理体制和稳定有效的金融政策。因此帝国主义者乘机勾结军阀和买办官商，实行经济掠夺，造成中国金银一度外流，银元、铜元、钱票比值变幻无常，市场紊乱。

昙花一现的鸟儿票

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正当全国经济紊乱的时候，张敬尧主湘，他以挽救湖南经济窘境为名，罢废湖南省银行纸币，代以裕湘银行钞票，在市面上大肆发行。此票人称台票，因票面上图案印有双孔雀，人们又称鸟儿票。开始发行时，沅江县各界和商家，认为是官票，颇为信任。沅江县城曾流传过一首歌谣：“洋船叫，姑娘俏，铜个子不要要台票”。后来鸟儿票几度未曾实行兑现，慢慢地在群众中失去了信誉，不久便无人问津了。

鸟儿票失信后，由湖南银行清理处发湖南省有奖惠民票，

以抽签方式还本，将我县官垵及湘阴复兴围垵变价支付。但是惠民票开奖一次便作废。这样沅江市面上交易仍然以银元、铜元为主要流通货币。

风靡一时的工商业市票

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沅江县各城镇工商业者效尤全国各大中城市，争先私自印发纸币，称之为市票，与银元、铜元混合在市场上流通。后来越发越广，风靡一时，有的殷实户及政府机关也争先发放。

市票发行出版，五花八门，各式各样。有雕刻版、石印版、手写版，有横版、直版。票面有的印有或写有凭票发光洋1元、2元、5元；有的发铜元1串、2串、5串等的金额数字。

市票的发行，有利有弊。利可以方便交易，弊可促使一些不法商户从中捣乱牟利。当时县城工商业者，有大小商户近400家，其中发行市票的商户达百分之四十以上，他们中有好有坏，群众对他们的评价，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有熊元大、锦新昌、毛裕太、李德茂、广大昌、李长发、公福等绸布号；德太荣、德盛馆、复盛昌、亿昌、潘源源、李华丰、刘吉太、陈同兴、李元昌、同顺昌、天申福、道生和等南货号；怡丰、茂兴祥、傅吉庆、裕义太等百货号；天成和、张聚宝、曾宝成等金银号；永和堂、乐华堂、重华、海上等书纸号；鼎兴长、郭乾太、郭德大等鱼行；吴裕太、曹协和等木号；宋裕祥、李德盛等粮行；九如堂、刘保和药号等近百余家商户。他们发行的市票，随时可以兑换，在市场上畅通无阻，博得远近群众的好评。特别是熊元大、陈同兴、道生和、复盛昌等的市票，流通到长沙、益阳、常德、南县、华容、湘阴等地，颇受欢迎。九如堂的市票，群众拿着可以在湖区置田买地，在全县受到好评。第二

类：有守信堂（王蓉秋立）、郑恒昌、王恒昌、郭天发、谦益、刘生茂、大吉祥、闵兴发、义丰祥、李万丰、魏永太、大公平、德太、太兴祥、三益堂、同庆福等几十家。他们所发行的市票兑现不正常，有的分明是发的光洋票，偏偏只肯兑铜币；有的一约再约，拖延不兑现。因此，群众对他们不十分信任。王蓉秋的“守信堂”，虽是沅江县的头一家殷实户，可是“守信堂”不守信，他的市票不但兑现不正常，有时还仗势欺人。特别是郑恒昌，这家商行是沅江县城资金雄厚商家之一，这家老板叫郑祥葵，是县城著名的“又哑吧”，人称他是啃不动的骨头。一次，有位农民来他家兑换30文光洋的市票，先是不肯兑现，后与他讲了许多好话，还是只肯兑铜币，按银元与铜元比值计180串，重量200多斤，弄得这位兑票农民，愁眉苦脸，无可奈何，只好花钱雇请劳力帮助将铜币挑回家。第三类：倒闭户。有黄协昌、人和大、白习斋、田茂长、姜生茂、曾仁记、方金泉等几家。他们印发的市票，不估计资金家底，只图出票牟利。发出的光洋票，不但兑不到光洋，连铜币也兑不到。因此，这些商家门前，经常吵架，他们以骗兼赖，公开在人前承认自己无信；有的还关门闭户，溜之大吉。黄协昌鱼行，少老板叫黄文卿，人称花花公子，他在外面狂嫖滥赌，回到家里滥印市票。后来黄文卿原形败露，群众纷纷到他家兑换票子，因无法兑现，他只得逃之夭夭，群众无不痛骂。

最有趣的一家，就是沅江县城南门头的炸油条摊贩方金泉，也发行了一些市票，后来无法兑换，只得向群众哀告乞怜，承认自己无赖。群众无法，只得拟了个折衷办法，就是拿着方的市票，分期分批到他家里吃油条了事。

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以后，主要使用由国民政府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发行的法币。风靡一时的市票，便渐渐地销声匿迹了。

滥发法币 通货膨胀

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实施币制改革，禁止银元流通，明文规定，只准使用中国、中央、农民、交通四大银行发行的法币，于是其他银行和私人发行的纸币一律废止。法币票面印有孙中山图象，法币币值印有一角、二角、五角、一元、二元、五元、十元的金额数字。

法币从发行使用起至抗日战争初期，在市场的信誉还较高，颇受群众欢迎。后来正面战场节节失利，广州、武汉、岳阳相继沦陷，长沙临危。斯时，国民政府打着“抗日”需要的招牌，大发“国难财”。它们发放公债，增加捐税，滥发法币（据有关资料统计，抗战期间法币发行额增加到730多倍）。因此，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垄断了整个国民经济，控制了全国金融业。这样便不断地造成了国统区通货膨胀和物价上升。

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四大银行抛出了五十元、一百元、五百元的大面额法币在市场流通。不久，物价便飞涨起来，法币失去了信誉。

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之后，四大银行进而大量发行千元、万元一张的大票，同时还发行什么票面署名“田富进”字样的钞票与法币混合使用。群众初见，惊讶不已！流通不久，物价加速上涨，这样人民便产生了埋怨情绪。有一位群众气愤地将一张千元票子扯成四页八块，人们问他为何？他曰：“四亿法币，只当八块光洋。”后来“四亿八块”一语，越传越广，一时成了对法币不满的牢骚语。

法币贬值无法控制，沅江城乡上下，自发地产生出一种特殊的交易方式，即各类物资以稻谷来交换。国家工作人员、店员、雇工及中小学教师等的工资也用粮食支付。人们常言，粮

食是物资的基础。

由于法币贬值，人们做一笔小交易，也要上千万元，稍大一点的达几千万元乃至几亿元。为了减少数票子的麻烦，有人想了个办法，首先将千元一张的票子数一千张，即一百万元，用绳子捆成砣，过秤求出其重量，以后按法币重量计算金额。当时人们对此作法提了一个新名词，名曰“砣票”。

有一位外地旅商，从常德乘货船到沅江，船票就花去了一万元法币，他言道：我是饭（万）票子过河哩！后来人们遂用饭（万）票子过河来发泄对法币的不满。

法币贬值 关金问世

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5月，国民政府为了稳定市场，安定民心，调剂大小钞票，中央银行将库存关金券（海关单位兑换券，专供交纳关税用）拿出来与法币在市场上混合使用，以一元关金换取二十元法币。可是不久，旋风不知从何而起，物价更是陡涨，一日三潮，关金随着法币不断贬值。沅江各城镇市场消沉，商人们面面相觑，感到生意很不好做，主客为价格争吵事件时有发生。为了做好生意，商人们又想了一个解救办法，在门面上张贴一张公告——《早晚时价不同，目下一言为定》。自此确也避免了不少主客之间的争吵。

关金在市场上失去了信任，人们之间，又自然地相互使用光洋和以粮换物。当时，沅江县城有位曾姓学者，看了币制贬值，物价不断上涨，风趣地写了一首七绝：

新版关金值万元，几多印刷费周旋。
何如还是旧时纸，圈后加圈百改千。

关金失信 金元券出笼

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蒋介石全面发动了反人民

的内战，庞大的军费开支无法解决，只得无止境地滥发钞票，这样更进一步地引起了通货膨胀。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的物价比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平均上涨500万倍以上，法币100元到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只能买五百分之一两大米。国民党政府面临这一危局，强行所谓“币制改革”。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8月改头换面宣布发行20亿元限额金元券，取代关金、法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并以一比三百万的比值收回法币。金元券式样可观，票面堂皇，并印有蒋介石图象。在发行上市的同时还郑重宣布：“金元券二元，可换银元一元”，开始城乡上下，商民和农民都持怀疑观望态度。因说金元券二元可换光洋一元，有一部分人却也抱乐观情绪。

但是，金元券同法币一样，无任何金属货币作准备，这也必然和法币一样走向崩溃，给各阶层人民带来灾难。后来国统区日益缩小，财政来源更加困难，赤字继续增加，于是金元券的发行量猛增，是年11月超过限额20亿元，12月超过80亿元，这样更加剧了物价暴涨。12月比8月上涨35倍。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3月金元券发行量超过1900亿元，物价上涨到4000多倍。金元券发行不到一年，就贬值二亿五千万倍。这时全国出现了抢购风，这股风对沅江县城颇有影响，有的大中商家为保全自己的物资，关门停业；有的转入黑市交易。交易的方式大都仍采用银元和粮食。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行的人民币取代了金元券沿用至今。

我所知道的女作家白薇

李长钦 *

白薇是我国著名女作家。正如阳翰笙同志所说：“在三十年代寥寥无几的女作家中，她和丁玲的成绩比较突出”。全国解放后，白薇年事已高，没有创作过有份量的作品。但她是全国政协第二、三、四、五届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委员，到过北大荒、黄泛区、新疆等地体验生活，广泛地从事社会活动。

我于70年代末开始搜集白薇的著作和生平资料，1980年去过白薇家乡资兴秀流，访问过她在资兴、郴州的亲戚、朋友，1981年夏，在北京三次到白薇住所访问。那时，她已是87岁高龄的老人，满头银丝，步履也有些艰难，但精神矍铄，颇为健谈，对我谈及了她许多充满戏剧性的往事。

白薇在人生的旅途上跋涉了94个春秋于1987年8月27日与世长辞了。白薇已成为历史人物，我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白薇写下来。

一、家世

白薇，原名黄彰，黄鹂，别号黄素如，小时取名碧珠。白薇是她的笔名，据她自己解释，即空寂又奇穷的薇草，含尽女性无穷尽的悲哀。

白薇于1894年2月5日出生于湖南资兴南乡的秀流村。滔滔秀水，沿着山谷流来，迂回曲折，在秀流形成一个大“之”

*李长钦系郴州师专副校长。

宇。沿河建起如长街的秀流村，三面临水，后靠大山，水碧山峻，景色秀丽。沿河下游最末一栋颇大的青砖瓦房，便是白薇的家。小时，白薇虽然不能象男孩那样到河里游水划船，摸鱼捉虾，可是，村前临河长满了石榴树，村旁依山枣树成林，村子四周长满了数不尽的野生花草，河里不时传来高吭悠扬的号子声……这些，无不给儿时的白薇无限乐趣。

白薇祖先以农业发家，至祖父黄秋芳时更加富裕，拥有三百亩田地，一栋青砖瓦房，在当地算是大财主。白薇祖父富裕有以下原因。一、白薇祖父的哥哥家富裕，哥哥早死，侄儿很小，由祖父代管家业，积聚了一些钱财；二、祖父发现中药五倍子在广东卖价很高，到广东贩卖五倍子赚了不少钱；三、祖父是前清举人，在湘军中任过军官。

白薇的祖母赵翠兰，是太平天国王府里宫女、女将洪宣娇的部下。她善歌舞，会拳术，能绘画，精刺绣，玲珑娇小，优雅娴静，年半老仍十分美丽，是这个世界上最疼爱白薇的人，也是白薇人生道路上第一个启蒙老师。从7岁起，白薇就跟着祖母学习女红及绘画。10岁左右，白薇绘花卉虫鸟，颇有名气。亲朋请白薇画手巾、帐檐及门帘的，应接不暇。全家的花鞋、花手巾等，也几乎由她一个人做，劳累得终年黄瘦，体弱多病。

父亲黄达人，前清秀才，爱写怪文章，脾气也有些古怪，第一次考秀才不中，自认倒霉，取名黄晦。光绪末年，为了寻求救国之道，在当时留学热潮影响下，到日本留学，并参加了同盟会。他认为从此前途光明，便改名黄明。归国后，在家乡办学校，学校取名二都高等小学，自任校长兼数学教员。学校向学生灌输新知识，鼓吹革命。辛亥革命时，黄达人卷入革命浪潮中，在湘军中任职，并兼军医官，驻守岳阳城陵矶。清王朝被推翻后，革命军内部发生了分化，黄达人非常失望，辞职

还乡，从此不问政界事。回家后先开矿，为地方上开辟富源，由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开矿又遭失败，因而把黄明又改为黄晦。此后潜心研究医学，不挂牌行医，有求者不论贫富，都尽力医治，不受报酬，深受农民欢迎。

母亲何娇苓，名门闺秀，身材高大，健康，以高妇人称著。她虽然没上过学校，却能识字，能说会道，精明能干，吃苦耐劳，善理家政，父亲黄达人长期在外，母亲独自操持家中大小事情，对子女管教也十分严格，称得上女强人。

白薇兄弟姊妹共8个，白薇最大。妹妹九思、九如在衡阳第三女师、长沙省立第一女师与白薇一起读过书。白薇去日本留学，不久，弟弟黄健，妹妹九如也先后到日本留学。黄健又名黄破云，解放前曾任郴州税务局长。抗日战争时期想开矿，并去重庆找过白薇，后在贵州见龙桥因车祸身亡。妹妹九如解放后任上海师范学院教授，早已退休。在家乡，现健在的只有同父异母弟弟黄甲山。黄甲山比白薇小30多岁，解放后一直在家务农，会开拖拉机，修理农用机械。近几年，白薇体弱多病，行动不便，就是黄甲山的妻子唐小求在京照料她的。

二、不幸的婚姻

白薇同旧中国许多妇女一样，有着不幸的婚姻，正因为如此，她的许多作品，都为妇女们呐喊，鼓舞她们冲破封建礼教的樊篱。在散文《跳关记》中，她大声疾呼：“跳呵！跳！为着前进、光荣，女孩子们，千关当前，跳，跳，跳！”

白薇9岁，还不知婚姻为何事，就糊里糊涂做了峡岬李宇仁的童养媳。白薇家非常富有，并不缺吃穿，白薇又是长女，从小聪明，应该说，会得到父母更多的爱抚，为什么还做了童养媳呢？对此，说法不一，据黄甲山回忆，父亲和李宇仁都是前清秀才，是世交，为了使他们的交往长久下去，竟拿儿女开

玩笑，黄达人将自己女儿许配给李宇仁的儿子，他们结成了亲家。白薇是童养媳，用背带背到峡峪村李家的。向祖宗神位磕了三个响头，就算是李家的媳妇了。李宇仁虽然也是小康之家，可是并没有给这个童养媳一点温暖。白薇到了李家，好象来到另一个世界一样，一切都显得陌生。白薇的婆婆是个恶妇，对童养媳十分苛刻，动不动就是打骂，许多年以后白薇回忆起来仍心有余悸，称李家为“人间地狱”。白薇在李家实在无法生活下去，一天清晨，东方刚出现鱼肚白，便悄悄起床跑了，跑回秀流，家里还未开门。过了一会，当母亲打开门看见自己女儿出现在门口，不知是怎么一回事。白薇见到母亲，什么也说不出，只是哭，母亲问了好久，白薇才说出一句话：“妈妈，我不去李家！”父亲觉得白薇太小，也就答应暂时在家住下来。这时，黄达人在家乡创办了二都高等小学，就让白薇进了二都高等小学校读书。

几年后，白薇已经长大了，李家提出要正式娶白薇。李宇仁已不在世，独生子又病得非常厉害，封建迷信思想作怪，媳妇过门“冲喜”，男人的病就会好。白薇知道这是把自己往火坑里送，跪在母亲面前哭泣，苦苦求情，含羞地说：“爸爸，我无论如何不嫁，我要读书”。脾气古怪守旧的父亲回答说：“唉，孩子！你要知道，别人的独生子病得那么惨，非要亲没有救的。我们礼教名家，你要听父母的话……”这样，白薇又进了峡峪李家。

这种由父母包办的婚姻，使白薇非常不满。丈夫李锡明，个子矮小，村里人戏称他为登高矮子。他庸庸碌碌，毫无德性，十几岁就会嫖赌，吸鸦片烟，白薇无论如何克制自己也建立不起真正的爱情。婆婆是十分厉害的寡妇，把媳妇当奴仆，从早做到晚，稍不如意，唠唠叨叨，骂个不停。白薇一回嘴，动手就打，简直是度日如年……。好多年以后，白薇回忆这段

痛苦婚姻生活，悲愤地写道：“拳击，口咬，父亲的娇女给一个有名的凶恶寡妇打破眼睛，咬断了脚筋，血流满面，血流染趾涂地，凶妇和儿子再撕碎她全身的衣服，打青她底胸背，又拿了斧头来砍她，父亲的女儿，只得赤裸光身，带血带泪地逃到河里，躲在水中避难。”几天后，回到家里，父亲医治女儿的伤处，母亲急得吐血，劝说父亲别把女儿送回峡岬，父亲仍守封建礼教，伤治好后，又送白薇去李家。由于白薇的反抗、出走，更激怒了厉害的婆婆，对白薇的虐待越发厉害。白薇忍无可忍，将李家的煮饭锅打破，黑夜，迎着雪花与狂风，含恨走出了地狱，在别人帮助下，女扮男装，逃到几百里外的衡阳，进了四妹、五妹读书的第三女子师范学校。

李家知道媳妇跑掉，而且到了衡阳读书，向黄达人施加压力，逼着问他要人。黄老先生答应去衡阳找人。他到了衡阳第三女师，还没有提出要女儿回去，校长把黄达人夸奖了一番，告诉他白薇的成绩非常好，黄达人只好同意白薇留下读书，毕业后回李家。

以后，白薇因反对新上任的老朽校长而被开除，进了长沙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黄达人怕女儿毕业了要逃婚，特地由千里之外的资兴，风尘仆仆赶到省城来守候女儿，花了几百块钱，请了校中教职员吃酒，叫他们严守白薇。白薇在妹妹和其他同学的帮助下，从一个废厕所的孔道里逃出学校，带着六块光洋，去日本留学去了，结束了由父母包办的不幸婚姻。

在日本，白薇与诗人杨骚有一段热烈而幸福的恋爱生活，回国后在杭州，以后在上海，他们都有过断断续续的亲如兄妹的甜蜜生活。但是，他们始终没有结成夫妻，他们俩相处，痛苦多于甜蜜。关于这些，1933年白薇、杨骚合编的《昨夜——白薇、杨骚情书集》均有真实的反映。1981年夏，我访问白薇时，问她为什么与杨骚分手，不能结成终生伴侣？白薇无不感

叹地说：“他喜怒无常，爱不专一，害得我一身病，我怎么不同他分手呢？”

三、文学活动和与鲁迅的交往

尽管白薇从小在家读了不少名人传记，在衡阳第三女师读书时作文得过120分，但她在日本留学，读的是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科，后又在该校历史教育科学心理学，还自学过哲学、佛学、美学，可以说，她与文学是无缘的，从没想到自己要从事文学创作。

白薇是怎样走上文学道路的呢？

在日本，白薇长时期陷入苦闷，她急切需要一种武器，象解剖刀和显微镜一样，来解剖社会。于是她想到了文学。

最初引导白薇走上文学道路是田汉。在日本，白薇曾和田汉的爱人易漱瑜同住，因而认识了田汉。田汉教她俩人学习英语，课本是挪威作家易卜生写的《娜拉》，这便是白薇生平第一次接触文学作品。以后，田汉又介绍白薇读文学概论。这时，白薇对文学作品还没有浓厚兴趣。但是，当她意识到要把文学作为解剖社会的武器，在拜读了易卜生的《海上夫人》、《国民之友》之后，她对文学产生了兴趣。从此，她把学校图书馆所藏的莎士比亚、史特林堡、霍普特曼、梅特林克等的剧本，都借来读了。

白薇的处女作是1922年初动笔，发表在1926年《小说月报》（第十七卷第一号）上的三幕剧《苏斐》。在日本，她还完成了诗剧《琳丽》。由于这部诗剧写作的成功，陈西滢称白薇为新文坛的一颗明星。颇有影响的剧本还有《打出幽灵塔》、《革命神的受难》、《假洋人》、《北宁路某站》、《敌同志》等。

白薇的文学才能是多方面的。她不但写剧本，也写诗歌，

小说和散文，而且都有成功之作。其中小说有《炸弹与征鸟》、《爱网》、《悲剧生涯》，诗有《春笋的歌》、《琴声泪影》、《火信》、《盘锦花开十月天》，散文有《我的生长和没落》、《跳关记》。她还试写新的文学式样的作品，如《长城外》就标明为电影小说。她的作品除公开发表的外，还有许多作品未曾发表。我曾有机会从白薇的一个亲戚那里，读到了她1955年写成，1957年修改好因故未发表的长诗《创康拜因割稻记》。全诗共七章，600多行。诗中热烈歌颂了工人、技术人员的创造精神，抨击了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白薇在《后记》中写道：“……我第四次来写它，又谁知道，这运气是怎样地走？”

白薇的独幕话剧《革命神的受难》，由郁达夫、李小峰介绍，投给鲁迅负责编辑的《语丝》四卷十二期发表，开始了鲁迅和白薇的交往。白薇在独幕剧中，把被雷司、电司打死的“恶魔”影射背叛革命的蒋介石，革命神代表人民，对“恶魔”进行了庄严审判。这个倾向革命的独幕话剧触犯了反动派，《语丝》也因此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警告。鲁迅在1931年写的《我和〈语丝〉的始终》回忆这段往事写道：“经我担任了编辑之后，〈语丝〉的时运就很不济了，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有人说是因为一篇戏剧。”

从此以后，白薇又给鲁迅、郁达夫合编的《奔流》杂志投稿。多幕剧《打出幽灵塔》从创刊号起，分三期刊登完。白薇在《奔流》上发表的还有长篇小说《炸弹与征鸟》、《春笋的歌》。

白薇虽然给鲁迅编的杂志投稿，可是她向来有不高攀名人的习惯，不敢去拜访鲁迅。白薇把稿子送到鲁迅家门口，交给许广平就走。投稿半年多了，鲁迅问许广平，白薇是什么样子？许广平说，白薇每次送稿走得很快。鲁迅开玩笑说：“白

薇怕我吃掉她。”1928年底，负责出版、发行《奔流》的北新书局老板宴请《奔流》的编辑和作者。白薇和鲁迅都被邀请。在宴席上，白薇第一次见到鲁迅。鲁迅同白薇开玩笑说：“有人说你象仙女，我看也是凡人！”从这以后，白薇和鲁迅在文学上的交往更多了。据《鲁迅日记》记载，白薇寄鲁迅稿、信共三次，鲁迅复白薇信五次，白薇访问鲁迅五次。1930年3月，鲁迅因参加“左联”和“自由大同盟”而遭受国民党当局“秘密通缉”，不得不离家避难。在鲁迅避难期间，白薇冒着危险去看望鲁迅。

鲁迅为了帮助白薇在文学道路上迅速成长，在处理白薇的稿件时，费了不少心血。《打出幽灵塔》和《炸弹与征鸟》篇幅都比较长，需要分期连载。鲁迅说：“……是要编排得好，穿插得合适，才会有人看的，所以每期的编排就很费斟酌。”鲁迅为了使白薇的作品保持自己的风格，决不随便删改，更不象某些人在嫩苗的地上驰马。所以鲁迅说：“她的文章，整个都是嫩葱葱的，活泼泼的，象一片朝气蓬勃的春草，……只怕改得使一片淡黄的嫩草中，杂一块枯黄色、杂一块墨绿色，反而显得不调和了，所以……让她的文章嫩就全嫩……不改她的。”

白薇从事左翼文学活动，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鲁迅一直把白薇当作同一营垒的战士和知己。1933年11月24日致肖三信写道：“……《现代》和《文学》，都是各派都收的刊物，其中的森堡、端先、沙了、金丁、无翼、起应、伯奇、何谷天、白薇、东方未明=茅盾、彭家煌（已病故），是我们这边的。”

白薇对鲁迅非常尊敬。1936年初，鲁迅患病，白薇非常想去看望鲁迅，可是，她自己也躺在上海红十字会医院的病床上，只好写信去慰问，由内山书店转给鲁迅。鲁迅逝世，白薇

也因患病不能参加追悼活动。白薇抱着病体，于1936年10月23日写了《听了死耗之后》，以后又写了《从鲁迅先生墓地归来》、《我对鲁迅先生的回忆和感想》等纪念文章。1981年夏，我访问白薇时，她向我说道：“鲁迅为人正直，讲信用，在他办的刊物上发表作品，付稿费很公平，对初露头角的青年作者从不轻视，我是把他当作长辈来尊敬的。”

四、解放前夕回家乡

1947年阴历十一月初四，白薇从上海回到家乡资兴秀流。白薇父亲于阴历九月二十九日去逝，家里人发电报要她回家治丧。父亲黄达人虽然包办白薇婚姻给她无穷痛苦。后来，他同意女儿与李家解除婚约，总算是一个进步。而且在白薇众多的姐妹中，她是长女，应该回家料理丧事。

白薇父亲的丧事，主要由白薇二妹和二妹夫主持。白薇同家里人商量，山上的杉树有人买，田地有人买，都可以卖，让农民高高兴兴。要不要请和尚道士操度，白薇与二妹夫发生了争执。白薇坚持不请，认为那是封建迷信。由于父亲的病逝，母亲过度悲伤和劳累，也病倒了。二妹和二妹夫坚持要请道士跳神，又同白薇发生争论。白薇的意见没被采纳，愤愤不平地说：“我说话没人听，不起作用。有病，跳神有什么用？只有吃药才会好。”不到一年，母亲也病故了。

白薇这次回来，正处于解放战争接近尾声之际，白薇的言行，颇有些与众不同，遭到别人非议和不可理解。好些人戏称她“癫婆子”，妈妈骂她是“退财鬼”。比如，到过年时，她每家每户都去拜年，非常贫穷，非常脏的农民家也不例外，白薇家的其他人，决不会给这些穷人拜年的。一个叫何甲蓉的老人，已瘫痪多年。家里穷，无钱医治，久病无孝子，何甲蓉家的人对她也十分冷淡。白薇却常去看望她，与她谈心，给她

以安慰。白薇家的一个女工衣服破烂，难以御寒，白薇从家里找出布料送给她补衣服。女工不敢收下，白薇自己动手，给女工把衣服补好。农民卖柴火给白薇家，通常一斗米600斤，白薇背着母亲要家里人一斗米只要400斤柴火。农民到她家买谷子比买米划算些，白薇就要家里人卖谷子给农民，并说：“让农民多碗稀饭吃。”白薇父亲出丧，祭文是白薇自己写的。据她弟弟黄甲山回忆：祭文是大姐躲在楼上，坐在床上，膝盖上放一块木板作写字台写成的。白薇十余天拒绝会客，专心写作。祭文既写父亲的养育之恩，父亲参加同盟会追随革命，回乡办教育行医造福人民，也指出父亲遵循封建礼教，强迫她“出嫁从夫”，给她种下不幸婚姻的苦果和剥削农民的错误。所以许多人说白薇说话做事不分倒顺，骂她是“癫婆子。”

白薇这次回资兴，怕长期赋闲在家，目标太大。为了有个职业作掩护，1949年上期，应聘到资兴县中任国文教员。由于白薇思想进步，学识渊博且有文采，又由于白薇生活朴素，平易近人，深得学生爱戴。特别是她支持学生运动，更加得到学生拥护。

白薇在资兴，直接参加了解放战争，成了湘南游击队三大队唯一的女战士。那时，她已50多岁，与战士们过着风餐露宿的艰苦生活，有时一天行军上百里，也不觉辛苦。在游击队，她分工搞宣传工作，给《通讯》油印小报写稿，改稿，有时也给战士们讲课。她还参加攻打彭公庙的战斗，消灭驻扎在那里的一小股国民党警察部队。打了彭公庙后，游击队要开往桂东去，领导见白薇年纪大，又是女同志，劝她不要去了，留在资兴工作。这样，白薇就回到了资兴城。1950年初，白薇离开资兴，来到了北京。

五、1976年来郴州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波及京津。8月，白薇来到了郴州。这是白薇1950年去北京之后第一次回郴州。她妹妹九思的儿子李宙泽在郴州水电局工作。她是来他家的。由于她来得突然，李宙泽出差不在家，有关方面先安排她住郴州地区招待所。房内有地毯、沙发，条件在郴州算不错，在北京等大城市就很一般了。服务员把房门打开，白薇没有进去，站在房门口就发脾气：“怎么？把我当小姐对待！”一定要去宙泽家，不住招待所。服务员把沙发等物品搬走，左说右说，才肯进房。李宙泽回到郴州后，就把她接到家里去了。到了宙泽家，她经常下厨房，指导饭菜如何做才有营养。宙泽家小孩替她洗衣服，每次都要称谢，十分尊重别人劳动，对小孩也是如此。其他生活小事，如添饭、倒茶等都自己动手，不要别人照料。宙泽一家大小，对白薇客气和尊敬，因为她已是80高龄的老人，又是解放后第一次回家乡。可是白薇仍坚持自己动手，并交代李宙泽，不要把她当作资产阶级小姐来侍候！

白薇来到郴州，虽然没有声张，家乡的亲戚、朋友、同事、学生都闻讯赶来看望她，每天很多人，简直川流不息。白薇年纪大了，精力不支，却满腔热情地接待来访者。高兴时，滔滔不绝地说话，怎么劝说，也不罢休。可是白薇的脾气有些古怪。第一，不能称呼她为老人家，不能说她老了，更不能说她身体不好。尽管岁月不饶人，80高龄的白薇衰老得步行要靠手杖支撑，但当来访者称她为老人家，她的脸色突然会变得难看。更有甚者，她把手杖丢掉，不理睬来访者，姗姗地走进里面房里去了；第二，不能给她送礼物；第三，她不愿意讲她的往事，也不愿意谈她写的作品，特别不愿意讲她辛酸的婚姻往事，如果来访者不知趣，触及这些内容，她可以立即不讲话，

甚至要来访者离开，把门关上。

在郴州期间，白薇突然听到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十分悲痛。她虽然不能马上回北京参加悼念活动，却不顾自己年高体弱，克服行动不便的困难，参加水电局的悼念活动。

白薇追求革命，追求进步，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对毛泽东同志十分尊敬和崇拜，也得到毛泽东同志多次接见。1945年秋，毛泽东主席从延安到重庆，同国民党谈判，谋求和平建国大计。白薇当时也在重庆，多么想去见一见毛泽东主席。但是，当时文艺界有人造谣说她“落伍了”、“倒下了”，她自卑得不敢提出如此要求。一天，毛泽东同志在重庆周公馆招待妇女界，白薇被邀请参加了招待会。她谨慎地坐在后排座位上，一言不发。散会时，当毛泽东走近白薇的座位时，参加招待会的一个同志向毛泽东主席介绍白薇：“毛主席，你常问起的白薇就是她。”毛泽东回过头，亲切地握住白薇的手说：“我常记起你，你和丁玲是我们湖南的女作家……。”白薇感动得热泪盈眶，得到极大的安慰。

全国解放后，白薇1950年春从郴州到了北京。不久，毛泽东在中南海住所接见了白薇，两人见面后握着手站着叙谈了好久。随后毛泽东留下白薇吃饭，称白薇“大姑娘”。趁吃饭机会，白薇向毛泽东汇报了湘南游击队的情况。湘南游击队第三大队活动的好些地方，毛泽东在1928年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接应朱德、陈毅部队上井冈山时已去过，听了十分亲切，并对白薇说：“湘南游击队配合大军南下起到很好的作用，游击队搞得不错，你干得好哇！”

在郴州，白薇多次表示要去资兴秀流老家看看，还想去看青山龙水库。因天气炎热，行动不便，李宙泽答应天气凉爽时再邀她去。10月初，“四人帮”被粉碎，同时，京津地区地震警报也已解除。白薇精神为之一爽，立即要求回京。这样，白

薇在郴州住了两个月，兴高采烈地离开了郴州。

人到晚年，大概会有落叶归根念头。早几年，白薇又提出要来郴州。中国作家协会正式来函与郴州地委、行署联系。李宙泽得知这一消息后，忙着与有关方面交涉、协商，认真做好接待白薇的准备。但白薇已年过90，行动更加不便。坐火车颠簸30多个小时，难以支持得了，组织上经慎重考虑，耐心地劝说白薇，她终于取消了这次南方之行。

名画家翟翊的一生

熊淑文*

一、家世与读书

翟翊号文辉，派名光耀；戊申年（1908年）二月二十八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他的曾祖父参加过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由安徽泾县流徙到南京，1911年在南京病故。曾祖母携祖父到长沙落户。祖父无职业，将身边剩余的二百两纹银买了福星街一所木结构三进的房屋，前两进租给一些住户，后进自家住。他的姑母翟玉清一家，后来也迁来同住在后进。他的祖母王氏，系家庭妇女，1929年病歿于长沙。他的父亲名廉，号少舫，生于前清乙亥年，歿于1932年，南货学徒出身；一生多病，在十几处厂矿商店任帐房工作；50岁后就回家休养，靠福星街房租生活。他的生母王氏，长沙贫农女儿，身体虚弱，生翟翊产后失血过多，未滿一月即病逝。他的父亲一人兼挑两房，又过继给未结婚而夭折的叔父作儿子，因而娶了两房妻室，一个是陈氏，属长房的，1928年逝世。一个算是叔父的儿媳，他们等于妯娌二人。他的生母是婢娘，婢娘死后，他就称伯妈作母亲。伯妈从未生育过，将翟翊视若掌上明珠，尤其祖母十分疼爱。他的父亲想多生几个儿女，又续娶了一位婢娘张玉清，是长沙东乡贫农女儿，一生也未生育。由翟翊赡养，1982年10月在长沙逝世，享年90岁。

翟翊幼年时，聪颖善画，在修业小学读书时，是图画老师最喜欢的学生，课后对他多加指点，促使他对绘画更感兴趣。

他在修业小学读书时，毛泽东教过他们班的语文。他当时

* 熊淑文系翟翊夫人。

只知这个老师好，同学们都喜欢他。1921年翟翊进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1923年又考入长沙私立华中美术学校。1925年再考取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西画。校长是名画家刘海粟。翟翊考入这个学校后，因家境贫寒，又逢北伐战争，遂辍学回家。经杨东莼先生介绍，在郭亮筹办的省总工会筹备处艺术宣传股作美术工作。马日事变后，他仍回上海转入美专师生创办的上海新华艺术大学美术系学油画，1928年毕业。他受过白俄美术教师的严格训练，打下了很坚实的西画基础。翟翊家贫，于是半工半读，在上海明新绸缎店、中西大药房及南洋烟草分公司搞美术工作，还兼任过闸北新明小学的美术教师。这样减轻了家庭的负担。

翟翊在上海时，结识了田汉，经常与张曙（明德音乐教师）去田汉创办的南国社玩，与那些左翼剧协联盟的进步作家、艺术家、戏剧家常来往，受他们的影响很深。

二、教书与结婚

翟翊大学毕业后，同班同学黄士元（黄镇）邀他同去安徽省安庆办集云美术学校并教美术课。不久，黄以无经费为名停办学校，遣散教师与学生，亲自送翟翊上船回上海。解放后才知黄士元当时为地下党员，办学校掩护革命，后因国民党迫害他，便停办学校去了延安。黄镇任文化部长时，与翟翊通过几次信。黄镇参观粉画展览后，向主持画展的人及一些同看画展的首长说：“翟翊是我的同学，他画得很好，我们很久没见面了。”见了翟翊画的《苏州园林》这幅画，赞不绝口。后来翟翊将这幅画送给了他。以前还送过一张长沙的《爱晚亭》写生粉画。黄在翟翊病后住医院时，来信询问是否需用高级药品？他可从京寄赠。翟翊逝世又打来长途电话哀悼，慰问家属，并送了花圈。

1929年因祖母逝世，翟翊回家。经教育厅经费科科长张伯泉先生介绍应湖南省立一中、二中艺术师范班之聘教西画、透视学、色彩学等课，并兼任普师的美术课达9年之久。还兼任过长沙师范、一师、明德等校的美术课和衡粹职业女校艺术科的西画课。他课余不懈地作画，9年中他画了大小100余幅油画和水彩画。可惜长沙文夕大火时被毁掉了。

他的业余爱好是唱京戏、拉京胡、演话剧、听交响音乐与跳交谊舞。1930年间，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他与长沙师范教师左天锡、朱之倬、姜绶平、黄志尚、廖若平等人创办了《冻雨剧社》，为了提倡新戏剧，专演田汉的作品，如《名优之死》《苏州夜话》《南归》及《古塘的钟声》等话剧，深受群众的欢迎。

1934年到1935年，他与缪昆山、戴望峰、朱之倬等，创办了《逆流剧社》，也是专演进步话剧的。排演过曹禺的大型话剧《雷雨》。

1936年唐焰斋、朱人鹤、孙伟及宋绍尧等组织了教师业余话剧社“一九三六剧社”，曾演出过抗日题材的《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翟翊也参加了。

省立二中搞游艺同乐会时，翟翊成了总的艺术指导，学生不论演出什么，都争请他指导和化装。他导演过学生演出的《名优之死》、《南归》、《咖啡店之夜》、《雷雨》等剧。

1932年到1933年间，他与搞文学的向培良、朱之倬及搞美术的戴望峰、戴先杰等创办了“青春文艺社”。这个组织通过文学、戏剧、美术为人民大众服务。编有青春文艺刊物，曾在长沙市民日报副刊辟有专栏，并加单页，以提倡现代文艺，介绍国内外文艺评论，并且演出过一些进步话剧和外国戏剧。

1933年“青春文艺社”主办了青春画展。翟翊除了参加画幅展览外；并担任了评选工作和展览会场布置。他的作品有静

物画《瓶花》；人物画《睡婴》、《老人像》；风景写生画《静静的山林》；也有创作的大幅油画。并在市民日报副刊上刊登。

继之又举办了青春儿童美展。他又被推选为主要评述委员；并选拔了儿童优秀作品在市民日报副刊上登出。

“青春文艺社”还经常举行岳麓山的野餐会，南岳旅游等活动，邀请一些非青春社的文艺工作者参加，讨论关于文艺的新动向和作品的内容、思想、观点及文章的优劣等。

同时一些美术工作者与教师，如李昌鄂、陈国钊、周令钊、周令林、罗泽霖等，组织了“索风文艺社”，他们是国画与西画并重。又如周磊村、何勋、张栢年等，组织了“潇湘文艺社”专搞国画。“青春文艺社”是专攻西画的。30年代的长沙，文学、美术，人才济济，非常活跃，对推动文学与美术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1935年到1936年间，长沙美术界的戴先杰、孙玮、唐焰斋、陈国钊、翟翊等组织了抗日美术展览会，在教育厅的中山堂展出。翟翊有三幅油画《率兽杀人》《东方巨狮醒了》《同心协力》参展。

30年代湖南邮政管理局工务科长李克立先生和邮局的周东梧、罗铮与外界一位土木工程师段海帆以及黄远谟、曹仲仁、沈建平等，组织了一个业余俱乐部专搞京戏，还请了一位老艺人教戏并打鼓。翟翊晚上经常去拉胡琴，他的三叔翟歧卿老人也常去搞文武场面。翟翊唱马连良派须生，马氏名剧《赵氏孤儿》，他曾以票友身份登台演出过。

1936年梅兰芳先生到长沙演戏，翟翊与田洪同去看望梅先生，并和梅先生聚餐合影，翟翊为梅先生拉胡琴伴奏练唱，深得梅先生的赞许。梅剧团的琴师倪秋萍先生出版的《京胡研究》一书，送了翟翊一本。

我在省立二中当学生会主席时，举办了欢送师三师四班及

高中一班同学毕业游艺会，他导演学生演出了《朱砂志》及《三娘教子》两出京戏，从排练、教唱到上台化装、借服装、拉胡琴伴奏及到外面请搞文武场面的人来协助，都由他一人包办。还排演了话剧《南归》和《咖啡店之夜》。他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几个星期没回家。

他的业余爱好还有摄影和雕塑，他拍的单人像《树荫下》是一张杰作，我还保留着。他的摄影作品，经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三十年代他在华中美专教过雕塑课。

1931年他的美专女同学陈国兰从日本回国，他们早已相爱，正要准备结婚，他是独生子，家里应有尽有，连私人包车都置了。家里请一位男厨师并拉车，雇一保姆做家务杂活，他因教课多，收入甚丰，生活很优裕。

但好事多磨，恰逢翟翊父亲病危，亲友建议，结婚必须提前，用封建习俗冲喜的办法结婚。一使父亲的病因冲喜转危为安。二即使父亲逝世，儿子不必守孝三年后结婚。双方只好冷冷清清草率完婚。不久，父亲逝世，丧事办得非常热闹。

婚后，陈国兰在明德中学教美术课。1933年他们添一子，取名翟实斋。1935年又添一女，取名翟实华。陈国兰生女后，夫妻之间发生了齟齬，经常口角，越演越烈，以至打架。最后，陈国兰赌气回了新化娘家，7年未归。两个孩子是奶母喂大的，家务和两个孩子的生活由婢娘照管。最后夫妻感情破裂，于1943年在重庆协议离婚。

三、抗战和画展

全民抗战开始后，翟翊毅然辞去优厚待遇的教师工作，奔赴武汉参加军事委员会第三厅搞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任美术科的少校科员，在美术工场作抗日宣传画。当时还有周令钊、李可染、王式廓、倪贻德、丁政献、卢鸿基、段平佑、罗工柳、

郝力群、沈同衡、汪仲群等，同在工场作宣传画。当时，为了迎接第三厅成立并庆祝台儿庄大捷，翟翊画了一些抗日将领及蒋介石的头像。这些画多次参加游行并放在街头展览，有一次举行武汉三镇的美术、歌咏、火炬水陆大游行，其中有一天是美术日，中心内容是宣传台儿庄大捷。第三厅是周恩来和郭沫若领导的，宣传内容以“团结抗日”为主。

第三厅成立后不久，在武汉举行了一次“全国抗战美术展览会”。翟翊在这次画展中，除了上述的宣传画外，又画了一幅《恶兽食人》的油画，描写日军惨无人性，纵狗咬中国穷人，被咬的人，衣衫褴褛，全身血污模糊，日军在旁狰狞狂笑。

画展期间，成立了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翟翊也是会员。这是在三厅的影响下，组成了七个文艺界进步组织之一。

同年6月，三厅决定在武昌黄鹤楼墙上绘制一幅《全民抗战图》的大壁画。本应由美术科科长倪贻德负责起草，因另有任务，就由翟翊起草，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壁画，翟翊担任主画，还有美术工场的许多画家一起工作。壁画以蒋介石委员长为前导，他骑着马穿着披风挥手，后面跟随着陆、海、空各军种，游击队，工、农、商、学和各行各业男女老少，天空飞机成队，远处日军飞机坠落，舰艇被炸毁。

当时香港出版的《今日中国》画报上登了翟翊和其他画家们的工作的像片等，还登了该画的局部。武汉沦陷后，日军并未毁掉这幅画，并承认这幅画是画得有水平的。

1938年冬，三厅将由湘桂线撤向重庆，郭厅长派翟翊到长沙打前站，翟翊找到西湖路一幢亲戚的大公馆，作为三厅驻扎之地。接着又要翟翊到衡阳打前站。他嘱咐娘和两个孩子由湘潭坐民船到衡阳去，并未通知他的妻子，他准备将老小三人随三厅带到重庆。

政治部和第三厅经桂林时，驻市一中。一次敌机投弹，音

乐家张曙和他的小儿子被炸死。领导上知张曙是从长沙与翟翊同到三厅的，便嘱翟翊办理丧事。

1939年三厅到了重庆，翟翊负责美术工场。他主办了《抗建画报》。他在画报上发表了一些画。同时又搞了一些发明创造，试制美术用品，如石版上用的蜡笔、粉画纸和粉笔，石印传真制版术，七色套色印刷等，并试用油墨绘画。

1940年，翟翊升任上校主任科员。国民党要三厅人员加入国民党，于是进步人士与郭厅长集体联盟辞职，表示抗议，翟翊也在内。周恩来副部长打算把这批人送往延安。蒋介石害怕舆论，成立了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仍由郭厅长任主任委员，把这些人搁置起来，这些人后来一个一个地离开了三厅。

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夫妇，一天，到翟家，看到翟翊在美国《Live》杂志上发表的几幅漫画。有一幅是画墨索里尼用绞肉机将阿尔巴尼亚放入绞肉机内绞得血肉模糊，墨索里尼喝那流出来的血。另一幅是在国内发表过的《东方巨人——中国》，中国军人用刺刀插入日军的一只脚上，表示制止日军南进。他们还谈了文化和创作问题。

国民党派何浩若接替了郭沫若的第三厅厅长职务。既不搞任何抗日宣传，连原有的《抗建画报》也停办了。

何浩若带来的简贯三任艺术科科长，要翟翊为当时的政治部长张治中画了一张四尺高的全身穿军装的油画像，由科里直接送给了张治中，后来翟翊才知道是简贯三在讨好张治中，当时很生气。这时美术人员无事可做，都画漫画投稿，搞个人的收入。

1942年三厅厅长又换了黄少谷，把美术部门搁置起来，美术工场无事可做，许多人都搞个人画展卖画，收入甚丰。翟翊家庭负担重，也想开个人画展，但苦无一笔筹备金。

翟翊见报载长沙第一次会战大捷，又有第二次第三次大捷的报导，因此申请回长沙作战地写生，一来回家乡看看，可由

公家报销旅费，二来作画材料皆由国家供给，可以作一批画。三厅同意了。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予以接待，在参谋处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听取了关于作战的经过报告。翟翊前往各战区现场，在战壕内与士兵生活了一些日子，绘制了十幅油画，在庆功会上，又为立功的将领画了三十几张人头像。后用军委会政治部名义主办了《长沙三次会战大捷历史画稿展览会》，在长沙、耒阳、衡阳、桂林、贵阳、重庆等地展出。各地报纸作过宣传报道。三厅厅长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介绍了翟翊作画的辛苦与功绩。这批画由当时盟军（美国军队）携去七幅存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

翟翊在衡阳办画展时，为一位睡美人画了一幅画。在桂林被田汉看到，甚为赞赏，翟翊告以作画经过；田汉认为是一幅近代《汉侠流名图》，并即席赋七绝一首题画上：“自从胡骑入中华，雾鬓风环半失家，村店轻轻抽画笔，恐惊香梦到长沙。”并注曰：“翟翊同志赴湘北战地写生归，过衡阳，在郊外茶店中，为睡美人写此，风韵无比。即醒，问之为长沙人。田汉。”可见，田汉去国思乡之感甚深。《睡美人图》曾在西南几省画展中展出。此画不幸在十年浩劫中，还有田汉像片、书籍、信件等，悉被抄毁无遗。

翟翊因家庭负担重，由前湖南省立二中学生罗学谷介绍到五十兵工厂当训育课长，管理子弟中学、子弟小学和俱乐部工作，工资比三厅高了几倍。有时间可以自己作一批画，为个人开画展作准备。他为工人群众办了夜校，开展了文娱体育活动，深得工人群众的爱戴。由于他是三厅出来的，在兵工厂内惹人瞩目，逼他加入国民党，他感到非常不安与恐惧，藉与前妻闹离婚，久不上班，辞职离开了五十厂。在五十厂工作不到一年，去了成都。

1938年，我在衡阳省立女师教音乐课，突然收到他一封

信，称他有很难解决的问题，希望我能进城一趟协助解决。我进城找到了他，才知他已参加三厅工作，离开了教育界。原来是婢娘病重，两个孩子又没人管，他即将随三厅开赴桂林，眷属不能随行；想在衡师疏散的渣江乡找间房子，请我帮忙照顾一下老小三人；他在桂林安定后即来接。我看他实在没办法，老人和孩子着实可怜，我是他的学生，义不容辞应该帮忙。我与校长商量在校搭伙食，在校旁农民家赁了一间房，每天三餐由我在学校提饭去和他们一起吃。住了几个月，老人病愈长胖了，孩子们和我建立了感情，亲热地喊我叔叔。长沙文夕大火后，我写信叫翟翊来接他们，湖南不稳定，我不敢负此重责。他的回信是他自己不能来接，长沙可能不保，会殃及衡阳，希望我和老小三人一同去桂林，将来三厅有眷属车去四川。我征得母亲同意，带着他们三人到了桂林，并交给了翟翊。但他又要随三厅赴渝，眷属不能随行。翟翊婉言要我暂住些时等三厅的车并照顾老小。1939年4月底郭沫若厅长才派人接留桂林的眷属。翟翊为我登记的是他的妹妹，到重庆我对他说：“谢天谢地老人孩子平安，我第二次向你交差。”

以后，翟翊多次主动与我联系，并表白了心意，我在犹豫之后终于接受了他的真情，于1944年9月9日与他在蓉结婚。我担负了家庭的全部任务，分担他的苦愁，解决他的困难，全力支持他实现旅游写生开画展的夙愿。我希望他成为国内有成就为国家作出贡献的画家，从此他走遍了四川各地和西南几省的一些地方，取得了很大的艺术成就，经济上也会有很多收入。

1948年7月份我们全家五口，从重庆沿长江而下，到长沙后，我去湘潭省立女子师范教音乐。翟翊应华中美专之聘教美术。当时金元券贬值，我两的工资，难以维持五口之家的生活。张云乔同志曾约翟翊去广州，于是他去广州一烟厂任广告

部主任，月薪较高，解决了家庭的困难。

1949年10月10日广州解放。1951年翟翊被烟厂群众选出脱产到广州市食品工会任文教科长，管工人的夜校及俱乐部工作。又被工人选为广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

四、从事皮影艺术

翟翊在广州食品工会工作太忙累，身体每况愈下，染上了肺结核病。1952年秋，休假回湘养病。一天，在街上遇见阔别的老友田洪。次日在田家畅叙离情，田洪介绍了三位从省军区转业归田的灯影队老艺人何德润、谭德贵、邢梅生与翟翊认识。田洪对翟翊说：“你是新文艺工作者，是有名的画家，你看这旧皮影戏能否改进？这三位是省军区的灯影队艺人，参加中南区戏剧汇演失败了，现灯影队被精减下来，他们将转业回乡务农。”翟翊说：“先将皮影戏演出来看看，有些什么问题？改进的办法总不会没有的。”

翟翊在家养病无事，每天去田家研究改进办法，三位老艺人当然十分希望旧皮影能提高一步。翟翊认为旧皮影最大的缺点首先是在屏幕上显现操纵皮影的竹竿影子影响了看戏。他用光学的原理解决了这一大问题。后又改进用日光灯管直到现在。这样收到了听戏与看戏的双重效果。其次他提出扩大框幕，形成了今日使用的框幕。第三要使皮影戏重视说唱与重视看戏相结合，成为更臻完美的综合艺术。何德润是一位多年刻制皮影的能手。翟翊画出的人物、动物与布景等，他都能雕刻得生动逼真，有生活气息，民族风格非常浓厚，令人喜爱，翟翊很满意。谭德贵有高超的操纵皮影戏技术，他操纵的皮影，不论人物或动物，栩栩如生，引人入胜。翟翊认为他们能理解自己的意图，与他们合作，会取得成绩。又有田洪作后盾和蒋寿世先生的支持。还有省文联主席谭丕模的重视，翟翊有信心使皮影艺

术放出异彩。

翟翊创编了第一个皮影寓言剧，就是今日誉满全球的《龟与鹤》。这样生动形象的皮影戏一定会使儿童喜爱的。他问我：“你是幼儿师范的老师，你的学生到幼儿园教学是如何进行的呢？”我告诉他不论是哪门课，都是以直观教学为主，越是生动、形象、具体越好，孩子们喜爱，有兴趣，接受就快。他与艺人们研究又试编了一些儿童剧：如《贪心的猴弟弟》《熊和钟》后改名为《两朋友》以及《采蘑菇》《哪吒闹海》等优秀节目。

湖南省皮影队成立后，翟翊与我商量，想到湖南省立幼儿师范作一次试验性的演出，听听师生们的意见。湖南幼师的领导及师生听说送戏上门，十分欢迎。演出之后，大受师生们的赞扬，尤其是那些天真无邪的孩子们，更是看得津津有味，喜笑颜开，手舞足蹈，高兴极了。不仅使孩子们得到了艺术享受，而且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翟翊听了师生们的意见，又亲眼看到了孩子们喜爱皮影戏的情景，使他进一步认识到皮影戏既要为工农兵服务，更要为祖国的花朵儿童服务。使他更增强了信心，要走为儿童服务这条道路。

寓言剧《龟与鹤》与其他优秀节目，在治理洞庭湖的工地上慰问演出中，在抗美援朝前线慰问演出中，都受到热烈欢迎。当时省文联主任谭丕模同志想以文联的名义请中南区艺术处长崔嵬同志来看看改进了的皮影戏，听听他的意见。崔嵬看戏后大为诧异说：“这就奇怪，湖南有这么好的皮影戏，为什么不参加中南区的汇演呢？”谭丕模同志告诉他：“因参加中南区汇演失败后，巧逢翟翊同志从广州回来休病假，才帮助改进的。”他又汇报了改革的艰苦情况。崔嵬与翟翊乃三厅老同事，当时他听了非常高兴，对翟翊说：“你留在长沙继续搞下去，不要回广州了。”翟翊笑着说：“我是回来休病假的，已经超假，

广州食品工会也非常需要我。我对皮影是外行，这是好玩的尝试，帮帮老艺人的忙，谈不上是改进。这些老艺人可以继续搞下去，但需要领导上的支持与帮助，把他们组织起来。现在他们的生活都相当困难。”崔嵬说：“我早不知道，现在身边公款不多了，先拿200元给老艺人作改革与生活费用吧！”

崔嵬走之前向省委交待说：“要留翟翊在湖南筹组一个省皮影队。只几个月时间，翟翊与老艺人合作，就取得了很大成绩，这古老传统的皮影艺术，必须有新文艺工作者扶持协助，才有办法创新和前进，把翟翊调回长沙吧！”

不久，翟翊正要回广州销假。省委宣传部长唐麟派王之宪到我家，问翟翊是否愿意回长沙工作。翟翊当时以为是谭丕模同志要他回来筹组省美协工作的，就答应了。

1953年春，翟翊调回湖南，到省文化局报到。文化局领导要他筹组省皮影队，当时他未接受这一工作。他要谭丕模同志调他到省文联筹组美协，但省文化局和省委宣传部都不同意。唐麟又派王之宪来我家做工作，并说是中南区文艺处决定的。谭丕模也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同意了唐麟的决定。翟翊想以美协工作为主，兼顾皮影的改革，协助老艺人进一步提高。省委和文化局硬是不同意。

田洪同志深恐翟翊不肯组织皮影队，连忙写信向田汉汇报了皮影改革的经过。不久田洪转来了田汉写给翟翊的亲笔信，既表扬了翟翊改革皮影的精神，又肯定了取得的成绩。劝他继续搞下去，党和人民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后来田汉又写来了第二封信，直接寄给翟翊。劝他继续努力，巩固现有的成果，取得更大更好的成绩。不要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省文化局长刘斐章由田洪陪同亲自到我家劝驾，翟翊考虑再三，决定接受筹组皮影队的工作。他把后半生的主要精力献给了皮影艺术事业。

从1958年起，他又对木偶戏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与创新。他为湖南木偶设计了大量的人物造型与舞台布景。如《金鳞记》《拦马》《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八戒背妻》《智取威虎山》等新老剧中人物。如焦光普、孙悟空、猪八戒、杨子荣、一撮毛、座山雕等木偶形象，都有突出的创造性，在群众中影响很大。

皮影戏不仅在省内国内受到欢迎，得到普及，在国外也赢得了观众。从1953年起，湖南皮影队先后应邀去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法国、瑞士等十多个国家演出，受到广泛的好评，使中国传统艺术走向了世界。

1956年湖南皮影队扩大为湖南省木偶皮影艺术剧团，调来了副团长陈迈众同志，翟翊任艺术指导。同年，翟翊任中国美术家协会湖南分会理事。他又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湖南省文化局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员。他在回湖南工作的第二年还担任了湖南省政协委员。1979年，又任全国木偶皮影学会顾问，他还是全国粉画协会的会员。退休后又被聘为省木偶皮影艺术剧团顾问。

1964年湖南省木偶皮影艺术剧团在长沙湘江剧场演出木偶戏《智取威虎山》时，人物造型与舞台布景，为群众欢迎，轰动一时。加演了许多场次，有的人看了几遍。著名戏剧家老舍和漫画家华君武来湘访问（他们都是在三厅与翟翊共过事的）时，翟翊陪他们看了《智取威虎山》。他们认为这个戏的人物造型、舞台布景与设计、演出的操纵技术都是上乘的。华君武说：“这个戏有漫画味又高于漫画。”老舍说：“开创新的木偶戏是成功的，使古老艺术有表现能力。”1965年5月20日，

《光明日报》发表了罗盛美和李牧生合写的一篇题为《木偶戏也能表现革命题材》的文章，认为湖南省木偶剧团演出的《智取威虎山》在表演、舞台美术、人物设计与造型和木偶制作等

方面，有不少创作和改进，比较成功地发挥了木偶戏的艺术特色，不仅使观众看了栩栩如生，有些场景还达到“人”戏不能达到的效果。

六、1957年以后的经历

1957年在一次省政协会议上，翟翊作了书面发言，向省文化局提了一些具体意见，后刊于1957年6月3日的《新湖南报》。

1957年7月，翟翊被划为右派分子，因工作需要，仍留团工作。1960年到1961年担任团内喂猪工作。1962年上半年被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1969年，湖南省歌舞团演出《风雷颂》大型歌舞剧，由高第安导演，特借请翟翊去设计和绘制舞台布景，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文革”开始时，团内只有他一人一张大字报都没有写。但工宣队进团，他又作为右派分子被揪斗批判。1967年才获解放。当时团内派别林立，翟翊抱定一个宗旨，不参加任何组织，但各派分配他的劳动与工作，他都去完成。一派要他去湖南省湘剧院绘制《智取威虎山》的幻灯布景，另一派又要他去湖南省花鼓剧院绘制《海港》的幻灯布景，“湘江风雷”又命他为湘江风雷文工团绘制《湘江风雷颂》的幻灯布景，并画巨幅的毛主席油画像。他都完成了。尽管如此，我家还是三次被抄，我家虽穷，但损失很大。翟翊保存的几幅心爱的写生粉画、油画、字画以及中西画集（古今的都有）、十余套西洋交响乐唱片以及京剧唱片、还有很多书籍等，不是损坏了就是抄去未退还。1968年12月，翟翊被分配到河西省党校也是五七干校总校劳动。1969年12月，又被下放到汉寿清水坝省五七干校分校改造，1973年3月，回长沙治病，再未回干校，同年12月退休。翟翊在五七干校画了十幅画，内容以农活为题材，是他这一时期的重要创作。后来我只知原红色

剧院的经理邢自强保存一幅《春插》，我借来收印在《翟翊画辑》中，另一幅《春》曾由《小溪流》杂志的编辑姜振林保存，他在1983年《小溪流》第三期作为封底画发表了，但原画损坏未存。另外8幅不知下落。

翟翊退休后，主要教绘画爱好者学画，不辞辛苦，而自己却没有从事创作。1979年2月份，翟翊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身体也渐渐恢复健康。

七、旅游与写生

翟翊平反后，心情舒畅，决意出去走走，边旅游，边写生。1979年5月，我陪他作江南之行，先后到了南京、苏州、无锡、上海、杭州等地。中途因病在南京作了手术。11月返回长沙，旋住进马王堆疗养院疗养。住院一年多，身体健康逐步恢复，心情愉快，在院内画了四五十幅画，其中画了五张国画，其余都是粉画及写生像等，还为许多疗养的知名人士和疗养院医生画了粉画像，如为湘剧名演员左大玢画了两张，另送了一张为《疗养院的一角》的风景写生画给疗养院作纪念，已收印在《翟翊画辑》中。有一张疗养院的花卉，画得很好，可惜只画了一半，成了一幅“未完成的作品”，他即逝世。

1980年的一天，省民盟邀请了盟内和文艺界一批知名画家、书法家、篆刻家、文学家等当场献技，并拍了电视。翟翊当场为省文联主席魏猛克速写半身粉画像一幅。在疗养期间，许多领导同志和亲友去看望他，如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回湘探亲，也到疗养院相见，他们在三厅曾相识共事。他们见面非常高兴，并一起合影留念。

1981年4月17日，翟翊因病情转重，抢救无效，于下午8点35分逝世，享年74岁。一周后，举行隆重悼念会，省文化局负责人周季平在悼词中充分肯定了翟翊的一生。

曾 熙 传 略

赵民伊 *

曾熙(1861--1930)，字子纠，又字嗣元，别号农髯，湖南衡阳人，我国近代杰出的艺术家、教育家。少孤贫，母亲刘氏勤于纺织，送子求学。当时生活极为艰苦，常常一勺白水、一碟白盐、一碗白饭，可是他却更加坚定勤奋。1881年，不到20岁，考取秀才，学官张亨嘉赏识其才华，选拔到校经堂深造，学业越发长进。1892年中举人，湖南巡抚推荐到兵部任职，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湖南刘坤一督师山海关，他投笔从戎，进入刘幕，参与戎机。清政府卖国求荣以致战争失利，他只好仍然回到北京。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时，他参与康有为等发起的“公车上书”，慷慨陈辞，要求清政府拒和、迁都、变法，事虽未成而影响甚大。1903年，参加北京会试，中进士，补兵部主事兼提学使及弼德院顾问。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偕同曾先生的好友谭延闿两度登门拜访，请他出来共襄国是，他认为富国强兵，首先要培养人才，要求回湖南兴办教育。先后任衡阳石鼓书院及汉寿龙池书院主讲、湖南教育会长。在此前的1905年还创办了湖南南路优级师范学堂。1916年，应挚友清道人李瑞清的邀请至上海，鬻书鬻画，以劳易食，兼授门徒。1919年张大千由日本回上海，通过李梅庵、谭延闿、朱古微的推介，拜他为师。1930年，在上海病逝，归葬衡阳县界牌岷塘冲，享年70岁。

赵民伊系衡阳船山学院副院长。

先生是近代杰出的艺术大师，他的书法造诣极深，直逼古人而自成一家。篆书、隶书、八分书、真书、行书无所不精。他跟清道人李瑞清同在京师做官，同学书法，两人的书法同源而异流，都是先学秦汉篆隶以厉其气骨，再学六朝碑体以通其变化。李上窥钟鼎，下穷北碑，多用方笔，曾则上窥石鼓，下穷南碑，多用圆笔。当时论书法，有南北之分，“南曾北李”，各树一帜。曾先生认为，篆书以石鼓文最古，所以他的篆书以石鼓为宗；隶书始于秦代，秦吏的简牍不复存在，所以他的隶书以秦汉金石中笔近篆书而体近真书的为宗；八分书本是合篆隶为一体，备于东汉，蔡中郎是东汉的冠冕，夏承碑又是蔡中郎的极轨，所以他的八分书以夏承为宗，以华山为辅，旁及礼器、史晨以尽其变化（马宗霍《书林藻鉴》卷第十二）。

对于他的书法各家评价很高。李瑞清对时人的书法都不置评论，惟独喜爱先生的书法，他说：“农髯先生今之蔡中郎也。中郎为书学祖，农髯既通蔡书，复下采钟、王，以尽其变化，所临夏承碑，左右倚伏，阴阖阳升，奇姿谲诞，穹窿恢廓，使中郎操觚，未必胜之。”湖南道州何绍基擅长八分书，农髯先生也擅长八分字。康有为说：“道州体峻而公（农髯）体逸。体峻者见气骨；体逸者见性情。”可见他们的书法，阴阳刚柔，各有其妙。其实，先生虽以南宗为主，实则兼擅南北之长，所以沈曾植评他的书法说：“沟通南北，融会方圆，皆悟其所以分合之故。昔人以洞达二字评中郎书，若嗣元之神明变化，斯可以语于通达矣。”他的晚期作品的确是方圆兼备，寓刚于柔，用笔藏转，婉畅多姿，他所写的《吴公兴学碑记》最能体现这种风格。

晚年，名声大噪，求他作书的更多了，颇以作书为苦，于是取草篆行狎的笔意，描绘奇石古木，名花异草，偶然也画山水。他的绘画为当世所推崇，以为可以与宋元名家媲美。他作

画常在立意与用笔上着力，既不墨守成法，又不脱离优秀传统，与明末清初僧石涛、石溪，八大山人同一格调，具有创新的精神。他学石涛，竟至可以乱真。

他的书画理论是书画同源。为了论证这一命题，他举了很多例子：文与可看苏东坡画墨竹，惊为太傅的“隼尾波书”。米襄阳点染山苔，就象汉代人作隶书；赵松雪自题画云：“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于八法（即八分书法）通。”他说：“我的画是画呢，还是书呢？我将问问世上能够欣赏我的画的人。”他还总结绘画经验，说：“吾师万物，是吾法也。”并且命张大千多游黄山，以便尽览此山之胜，尽得此山之情。张大千遵照老师的话，三度裹粮前往，果然尽揽松石的奇诡，烟云的幻变。

先生认为学书学画，最重要的是品德修养和学问根底，他的道德学问为当世的人所景仰，陈立三说：“（农髯）弱冠博览，娴文艺，复以工书称侪辈。”他的文学修养，植根深厚，所以作书作画能够随心所欲，运变自如。他评李瑞清的书法时说：“以神遇而不以形遇。”又论画说：“吾胸有物，吾目无物。”这都是用庄子的哲理阐明作书作画的奥秘。他对门弟子反复申说，要未学书法先学为人。评钱南园的书法时说道：“（南园）先生正直不阿，海内钦仰。学其书倘并学其人，则书虽艺事，可进于道矣。”有一次，他与门弟子张大千欣赏一幅《十二金钗图》，这幅画把闺阁小姐与深山猛虎画在一起。他对张大千说：“孔子说‘苛政猛于虎’，虎者凶猛异常，贪得无厌，吮于吸血，横行山中。而行苛政的当道者，往往以仁者面目临世，犹如猛虎装出温柔的小姐象。”他正是以自己的品德和学修感染了他的门弟子。张大千晚年回忆说，曾师借着诗画文章的陶冶，使他的书艺蕴含着雅逸的趣味。又说：“曾师仗骨仁厚的作风使我深受影响。”

他的诗歌脱胎于魏晋六朝。他喜欢陶渊明的诗，作了几十首和陶诗。题画的诗更加超然拔俗。《题画松》诗：“龙吟今已老，清操岁寒留。曾记天台下，清声万壑秋。”《山水便面》诗：“轻云拥高树，溪烟横远山。中有隐君子，坐卧石泉间。”《梅禽图》诗：“铜瓶柴几伴微吟，同此书斋淡泊襟。几度寒犹吟骨立，一生洁不受尘侵。阳回地老天荒候，珍守风号雪虐心。终有和羹能济世，漫劳偷眼覷霜禽。”大抵出于性灵，自然超脱尘俗。

先生又是著名的教育家，曾创办湖南南路优级师范学堂，对于开发湖湘人才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当世誉为“南学津梁”的名教授马宗霍、李祖荫等都出于他的门下。那时在中国，废科举，办学校，时间还不太长，如何办理专业学校，没有现成的模式和经验，全靠在实践中摸索。他参考日本的学校体制，定出一套规范来，营造校舍，开设课程，延聘名师，充实设备，花费很多心血。他在学校开设国文、数学、格致、修身、外语等课程，还聘请了一些外籍教师担任外语和理科的教学工作。他自己经常对学生宣讲春秋辨夷夏大防的道理和王船山的《黄书》、《噩梦》，借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平时他经常给学生介绍一些读书和做学问的方法，他说：“学问之道以自得为真，宜作切实功夫，不可光影玩弄。”在人才的培养上，他采取不拘一格的方针，凡成绩优异，自学有方的学生，可以越级就读。此外，他还制订了学校管理的方法，诸如校产、教具、编制、经济、校规和成绩考核等等都作详细的规定。这些对于我国后来厘定学制和学校管理都有深广的影响。湖南教育当局鉴于他是教育界的耆宿，特聘他主持选派留学生的的工作，他在选拔工作中，一切出以公心，不徇私情。

先生为人正直，仁慈友爱。他的母亲刘太夫人艰苦勤俭，把他抚育成人，他对母亲非常孝敬。回忆少小时的情景，往往

呜咽啜泣，感叹不已。八国联军攻打北京，他在仓皇之中背起母亲走出都门，找了一顶轿子，自己抬起母亲，一肩走了40多里。母亲怜悯儿子，哭泣不止，他却莞尔而笑，表示不累，借以安慰母亲。后来母亲辞世，他不饮不食，哀恸欲绝，为了纪念母亲，把旧庐改为“慈德堂”。他与清道人李瑞清在北京，食必同桌，寝必同席，出必同车，切磋琢磨，互相砥砺。瑞清死时，他痛哭流涕，卜葬在南京牛首山，灵地筑祠，春秋奉祀，时人都称赞这种高尚的风谊。他对于人民的革命事业，曾给予深切的同情和支持。大革命时期营救了不止革命同志，衡阳刘子直一家被反动派追捕，由于他的大力营救，才得脱出虎口。在上海时，鬻书的润资非常丰厚，常常用来接济门人、亲友和贫苦人家。遗爱在人，人家也非常敬爱他。他病逝在上海，门人张大千扶柩至衡阳，还在他的墓旁筑一草庐，守墓一月而去。

先生治学严谨，先治大戴礼记和左氏春秋，后来随着维新变法的潮流，政治公羊春秋，提倡公羊三世说，作为变法的张本；又以春秋大义辨夷夏大防的道理作为抗御外侮、保卫祖国的依据。他的著作很多，有《左氏问难》十卷、《春秋大事表》两卷、《历代帝王年表》两卷、《和陶诗》、《书画录》《文集》、《诗集》各若干卷，然迭经日军轰炸和十年动乱，已经荡然无存。

朱经农与湖南教育

刘寿祺*

考查湖南教育的历史，就会要涉及到解放前任过教育厅长近12年之久的朱经农。解放前，在全国范围来说，湖南的中小学教育基础比较好，不论公办私立学校，都有一部分办得好的，这固然得力于湖南教育界的一些有识之士，但与在1932年至1943年主持全省教育期间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朱经农作为执行国民党教育政策的首脑，当然不可能完全清白无瑕，特别是在何键、薛岳主湘时期，可批评指责之处可能不少，比如不少人认为朱经农是CC派人物。他确与CC派关系密切，不过这有一个漫长的过程。1932年他来湖南任教育厅长时，正是何键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时候，何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又称乙派、皮刀派），当时湖南教育界绝大多数是反何的，赞成国民党中央派（CC派，又称甲派、钻子派）。何派取得省政大权后，民、财、建三厅都安排了人，教育厅本来也准备安排何派国民党宣传部长谭某，但教育界人士认为谭是“党棍子”，没有什么学术地位，坚决反对，谭某也就不敢出任教育厅长一职。这样，CC派为了不失去湖南教育界这块地盘，就让齐鲁大学校长朱经农担任教育厅长。何派有些人不大买帐，在某些方面时时作梗，朱很气愤，捆起行李要回上海，而教育界坚决挽留，并向国民党中央呼吁。CC派自然是乐得有人支持，既安慰了朱经农，又挫败了地方派。这是朱经农接近CC派的第一步。当然，他叔祖父做过常德知府，又是熊希龄的亲戚，似与湖南有点亲缘

*刘寿祺系我省著名教育家。

关系，但不是主要的。

另外，朱经农与何键表面上非常客气，互相称道，两人都擅长书法，有时彼此标榜，但在思想观点、教育措施上则貌合神离，矛盾也是很多的。何提倡中小学读经尊孔，请柳森严搞武术比赛，朱要实施杜威的民主教育，但又不敢公开反对何的主张，只得唯唯诺诺。

朱经农是1943年初离开湖南省教育厅的，这时，正值CC派与朱家骅派争夺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校长一职，当时教育部长陈立夫即请蒋介石兼校长，把朱经农安排为中央大学教育长，实际执行校长职责，不过经常要向蒋介石的侍从室汇报情况。这时朱经农跟CC派的关系又进了一步。朱家骅系统认为CC派既占住了教育部，又安排朱经农任中央大学掌握实权的教育长，很不甘心，两派继续争夺，于是陈立夫又把朱经农调任教育部次长（由无党派学者吴有训担任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仍不甘休，于是千方百计活动，终于当上了教育部长，这样朱经农原在朱家骅下面任次长，就不那么舒服了，他常在朱家骅那里碰钉子，回到办公室或家里后就大发脾气，于是朱经农又向CC靠近一步，所以人们认为朱经农是CC派人物，是有道理、有根据的。

从朱经农的整个经历来看，他不失为一个爱国之士，也曾是负有盛名的学者，对于湖南教育的维持和发展，作过不少的努力，至少在客观上起过积极的作用，可以说是湖南教育界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现就我所知道的朱经农的若干情况作些记述。

一、朱经农其人

朱经农初名有吁，字经农，江苏宝山县人，因其父任浦江知县，母随去浦江，于清光绪十三年(1875)6月出生于浦江

县署。他与湖南的关系甚深，学习和工作，先后有三段时间在湖南。清代末年，他还是少年时即来湖南，那时正值戊戌维新运动开始，湖南的黄公度、谭复生、熊秉三、皮鹿门等组织“南学会”，公开讲学，其叔祖命他每届必往听讲。4年后其叔祖任常德知府，创办常德府中学堂，他15岁以客籍考入该校，与覃理鸣等同学，课余喜读《新民丛报》、《游学译编》、《浙江潮》、《洞庭波》等杂志，渐萌革命思想，曾读梁启超所写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仰慕玛志尼之为人，光绪三十年（1904）即赴日本留学，入成城学校，得识龚练百，光绪三十一年（1905）孙中山、黄兴正在东京组织“同盟会”，由龚介绍加入同盟会，并由黄克强监誓，这是朱经农参加革命活动的开始。是年冬，日本政府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忿然相率回国，朱经农亦回到上海，遂和同盟会的部分同志创办中国公学，学校大多是进步分子，同盟会员占全校学生半数以上，如熊克武、但懋辛、胡适等，当时均在高级班肄业，学校革命空气非常浓厚，为清官吏所忌。有一次学校得密报，两江总督将于翌日派员来校搜查，为避免无端损失，全校同学于当晚各自检查行篋，将暗藏的《民报》等悉毁以灭迹，次晨密探来，一无所获。中国公学又是当时掩护革命党人的场所，如有一次龚练百告诉朱经农，同盟会领袖人物章太炎已出狱，将来校暂时休息，经朱经农等预先筹划，章来校匿居三楼密室，当晚改装，平安东渡日本。清当局对学校实不放心，为了加强控制，决定拨款将中国公学收归官办。对此全校师生极为不满，发生学潮，学生相率退学。朱经农与诸同学另组织中国新公学，得“同盟会”先驱者陈英士襄助，新中国公学即告成立。朱经农被推举主持教务，撑持年余，以经费不继停办。其时，朱的叔父在上海病逝，朱即离沪，受湖南高等实业学堂之聘教授英文兼农业学通译。他在湘任教，仍秘密参加革命活动。武昌起义后，湖南宣告独立，朱经农曾以

书生参与戎幕，稍后都督焦达峰、陈作新被害，他即愤然离湘赴沪。民国元年（1912）应宋教仁、覃振、仇亮等电约，赴京任《民主报》主笔兼《东亚新闻》总编辑，次年，二次革命爆发，两报被查封，军警指名搜捕，他逃走天津幸免。时值其姑父熊秉三出任内阁总理，得其掩护，重返北京，随张季直入农商部办理统计。袁世凯称帝后，他认为欲挽救国家内忧外患，非学习欧美的科学与民主不可。得友人之助，即赴美留学。在华盛顿4年，入乔治华盛顿大学，得学士、硕士两个学位，后又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研究生，成绩优异。1921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赴美考察，约其回国，任北大教授。两年后应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之约，赴上海编辑新学制教科书，次年任沪江大学教授并开设“教育学”讲座。翌年“五卅”事件发生，圣约翰大学学生全体退学，张咏霓与宋经农为救济失学青年，创办光华大学，朱经农任教务长。1926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他曾一度赴广州，旋即返沪与吴稚晖、杨杏佛等参加国民党党务工作。黄膺白出任上海特别市市长时，朱经农任教育局长，不久黄辞职，他亦引退。1928年蔡元培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他随任普通教育处处长，秋，大学院改为教育部，他任普通教育司司长，两年后升任常务次长，不久教育部改组，即随蒋梦麟离部。1931年春任中国公学副校长，代邵力子主持校务。6月任山东齐鲁大学校长。1932年任湖南教育厅长，1943年任重庆中央大学教育长，1944年任教育部次长，1946年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1948年去美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留在美国（其子在美国），不久即在美国逝世。

二、朱经农任湖南教育厅长的事迹

朱经农于1932年7月奉南京国民政府之命，任湖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到任之时，正值何键主持湘政，当时全省遭

受空前的大水灾，疮痍满目，人心不定，社会秩序纷乱，教育经费非常紧张，朱经农到湘后，即对湖南教育作一初步考察。关于初等教育他认为有三事亟待解决。

(1) 全省小学学生仅80余万，湖南人口3000万，学龄儿童以十分之一的比例计算，即为300万，入学率不到30%。失学者至少有220余万人，应使其有入学机会。

(2) 全省小学、幼儿园共2万余校，数目似不少，然分布极不均匀，如长沙1000余校，湘乡500余校，而靖县约30校，保靖仅20校，虽因人口多寡悬殊，然就地区及面积观察，学校发展极不平衡。

(3) 全省学校教员不足，质量均须提高，设备更应改善。

小学为国民基础教育，就此三端，力谋解决，必须全省人民共同努力，政府多方赞襄，方可年有进展。朱经农重视初等教育，采取措施兴办学校，乃使全省小学逐年有所增加。如1932年全省小学仅20900余校，1937年增至23800余校，1938年增至28800余校。一乡设中心学校，一保设国民学校，并规定于1941年度内完成。据1941年上期调查统计，全省1609个乡镇，仅18个乡镇未设立中心学校，已完成90.3%，全省20318保，除1491保已设有中心学校者外(中心学校已包括国民学校)，仅1050保未设立保国民学校，已完成95%，此外尚有未改办的私立小学6285校，该年度除岳阳、临湘两县情况特殊外，一乡一中心学校，一保一国民学校，已基本完成。全省小学生民国二十一年(1932)为873300余人，至1936年为938500余人，是年计划如能全部实现，可达到2646760人，占全省学龄儿童70%以上。除小学外，复于1935年8月开始实施短期义务教育，至1940年8月实施国民教育始行结束，大约可办理十期，预计可达29029班，每班以40人计，应有学生1,161,160人。又以湘西少数民族地区文化落后，特于乾城、凤凰、永绥、保靖、泸溪、古

丈、麻阳、通道等县设置短期小学，自1937年至1940年先后共办540班，每班以40人计，应有学生21000人。以上资料摘自当时的《湖南教育》月刊和《国民教育指导月刊》，其中中心学校的数字可能是实在的，学生数可能是计划数字。他认为湖南中等教育应设法改进的亦有二端。

(1) 学校多集中长沙、衡阳、常德等二三城市，发展也极不平衡，边远地区子弟就学尤为艰难。他力谋调整，以后在湘西创设了芷江乡村师范，在湘南创设了衡山师范。为了提高湘西少数民族文化，特在乾城设一特种师范训练班。各县联立中学亦加以切实整理。1937年秋，张治中来湘任省政府主席，虽提出以“廉、正、勇、勤”为施政方针，但成效甚微。芦沟桥事变发生后，省府乃办理民众训练班，规定高中及大学生凡受过军训的，一律集中训练一月，分赴各县，组织民众抗日。但日军南侵益急，湖南人心惶惶，武汉失守后，湖南沿铁路、水路交通较便的城市各级各类学校，不能不迁移安全地带。朱经农与有关各方研究，分全省为湘南、湘中、湘西三个教育区，各级各类学校分别迁移远离交通干线较为安全地区，继续开课。到1942年末，据当时统计，全省中等学校已达272所，其中中学为175所（包括省立中学12所，国立及外省迁来4所，联立中学10所，其中高中1所，初中9所，县立初中38所，私立中学111所，其中完全中学31所，初中80所），师范学校48所，其中省立11所，联立简易师范4所，县立师范32所，私立师范1所，职业学校49所。其中工业6所，农业1所，工农相兼2所，商业1所，医学2所，联立初级职业学校2所，县立初级职业学校4所，私立职业学校31所，内中级14所，初级17所。

朱经农主持湖南教育时，全省公私立中等学校由150校左右，增至272所，增加近一倍。当然师资不整齐，校舍设备还较简陋，但在抗日战争非常时期，不仅弦歌未断，还有相当发

展，也是很不容易的。

关于高等教育，朱经农到任之初，仅湖南大学一校，初具规模。湘雅医学院，立案手续尚未完成，群治法政学院分设湘、沪两地，创立虽已数年，然规模不大，立案更加困难。他认为高等教育第一要务，首先必须奠定三校基础，随图发展，抗战胜利后，再谋新的筹划。

社会教育方面，他来湘之初，远逊于他省，社教经费省预算中每年仅列4万余元。所办事业，只有三项：一是中山图书馆，大革命失败时，社会秩序混乱，被焚毁，所剩规模设备极不完备；二是公共体育场，亦因社会秩序混乱受到破坏，设备亦不完全；三是民众教育馆，省及各县刚开始创设。农村直到1934年才在长沙正式创设农民教育实验区四处：一设河西石佳冲，一设黄土岭，一设枫树坪，一设豹子岭。然因经费困难，事业尚不易开展。

为了保存典籍，除长沙省中山图书馆外，就南岳集贤书院旧址，筹设了省立南岳图书馆，初办时仅藏书4700余种，24000余册，以后逐渐扩充，初具规模。

电化教育原来一无所有，朱经农来湘后开始推行，在教育厅附设电化教育服务处，办理电教器械的修理、装置、统筹购发，技术辅导维修，人员训练分配及其他有关电教事宜。各县民众教育馆均设有收音室，供听广播。

关于民众识字运动，推行三教运动，号召凡识字的人，一人教三人，三人教九人，直到全部扫除文盲为止。

体育方面，只有长沙设了一个简易体育场，设备极为简陋，当时还难开展。

在教育行政方面，1926年设厅专管教育文化。1932年朱经农来湘时，厅只设三科，第一科管教育经费、教育统计及本厅收发、印鉴、文书、会计、税务等事件，第二科管各市县教育

行政及经费、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学校军事训练等事宜；第三科管高等教育、社会教育、补习教育、民众训练、健康教育、童子军训练等事宜。后因厅务日益繁剧，增设第四科，各科业务重新分配，另设两室。秘书室总值全厅各科文件的核稿以及其他有关全厅事项；督学室视察本省各级各类学校及各县教育行政机关。

教育经费，大约有两项来源，一为盐税附加，一为省府以拨款，虽逐年有些增加，但为数甚微，事业发展，仍感支绌。特别是货币贬值，事业发展更感困难。

朱经农在他任职10周年纪念之际，曾写诗数首，抒发他内心的情感。

五言绝句

皓月照疏林，秋宵客自吟。
况在烽烟里，骄倭尚未平。

五言律诗二首

(一)

兵车满临岳，月色带愁来。
树影参差舞，庭花寂寞开。
两几千里隔，一梦五更回。
惊起披衣坐，遥天晓角催。

(二)

帘外月如霜，砧声欲断肠；
愁看花弄影，空有桂生香。
食贵儿童瘦，才轻愧恨长；
可怜弦诵地，几处度沧桑。

七律二首

(一)

十年草草一劳人，顾我依然白发新；
报国有心空自许，阴符无效漫教陈。
亦曾飘泊同张俭，未结山庐伴李邕；
莫笑牛刀试鸡肋，弦歌留得武城春。

(二)

风枝摇月影婆娑，凉露中庭发浩歌。
剩有丹心酬祖国，欲凭时雨化菁莪。
连云爰舍开南岳，照野旌旗望汨罗。
教训十年堪一战，前方子弟楚人多。

从朱经农的经历和他所写的诗文来看，他与湖南的关系是密切的，感情是深厚的。他在湖南教育厅任职10年，先后处在两种极不利的险恶环境中，他领导全省教育界人士艰苦卓绝，把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维持下去，并有所发展，这是很不容易的。加以当时学校员工生活极端困难，有一部分人士不能不产生佣资思想，视学校如传舍，对自立自尊之道、立己立人之义有所忽视，这是教育界内部所产生的矛盾，他对这种矛盾提出唯有我们在上者作出榜样，树立风气以为倡导，在下者才能如响斯应，蔚然成风，见利不争先，赴义恐后人，如斯则人心可移，士习可正，国仇可雪、民族可兴。这种语重心长，既不想上，更不尤下，谦谦自责的君子作风，令人敬佩。

他待人接物，和易而诚恳，他认为任何人无论贤愚属何职业，各有其人格，均应当尊重。他严于律己，于公私取与之际，丝毫不苟，做到两袖清风来，两袖清风去。他笃信孙中山

的“三民主义”，经常把“三民主义”的理论与国外各种主义和学说联系起来研究。他博学多才，擅诗词，语意清新俊逸，书法秀丽雄劲，两项均自成一家。他的英语很熟练，能说能写，在国际学术交往中获得一定的声誉。他在行政工作之余，一直从事著述，我知道的，有翻译杜威的《明日之学校》、编纂的《教育大辞书》、著作有《教育思想》（原名《近代教育思潮》）等，解放前这些著译均先后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三、经朱农的教育思想

1943年朱经农离开湖南教育厅去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教育思想》一书，这本书针对当时教育界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全书提出七类问题，现简略介绍于后。

第一类问题：自由与纪律。他以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为指导，介绍并评论了西方各种教育思潮中的自由观念，他认为自由不是漫无限制的，自由中必须有纪律，有纪律才能获得自由。这种观点实际就是美国教育家杜威的民主教育的观点，对中国也是需要的。

第二类问题：个人与国家。他论述中外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产生的时代与根源，批判了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的教育思想在中国流传的弊端与危害，提出“民治主义”的教育观，一方面要充分发展个性，一方面也要重视社会秩序，才能使国家、民族、个人获得真正的自由，进而达到世界和平的目的。

第三类问题：斗争与互助。他首先介绍达尔文的“物竞天择”观点，也介绍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并分别加以评论。他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自然界的规律，是否适用于人类社会，还不能得到公正结论。“阶级斗争”的学说，他认为尚未经过严密的科学检验，还待证实。

当时有人把“生存竞争”应用于国际斗争，成为风行一时的主战论，同时又出现与这个观点相对立的“互助论”，其代表人物有克鲁泡特金等人，主战论的观点认为战争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巨轮，无论你咒诅战争或讴歌战争，战争还是照常进行，战争破坏和平，也只有用战争才能保卫和平，“以战止战”这是历史可以证实的。互助论者认为生物界的进步，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因，全靠彼此互助，一部世界文化发展史，便是人类互助合作的结果，如果人类不能互助合作，就无法生存，即令战争不可避免，战争双方内部也需要互助合作，可见互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因。

朱经农既不是主战论者，也不是互助论者，他引用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观点，认为社会之所以进化，是由于社会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调和，不是由于社会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互相冲突，人类社会经济之所以要调和是人类生存的需要。他赞成孙中山的观点，认为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种病症，不是进化的原因，战争论者、阶级斗争论者都将因果倒置了。但他还认为当一个国家被侵略的时候，必须充实物质建设国防，同时在教育上必须建设精神国防，在当前不能空谈什么“战争论”“互助和平论”，要踏踏实实地反对侵略，保卫自己的国家民族的生存。

第四类问题：学校与社会。他认为任何人决不能离开社会而独立生存，但旧时学校不重视个人身心训练，忽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学校与社会隔绝，学校教育与社会实际生活不发生任何联系，这种教育就失去真实意义，纠正这种弊端，应以适应社会实际需要为目的，学校教育既要使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增进个人知识技能，更要培养个人良好的性情、习惯，以及待人接物的良好道德品质。学校教育既要适应社会需要，办学的方针、设施、课程、教材教法等等都须随着社会的发展加以不断地改革。学校教育应使儿童认识环境、适应环境，并获得利用环

境、改造环境的能力。

第五类问题：知识与道德。他认为知识与道德是不能绝然分开的，“知”、“行”是合一的，他在这里首先分析构成知识的因素，中外“经验主义”者认为一切知识都是从感官接受外界的印象所构成的（包括中国致知在格物的观点），不是从感观得来的知识，不是真知识。理性主义或认为从经验得来的知识是零碎的知识，不是最高的知识，所谓真理是与生俱来的，超乎经验的，宇宙间有一种真理，永远不变，普遍适用，这种真理才是真的知识、最高的知识。这种真理是天赋的、是先天的，是上帝的观念，与人类的感观不同，由这种观点演绎出许多原理、原则，来解决宇宙间一切复杂问题。康德的调和主张，认为“经验主义”者，提供知识的材料，心灵把感观知识作为材料加以整理，成为系统的知识，这种知识是超经验的，是真理的本体（即中国所谓天理、良知、正气、良心等等）。康德的调和主张，仍属于“理性主义”的范畴。这些观点对教育是有影响的。“经验主义”专凭个人经验寻求知识，实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开端，但提倡自由研究的精神，注重感观的训练，创造直观教育法，增进教学效果，有其可取之处，但忽视内心求知的主观作用，把知识作为各种印象的联系，是一个缺点。同样的外界刺激在各人内心反应不一定相同，即感观所接受的印象，必须经内心整理或改造才能互相联系，构成知识。

他对于道德观念的分析，介绍了“乐利主义”，其内容是认为人类行为的“善”、“恶”以能否增加人类的幸福为标准。凡能增加人类幸福的为“善”，反之为“恶”，人类的行为的目的在于求“乐”与避“苦”，对一切行为，用产生的“苦”“乐”来判断行为的“善”“恶”。一般“乐利主义”者对于行为的“善”“恶”的判断重结果轻动机，但它们所具的

最高道德标准是求社会最大多数人的幸福，个人的幸福与大多数人的幸福矛盾时，即牺牲个人幸福，成全社会大多数人的幸福，要做到这样，社会常用“奖”“惩”的办法来改变个人的“苦”“乐”观。而康德的道德论，折中于经验哲学与纯理念哲学之间，他所立的“善”“恶”标准，注重动机，不问结果，用人的意志来分辨“善”“恶”。他不同意“乐利主义”者，以“利”“害”为判断“善”“恶”的标准，因为“善”的动机未必产生有“利”的结果，“恶”的动机未必达到害人的目的，不必计“利”“害”来损害“善”的动机。他认为人的心性是由“天理”与“人欲”交织而成的，当“人欲”与“天理”矛盾时，“天理”有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抑制“人欲”，这就是“良心”、“义务”。杜威兼采“乐利主义”及康德的折中观点，认为道德行为的判断，应兼重内外各种因素，动机与行为的结果应该是统一的，互为影响，不能只管动机不问结果。杜威从教育的角度来说，培养儿童的道德品质，应注意安排良好的环境，使儿童陶冶于其中，能够跳出自私的范围，认识国家、民族、社会的利益与自己的利益是密切相关的，扩大崇高的人格，实现大我。

他在这里提出“知行合一”“德”“智”兼修的观点，他引了孙中山的“行易知难”，“能知必能行”的学说，从行中求知，真的知识只能从力行中体验得来。教育不能只从书本上传授知识，最重要的是使学生在实践生活中获得知识，当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际，教育者不能漫不经心，一味空谈，应是教授学生的道德知识的同时，陶冶学生道德行为。因为道德不只是心中的好董，而是实际的力行，所以教育者应真正做到身教重于言教，“德”“智”兼修是教育最高目的，也是中国历代教育家的传统。

第六类问题：艺术与职业。他认为，无论个人与社会，艺术修养都是很重要的，个人的性情陶冶，社会的移风易俗，莫善

士“乐”，学校的教育不能偏重理智的训练，而忽略艺术的陶冶，人的感情，包括喜、怒、哀、乐、爱、恶、忧是与生俱来的，必须顺而导之，使其发而皆中节，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使其能欣赏高雅的文学、艺术、音乐、美术等。艺术教育德育的基础，可开拓人们的胸怀，可以扩大人们的眼界，可使人们感情意境超脱物质世界的局限，创造新的人生美妙的境界。他认为，一个国家的人民、一个民族艺术欣赏能力的高低与这个国家民族的盛衰很有关系。

职业教育的意义，他认为职业教育不只是狭隘的技术训练，使人们在经济上能够自立，同时应使其有文化的欣赏，艺术的修养，就个人来说，要选择自己特长使之充分发展，促其能创新，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不要因为有了专业训练，便把一切活动限制在狭隘的范围之内。从事职业的个人，既是社会的一员，就不能不参加其他社会活动，因此任何从事职业的个人，必须具有待人接物，立己立人的素养。

他还认为，所谓职业不仅仅是指从事工、农、商等事业者，所有国家干部（包括领导干部）、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干部都是职业干部，又都是国家的公民，必须具有公民待人接物处世的素养。

他还提出“艺术实用化、职业艺术化”的命题，他认为艺术不但是美的、愉快的，而且是实用的，如果艺术教育不切实用，就失去艺术的价值和意义。所谓实用，当然不是以获得金钱为目的，而是艺术对人类社会文明有所贡献。职业艺术化，就是说职业不只是呆板的工作，更不是在经济压迫下的生活挣扎，而是一种有意义、有乐趣、有计划的人们天才发展，使人各发展其所长，以服务于社会，这样的职业活动本身就是艺术，所以艺术实用化，职业艺术化，教育工作者要深刻领会和研究，才能真正得到正确的实施。

第七类问题：科学与宗教。他引用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中的观点，认为只是恢复中国固有道德文化知识，国家还不能与世界列强并驾齐驱，必须学习欧美的科学，并迎头赶上。无论是科学研究、国防建设、经济建设、教育文化建设等等都需要学习欧美的科学，培养人才。中国有丰富的资源，没有人才去开发，机器没有人去制造，复杂的生产机关没有人去管理，技术上的难题没有人去解决。先进国家在科学上一日千里，我国不急起直追，不用说迎头赶上，可能愈来愈落后，甚至国家、民族将永远受列强侵沦。所以目前当务之急是培养科学技术人才，这是教育界应该深刻认识和特别重视的。

他认为人生是需要宗教的，他本人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引证中外关于信仰的例子，追溯宇宙的起源，最后许多人认为宇宙间有一个真宰，创造宇宙，创造一切，这就是宗教的起点。在中国所谓“致良知，存天理”，这就是一种宗教信仰，不能拿到实验室去检验，只是各人内心中一种信仰。各种宗教都有一种信仰，这个信仰或称上帝，或称真宰、或称佛，或称真主，这个真主或上帝是创造一切的。中国需要科学，也需要宗教，但不必把两方的科学与宗教的争辩引入中国，我们需要科学以建设经济、文化、教育、国防等等；也需要宗教以维系人心，使心灵有所寄托，灵魂有所归宿，冥冥中得到安慰，使社会秩序得到安定。他认为当今人类最大的不幸，就是把宗教信仰一概抹煞，所以才产生无法无天，自私自利，灭绝天理现象。绝无良心，灭绝天理的社会是要毁灭的，灭天理的国家是要覆灭的。

朱经农这本著作，夏开权与我都参加校阅，书中观点代表当时教育界一部分较上层人士的思想，有它的时代性，也有它的局限性，如果研究中国抗战时期的教育思想史，可能还有些参考价值。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笃信“三民主义”的民主革命者，但没有更进一步，他的哲学思想没有跳出唯心

主义的圈子，但他教育思想上的若干观点是有价值的，可取的。为有关学校教育作用和任务的论述，人才培养极端重要性，学校与社会的关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不可偏废的观点，必须重视实践的观点，职业教育和艺术教育的任务，教师必须严格要求，言传身教的论述等都是很精辟的，到现在仍有参考价值。同时他是一个知识渊博、学贯中西的学者，虽在政界飘浮一些时间，却不是纵横捭阖的政治家。他是一个正直无私、忠诚勇敢的爱国主义者，又是一个真诚勤劳、立己立人的教育家。无论在耒阳、在重庆他对我党做地下工作的同志起到了一些掩护作用，保护了一些进步青年，虽不是完全自觉的主动的，但对党对人民是有益的。

朱经农离开湖南教育厅后，去重庆任中央大学教育长，不久调青木关教育部次长，我又随同他去中央大学和教育部，在这两个机关我担任秘书和督学。

建国后湖南教育界大事一瞥

——回忆我在教育厅工作三十年

曹国智*

我从1950年到1983年在省教育厅工作三十多年，先后担任过中等教育科科长、师范教育科科长、教学研究室主任、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1983年被选为省政协副主席，才离开教育厅。回首三十年来亲身接触的人和事，认为颇有实事求是记述下来的必要。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总结过去，对于今后的教育事业也许可以提供某些经验与教训。

一、接办私立中学

湖南私立学校素来发达，近代少数有识之士如胡元倬、朱剑凡、何炳麟等先生，立志教育救国，兴办学校，并到日本考察教育。私立中学如明德、周南、岳云等校历史悠久，办理认真，成绩卓著。清末民初，外国教会也在湖南设立了6所中学，其中以美国雅礼会创办的雅礼中学最有名。以后私立中学逐年增加，原来私立中学也有所变化。总的来说，私立中学在辅助公办学校提高人民文化科学水平，为国家培育人才等方面，都作了一定的贡献。

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前夕，全省公私立中学共有450所，其中私立267所，占五分之三。刚解放时，少数学校创办人或负责人随同国民党政府去台湾，学校陷于瓦解停顿状态。多数私立中学原有依靠校产田租和昂贵的学费收入，土地改革后校产发生变化，学生家庭经济情况也有变化，缴不起费，学校经费来源断绝，校舍破旧，设备简陋，无力维修添置。大批学生

* 曹国智曾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参军参干，许多教师应新疆东北等地招聘，纷纷外流，因而中学师生大量减少，学生减少到五六万人。根据当时实际情况，私立中学必须由政府接办。1949年8月中共湖南省委和省临时人民政府召开第一次校长及教职工代表大会，文教接管部部长袁任远宣布接管教育工作的总方针是“暂维原状，逐步改进”，接管工作原则是“宁慢勿乱，稳健勿偏”。1949年12月又颁布了“湖南省管理私立中学办法”，并发给私立中学补助费，稳定私立中学。1951年11月湖南省首先接办了私立明德、周南、清华、广益、岳云五所中学，改为省立中学，1952年下期，省教育厅将私立清华中学合并到省立一中。1952年8月第二批接办了私立中学65所，拥有教职工1270多人，学生16876人。1953年8月根据情况又接办了私立中学40所。

长沙市私立中学接办以后，一中为原省立一中与清华合并而成；二中为原联立长郡中学；三中为原明德中学；四中为原周南女中；五中为原雅礼中学；六中为原兑泽中学；七中为广雅与行素合并而成；八中为原育群中学；九中为原大麓中学与丽文中学合并而成；十中为原福湘女中；十一中为原妙高峰中学；十二中为原衡湘中学；十三中为原含光女中；十四中为原艺芳女中；十五中为原明宪女中。

总的说来建国初期接办私立中学是必要的，正确的，但在具体工作中仍然有不周到之处。比如有些学校的合并，事先与原校负责人协商不够，在大会上就宣布新校长名单，有些老校长本应是团结的对象，却一下子靠边站；又如私立中学中确有不少名牌中学，办得有特色，在接办时应当尊重他们办学的优良传统，却搞“一刀切”。私人办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必要的，现在要想集资办一所学校，兴建校宿，购置图书、仪器很不容易，如果当时少合并几所学校，保留其校舍设备，更有利于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

二、处理接受美国津贴中等学校

清末欧美各国教会势力，凭借不平等条约的特权，进入我国各地进行宗教宣传和文化传播。他们设立教堂，附设医院，开办学校。全国各大城市以及沿海地区设立的教会大学有十多所，中学更多，教堂所在的地方以及穷乡僻壤都附设有小学。美国在湖南的教会组织也都在进行办学与文化宣传活动。美国复初会 (The Reformed Church Mission) 在岳阳办有湖滨大学、湖滨中学及贞信女中，主要负责人是美国人鲍姓两兄弟；在沅陵办有朝阳中学和贞德女中，主要负责人是美国人郝来德。美国雅礼会在长沙办了雅礼大学和雅礼中学。雅礼会不是一个宗教团体，是由耶鲁大学 (Yale university) 一些毕业生组织起来的。美国长老会在长沙设立了福湘女中，美国遵道会在醴陵设立了遵道中学，长老会又在衡阳办了广德中学。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抗击美军，12月前政务院会议通过“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方针的决定”。1951年1月1日教育部确定全国教育工作的方针是“开展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彻底肃清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继续贯彻教育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方针，着重进行各级学校的调整、统一巩固、整顿工作”。

1月16日至22日教育部召开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会议，确定处理的原则和办法。2月，教育部开始接收全国所有接受外国津贴高等学校，1951年底全部接收完毕。

1951年2月中南教育部在武汉召开了“处理美国津贴中等学校会议”。湖南省文教厅副厅长孙仲起和中教科科长曹国智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由中南教育部部长潘梓年主持，教育处处长赵君涛（女，已故，李鹏总理的母亲）与中教科科长叶立群（现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具体组织。会议学习了教育部有

关政策，详细研究了中南各省接受美国津贴学校情况。会后，湖南召开了会议研究贯彻，决定分别接办了雅礼、福湘、丽文、湖滨、贞信、信义、遵道、朝阳、辰粹、贞德、仁爱、广德等十二所教会学校，制订了改革校政方案，并具体作出了处理接办教会中学的四项规定：

(1) 1951年将所有接受美国津贴的各级学校处理完毕，接收其他国家津贴的学校除个别政治上十分反动的，一般的履行登记，加强管理。

(2) 原来学校的一部分拿美国津贴，另一部分拿其他国家之津贴者，应改组其董事会（除去美国方面的董事，增添中国方面的董事）与学校行政，其行政权必属于中国校长。政府在停止美国津贴后，应酌定补助。但此类学校中表现十分反动者，政府应予以接办。

(3) 原来学校经费全部或绝大部分由美国津贴，在其来源断绝后，又无改由中国人私人出资办理的条件者，接收为公立学校。

(4) 原来学校经费来自美国津贴，大部靠学堂收入及由中国私人筹募者，应争取由董事会积极负责，除去所有外国籍董事，改为完全由中国人民自办的私立学校，其经费有困难时，政府可以适当补助。

接办工作进行顺利，各教会学校校长来长沙参加了会议。当时正是抗美援朝的高潮，在长沙市接办雅礼中学时召开了大会，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将雅礼改名为解放中学，文教厅长朱凡亲自手拿斧头砍断雅礼校牌，换上新校牌，以表示与美帝国主义决裂，群众情绪高涨。

三、批判邵干于教育思想

1951年6月，教育部向全国各级学校发出《关于开展电影

《武训传》和武训精神讨论与批判的指示》，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过程中，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也受到批判。1952年湖南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错误地公开“点名”批判了著名教育家鄧干于（1895—1974）的教育思想，指控他为“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思想典型”，湖南日报大张旗鼓连篇累牍地登载了许多批判文章，我因为解放前夕在行素中学当过教员，当时，又是教育厅的中教科长，也就写了两次检讨与批判文章，最后由教育厅厅长朱凡及省委宣传部部长唐麟写了总结性的文章，一场大批判才算结束。

1958年李烛尘先生响应毛泽东主席要民主人士当伯乐的号召，推荐了鄧干于。因为鄧先生当时患病，且心有余悸，谢绝出山。但当时的教育部长派人几次访问鄧先生，详细询问了“五年一贯制”的精神与具体办法。1960年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提出教育改革中的“四个适当”——即在全日制中小学教育中适当缩短年限，适当提高程度，适当控制学时，适当增加劳动，曾把鄧干于学制改革实验加了“按语”印发全国研究，可见教育部对这一实验是持肯定态度的，说明学制改革实验是允许探索的，不应作为政治思想问题加以围攻，以后北京景山中学的实验也曾借鉴鄧干于学制实验的某些经验。1986年行素老毕业生70余人写了怀念鄧干于文章，上书湖南省政协、省教委等有关领导，要求为鄧干于平反。省政协召集老教育工作者多人及部分行素校友举行座谈会，由省教委副主任朱尚同宣布为已故老教育家原行素中学校长鄧干于先生恢复名誉，实事求是地公开评价了他的一生。

四、关于学习苏联

1949年12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确定了教育建设的方针是：“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

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

1951年4月教育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省文教厅长朱凡、副厅长孙仲起、中教科长曹国智参加了会议,听取了董纯才副部长的报告,胡乔木关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报告,以及北师大教务长董渭川的有关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报告。会议讨论了《中学暂行规程》草案,《规程》中明确提出了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以及实施校长责任制等问题。会议中发给到会代表凯洛夫《教育学》、《世界教育史》以及加里宁著的《论共产主义教育》等书。会议以后,省教育厅召开了校长座谈会,讨论试行《中学暂行规程》草案等问题。

6月,中南教育部组织了东北教育参观团,湖南省文教厅派中教科副科长袁宗凯等7人参加。参观团全面调查学习中等学校采用苏联教科书的过程及效果,介绍苏联实施综合技术教育情况,在全省第一次传播和推广。7月,省文教厅召开中等教育工作会议传达全国中等教育会议精神,开始部分试用苏联教材。9月中南教育部批准湖南省文教厅在省立一中、周南、广益、长郡四个中学试行《中学暂行规程》(草案),实施智育、德育、体育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

1952年3月13日,教育部正式颁发《中学暂行规程》(草案),规定“对学生实施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全面发展的教育”,“使他们身心获得全面发展,为升入高等学校或参加建设工作打好基础”。4月,省教育厅召开试行《中学暂行规程(草案)》座谈会,主要是研究实行校长、教师责任制,实施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全面发展的教育,为进一步推行《规程》草案作准备。

1952年12月中南教育部召开师范教育会议,湖南省文教厅师范教育科长曹国智及湖南师范学院教务长金先杰、湖南第一

师范副校长李迪光等出席了会议，听取了中南教育部长潘梓年及苏联专家的报告。会议强调师范教育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指出国家已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需要大量有高度政治觉悟和先进科学水平的干部，这样的干部要由高等学校培养，首先要在小学、中学打好基础，因此，必须把中小学办好。而中小学要办好，决定于师范教育要办好，所以要把师范教育提到教育事业中的重工业地位，任何轻视人民教师，轻视师范教育的观点都是有害的。

会议提出了“学习苏联，面向中小学，集体教学”的师范教育方针，指出学习苏联是要解决思想体系问题。学习苏联，要学习共产主义思想，学习苏联先进科学成果，改革教学内容，凡是苏联已有的教材，我们都要尽可能以他们为蓝本，并尽可能结合中国实际加以改编；面向中小学是要解决理论与实践一致的问题。面向中小学是师范院校本身的任务，是师范院校教学异于普通大中学的主要地方，因此师范院校必需重视教学实习，必需注重教材教法的研究，必须注意附属中小学的工作，把附中、附小当作实习工厂，经常联系，要把俨然“天神”的教授与教师，拉到地面上来，联系中小学实际进行教学，不再做“天神”；集体教学是要建立集体教学制度，改进教学方法，要建立教学研究室。

中南会议以后，湖南召开了全省师范教育会议，传达中南师范教育会议精神，提出了贯彻“学习苏联，面向中小学，集体教学”的师范教育方针的意见。会后，全省师范学校形成了一股学习苏联的热潮，湖南第一师范、长沙幼师、桃源师范、衡阳师范积极行动，在教育学的教学，小学教材教法的研究，办好实习工厂——附小等方面，创造了许多经验。例如一师周仁济老师的小学语文教学法，儿童文学研究，徐玉礼老师的小学数学教学法，以及一师附小老师张巧训的教学都很出色。

桃源师范的教学实习，附小教师单银霞的教学，衡阳师范教育学、心理学教学，以及音乐、美术教学活动都做出了成绩，对全省师范学校有很大的影响。师范学校的老师今天回忆起来，认为五十年代是师范教育的“黄金时代”。

1953年省教育厅组织了一个教育参观团去武汉参观，并听取苏联专家普希金讲授教育学。接着印发了《普希金教育学讲演录》作为全省师范学校和中小学教师业务学习资料。省教育厅还组织了有关教育学、心理学的专题讲座，请师范学院教授陈孝禅、陈友端、郑其龙等讲学，要求师范学校校长、教师及中小学校长参加学习。

1955年教育部副部长柳湜来长沙视察，向全市教育行政干部和大学、中学、师范学校教师作了《关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的报告》。10月至12月中国中小学教师代表团前往苏联访问和考察。1956年由教育部副部长陈曾固率领的访苏代表团来湖南作《赴苏访问考察的经过和收获的报告》，历时四天，详细介绍了苏联的教育情况，1957年，湖南组织参观了在上海展出的苏联国民教育展览。这几年中还曾经派教育行政干部和教师到北京教育行政学院、北京师大、中国人民大学学习苏联教育理论。

回顾从解放初期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当时强调学习苏联“一边倒”，教育上也是从教育理论、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全面学习苏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教育工作强调学习苏联经验是必要的，收到了积极的成效。苏联十分重视教育工作，苏联普通教育强调统一水平，统一要求，具体体现在严格执行全国统一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颁发统一的教科书，乃至全国学校在同一时间上同一节课，我们学习苏联重视基础教育，重视师范教育，注意研究教学，提高教师水平，提高教学质量，的确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如何根据中国的实际研究多渠道、多种形式办学，如何灵活制订教学计划与教

学大纲，如何尊重学生个性，培养学生独立思维与创造能力等方面则是十分不足的。苏联十分重视教育科学研究与实践，从凯洛夫到赞可夫、苏霍姆林斯基、巴班斯基不断发展，最近苏联对历史的反思，教育科学研究上又出现了新思维成果《合作教育学》。我国正在面临改革的重要关键，总结五十年代学习苏联的经验教训，吸取今天苏联教育改革的经验，对于教育改革是有启发的。

五、1957年至1961年五年教育工作的曲折

1957年的春天是个“不平常”的春天。3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最高国务会议举行扩大会议的消息，毛泽东主席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报告，明确指出了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作为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开始出现。3月5日，中宣部长陆定一发表了《纪念整风运动十五周年》一文，提到要安排一次全国范围的新的整风运动。同日，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开幕。会议气氛十分活跃，大会发言连续了13天，《文汇报》上发表3篇文章题目是《解冻》，形容当时出现的新气象。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5月争鸣的热潮迅速铺开。5月初教育部党组发动全体教师帮助整风，并且具体订出了五项办法，于是，全国大、中小学在党的领导下同时参加“鸣放”。教师们所提意见比较广泛，包括教育方针、教育计划以及对知识分子的尊重等等问题。

6月8日，风向突变，《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提到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6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用特号字标出《对反

对社会主义谬论无法沉默，觉悟工人群众起而应战》。6月1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社论《是不是立场问题》，同时刊登了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以及署名为姚文元的文章《读报偶感》，接着又在《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激起了千万读者的愤怒》的标题下专留出的一小块版面《什么话》。6月19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内容较讲演时作了“若干重要的补充和修改”，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剧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的论述。6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不平常的春天》社论。

湖南省教育界整风反右，高等院校开展得比较激烈，如湖南师范学院当时划了右派分子120名，加上长沙师专划的100名共220名，其中学生150人，教工70人。如历史系古代史教研室12人，就有雷敢等9人划为“右派”。当时最大事件是所谓“五教授联合发言”（皮名举、解毓才、雷敢、姜运开、罗凯岚等五人）。6月2日《新湖南报》上登了他们的发言稿，《论三大主义与党委制的关系》，他们肯定了党委制的好处，仅仅提出了“党委会成员很少是专门学科的专家”，并列举了一部分党员和在一些部门中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表现，并提出了建议。这篇发言稿却被认为是毒草，五位教授都被划成了右派。教育系主任陈孝禅教授当时在座谈会上作了三次发言，就知识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党和非党之间、新老教师之间关系不够融洽，小学教师待遇低等问题发表意见，建议学习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特点。结果被认为是反党宣传，是“诬蔑教育一团糟”，被划成右派。师专副校长熊克立，教务长王果等也被划成右派。

1957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中等学校和小学的教职员中开展整风和反右的通知》，12月，湖南全省中小学也开

展了反右运动。长沙市三中校长、省政协委员、市民盟副主任徐继、五中校长陈守恂，九中校长老音乐教育家黄特辉、十中校长王鸿，二中副校长郭崇望、七中教导主任曹国果等以及许多中学骨干教师被划成右派，著名的有一中英语教师应开识和三中生物教师杨继华等。他们多次被批评，受到降职降薪等不公正的处理，有的被清洗出教师队伍，劳动教养长达20年之久，严重地损伤了教育事业的元气，影响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教育质量一度下降。

1958年在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号召和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指引下，开始探索如何创建具有我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走自己的道路。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教育工作有许多新的创造，如学校办工厂，开展半工半读，勤工俭学，兴办农业中学，高等学校实行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三结合，为理论联系实际积累了经验。但是由于“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湖南在大跃进中，出现了一些错误作法，在“全党、全民大办”的声势下，省教育厅在祁东召开了教学改革现场会，从省到县出现了“大办”教育的群众运动。学校的教育革命则大搞劳动入手，停课一月，大炼钢铁，土法上马，教师天天“搓黄泥”，有的教师说是“蹉跎岁月”。又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方式，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在教师中开展红专辩论，“拔白旗”，批判教师治校。师范学院院系批判14人，林兆宗、董爽秋、马宗霍、陈友端四位教授在全院被批判。在中学，把一些有真才实学的骨干教师当作“白旗”拔，极大地

挫伤了教师的积极性，在学生中批判“智育第一，分数挂帅，走白专道路”，致使学生不敢积极学习，教育质量一度下降。

1958年5月，中共湖南省委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宣传部长唐麟传达了省委常委关于教育工作的意见，强调要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同志的报告作为武器，把教育工作抓起来，认为前一段大搞劳动，劳动时间过多，劳动强度过大，“自给自足”的口号不恰当，强调了学校文化科学知识教育的作用，要积极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如忽视这个环节，将要遭致严重后果，造成教育工作中的历史性错误。

1958年到1959年8月庐山会议前，毛主席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庐山会议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八届八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错误决定，毛主席在一个批示中说：“庐山会议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庐山会议以后，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周小舟在湖南受到批判和错误处分，被撤销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

1959年庐山会议前教育厅长方用传达了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有关教育工作的指示，要组织调查研究，了解学校教学实际，总结抗战前明德、周南、岳云等老学校有用的经验，采取措施积极提高教学质量，三年赶上抗战前中学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还指出要加强小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培养小学生高尚的理想、良好的品德和文明行为习惯，不要让小孩过多地参加社会斗争，“大人之事，小孩不要参加”。

当时根据这些精神，我们作过一些调查研究，到长沙市一中等几个中学系统听课；比较研究解放前后的各科教材内容；召开老教师座谈会，研究改进教学方法；并组织了编写班子，编

写小学生思想品德教育教材提纲。

庐山会议后，周小舟同志关于教育工作的意见也受到批判，方用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项工作也就停止了。湖南教育界反右倾，主要批判了师范学院党委书记苏镜。一是批她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的所谓右倾，因为苏镜1958年来湖南工作以后，说湖南师院右派划多了，对“拔白旗”也有看法；二是批她从小搞劳动入手开展教育革命有不同看法的所谓右倾；三是批她与周小舟、唐麟、杨第甫等同志来往密切，追查他们所谓反党的政治关系。实际上苏镜的意见是正确的，对她的批判是错误的。师院教务处秘书汪季昆，由于1958年写《一年教育革命总结》，提到劳动过多影响教育质量，因此在反右倾运动中以所谓反对党对学校的领导，同情包庇右派，否定1958年教育革命等罪名受到错误批判。中学也搞了反右倾运动，少数校长如师院附中校长李迪光，长沙市一中副校长旷璧城，也被错误地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0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在新的十年间要在主要工业产品方面赶超英国，全国教育工作的形势也是快马加鞭。1月，中共湖南省委在桃江县召开全省农业中学现场会议，省委书记胡继宗在会上作了报告。2月，省委宣传部在汉寿一中召开中学政治工作现场会，省委宣传部长徐天贵在会上作报告指出：湖南上届高中毕业生升学考试成绩平均49.7分，位居全国第八，要求本年应届毕业生成绩赶上全国最先进水平。教育厅长王乐天作了“学福建，赶福建，赶上全国先进水平”的报告，要求大抓教学，提高升学率。1960年高中毕业生平均成绩较1959年提高20分，而1959年平均成绩略低于1957年和1956年。

3月，中央文教小组召开省市文委书记会议，明确教学改革方针、原则和文教部门大办生产企业，开展学术批判，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等方面的具体方针政策。3月，二届人

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在会上作了“教学必须改革”的发言，提出进行规模较大的试验，“在全日制中小学教育中适当缩短年限，适当提高程度，适当控制学时，适当增加劳动”，并批判了“教学中的量力性原则”。教育部部长杨秀峰作了“积极进行教学改革，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的发言。

4月，中共湖南省委召开文教书记会议，传达了陆定一的报告，教育厅长王乐天作了有关教学改革的发言。会上确定了一批试点学校，教育厅以长沙市一中、幼师附小、大同小学为试点，各专市都确定了一所学校为重点，5月，全省有110所完全中学（占全省完中65%）开始进行教改试验。11月湖南省委召开地、市文教书记会议，徐天贵作《教学改革试点总结及今后意见》的报告，提出“中小学决定实行十年一贯制的新学制，对号入座，继续试行八年制、九年制”。

根据会议精神，教材要“大破大立”，省委成立了教材编审小组，由何大群担任组长，曹国智、甘清波担任副组长，组织了全省大、中小学各种优秀教师300多人，集中在长沙幼师，苦战了一个暑假，编出了中学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科教材及小学语文、数学教材。教材内容主要参考北京师范大学新编的一套九年制教材和华东师大新编出的一套十年制教材。由于全省普遍采用新教材，各年级对号入座，一下子铺开，加上教材内容太深，教学进度太快，一时盛行“双高课”，一节语文课教二三十页课文，学生有许多字都不认识，因此出现了新旧教材不相衔接，教学工作极其困难的局面，好在短时间内即采取了补救措施。

1960年进行的教学改革实验，主观愿望是好的，但提高程度脱离了教师和学生的实际；大破大立打乱了各科教材的体系，一度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至于当时提出的“学福建，赶

福建，赶上全国先进水平”的口号和全省各地区按高考成绩排队的作法促使各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影响深远，不利于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贯彻，则是今天应当吸取的教训。

1960年全国高等学校搞了学术批判。湖南师范学院院系批判了15人，其中全院大会批判的有王石波、谭文炳、郑其龙、杨继本等。据当时统计，全院出了8万张大字报，写了3000篇批判文章，伤害了一大批教师。特别是副院长、二级教授、民盟中央委员林兆惊同志，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思想进步，作风正派，工作负责，对教学、科研、师资培养作了很多贡献，成绩卓著，由于他在1957年反右，1958年“拔白旗”，1960年学术批判中都受到批判，政治上被打击，精神上受摧残，不幸于1960年5月含恨逝世，是极其沉痛的教训。

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制订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教育部也召开会议研究贯彻这一方针，总结经验，陆续制订出大、中、小学工作条例。湖南参照教育部《高校六十条》和《关于全日制中小学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拟了《湖南全日制中小学工作条例》（草案）。9月20日至10月5日，中共湖南省委召开了全省文教工作会议，总结几年来教育工作的经验教训，徐天贵部长的报告指出：“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社会活动和政治运动占用时间太多，普通中学一般达到全期三分之一以上，主要是我们对党的教育方针认识不全面，对学校以教学为主的思想不够明确。”要求在教材规章制度等方面不必提“大破大立”，一种新教材，一种新的规章制度未拟定以前还要“未立不破”，提出“提高教学质量必须确立以教学为主的学习秩序”。教育厅长屈正中发言提出：“在学校内必须严格控制各种非教学活动，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保证教师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教学，学生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学习。各级学校在各

科教学中都必须高度重视基础知识的传授和基本技能的训练。一切有经验和水平高的教师必须用于教学第一线。”

10月，中共湖南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印发《关于学校教育工作的意见》，提出：“学校以教学为主，如同工厂、农场以生产为主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学校如果随意停课，就等于工厂、农场随意停止生产，是绝对不允许的”。会议精神贯彻以后，稳定了教学秩序，使教育工作经过三年曲折以后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1961年12月25日至次年1月12日，教育部召开了全国师范教育会议，省教育厅派朱林森、曹国智、何大群、何戈心等参加了会议，听取了教育部长周荣鑫、副部长林砺儒、董纯才的报告和国务院文教办主任林枫的总结报告，初步总结了1952年至1958年以后师范教育两个阶段的重要经验。湖南召开了全省师范教育会议传达贯彻，总结湖南师范教育前段强调学习苏联联系中小学实际，对提高文化科学知识程度强调不够，后段强调了提高程度但又脱离了中小学实际，今后必须全面认识师范教育的性质与任务，中等师范学校既是保持相当于高中的文化科学程度，又要体现师范教育的特点，联系小学实际，重视教育学、心理学、教材教法的教学和教育实习的指导，保证培养合格的人民教师。

1961年12月，省教育厅召开了全省语文教学会议，总结几年来语文教学的经验与教训。教育厅长屈正中和副省长周世钊作了报告和总结。原来从1957年以后，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的影响，教师栗栗危惧，唯恐教学思想性不强。反映在语文教学上勉强联系实际，不论是什么课文，都要联系到歌颂“三面红旗”。但有的基层干部到学校听语文课，以后又说“你联系实际讲了全国，就是不联系本县本乡”。教师觉得为难，每节课都要想方设法勉强联系实际，于是有许多教师把语文课教成了

一堂不高明的政治课，学生听了许多空论，而字、词、句都没有搞清，语文基本训练很差，教学质量不高。根据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全国文科教材会议上的报告精神，会议报告强调语文教学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的统一，“文”与“道”的结合。提出如果脱离语文课文，牵强附会勉强联系实际，空洞说教，把语文课教成政治课是不恰当的；另一方面如脱离课文思想内容，专谈篇章结构，考证字义，支离破碎也是不恰当的。要搞好语文教学，教师应认真钻研教材，把课文讲清楚，使学生从用词造句，布局谋篇等写作方法的理解中深入思想内容，懂得作者的意图，体会到语言文字的恰当和优美，使学生知道思想内容和语言文字不可分割的关系，从中懂得一些道理，获得一些经验。

这次语文教学会议与1955年1月全省语文教学座谈会的精神是一致的，对改进语文教学，提高教学质量起了积极的作用。

六、1962年至1965年教育工作的波折

1961年以后，湖南在教育工作中积极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1962年至1963年主要贯彻大、中、小学校工作条例精神，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教师水平日益提高，教学秩序稳定，教学质量显著上升。1962年方用平反复职，召开普通教育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教改会议精神，研究如何办好重点学校，提高教学质量问题。

1962年9月，在湖南宾馆召开了部分中学校长座谈会，为教育部召开关于提高教学质量的会议作准备，全省重点学校校长参加座谈的有长沙市一中校长袁宗凯，副校长旷璧城，湘潭市一中校长符石安、张学粹，岳阳市一中校长吴晓霞，浏阳县一中校长胡国运等25人。会前省教研室作了调查研究，写出了《1962

年高考试卷分析》，就当时教学工作中存在问题提出了意见；并组织少数校长到浏阳县一中考察，写了《浏阳一中调查报告》，对该校校长认真抓教学，学校教学秩序安定，读书风气良好提出了表扬。

座谈会就当时教学工作中存在问题及校长应当如何抓好教学等问题热烈讨论。1962年高考作文题目为《雨后》，许多学生不懂得写抒情散文，写的是千篇一律的政治空论，大家针对学生作文喜欢喊口号不肯写真心话的现象，分析语文教学中存在离开教材进行思想教育的问题。大家针对学校校长不敢管教学，校长与支部书记工作上发生矛盾，提出重点学校校长责任制问题，应当由谁吹哨子问题，并草拟了有关教学管理的各项制度供大家参考。那一次座谈会开得生动活泼，到会校长畅所欲言，对于交流思想改进教学提高教育质量起了积极促进作用。

1963年5月，教育厅党组向省委递交了《关于提高全日制中小学教育质量和重点办好一批中小学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我省现有全日制公办中学921所，其中完全中学190所。拟在今后10年内分成三批办好完全中学60所，初中300所，形成我省教育事业的“小宝塔”。所谓形成“小宝塔”就是要办好一批重点学校，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全省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提高。对全省各地区重点中学，我曾进行考察，除长沙市一中外，我到过常德一中、岳阳一中、湘潭市一中、浏阳一中、衡阳市八中、吉首民族中学、沅陵一中学校，听取了学校工作汇报，与校长、教师座谈，系统听课，我认为这一批学校的教育质量、校舍规模、仪器设备、教师水平、校长领导都是比较好的，有些校长如长沙市一中副校长旷壁城，周南女中校长周昭怡、常德一中老校长沈克家、岳阳市一中老校长吴晓霞、湘潭市一中老校长符石安等都是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忠诚于教育

事业的专家，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

1964年，随着“四清”运动的开展，教育战线也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6月，省委组成工作组在长沙市一中驻点。长沙县委继大托区中小学教师集训以后又在黄花区搞了第二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参加集训的中小学教师323人，时间24天，提出“进一步揭透阶级斗争的盖子，把自觉革命和开展群众性的相互批评相结合”，并“采取了一些办法发动群众挖敌情，清除毒素，使敌人暴露和孤立起来，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为教师队伍的政治清理打好基础”。

6月，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举行预备会议，教育厅党组根据省委指示指出，“这次会议主要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抓思想，大抓阶级斗争，培养训练教育战线上的骨干”。省委常委听取了汇报，并对会议的开法作了具体指示，确定“以阶级斗争为纲，从学习双十条入手，大揭学校阶级斗争的盖子，进行政治思想上的自觉革命”，会议安排了7天，原定的时间不够，延长7天。

湖南清理教师队伍，先后提出了“六条”和“三十个字”（地、富、反、坏、右、党、团、警、宪、特、军师团营连，专县科乡保，僧尼道巫会，资代小牙娼），凡属三十个字范围的人一律清洗，不管有罪无罪，也不问现实表现，因此，“四清”点上的许多教师受到了错误的清查和处理，特别是“龙普腾事件”的处理，使教师人人自危。

“龙普腾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呢？1964年6月茶陵一中贫农女学生朱文文向学校申请助学金没有得到批准，她向班主任龙普腾提出书面意见。龙召开班民主生活会对她进行帮助，并找朱个别教育无效。朱于6月25日晚写了绝命书投河身死。事后，茶陵县委按照常情作学校事故处理，对龙追究了事故责任。8月下旬，省委、湘潭地委突然派来了工作组，说这是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革命报复事件”。召集全县中、小学教师开会，大字报铺天盖地声讨龙普腾，对教师进行整风，个个作检讨，人人过关，搞了两个多月。以后，龙普腾被判处无期徒刑，投入监狱，他的妻子谢兰雅被开除教师公职，与这件有牵连的都分别作了处分。接着全省范围内都开展了一个类似龙普腾事件运动，把出身不好的教师在学生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都说成“阶级报复”，到处揪“小龙普腾”。许多教师受到打击，教学积极性受到很大挫伤。1979年1月，龙普腾被撤销原判，恢复了他的工作。凡受株连的也全部平反。

在湖南师院，1964年3月省里派了一个12人的“四清”工作组，9月份又扩大为170人的工作队。先是集中力量在中文、数学两系进行试点，以后逐步铺开到各系各单位，一直搞到“文革”前夕。“四清”中教师干部“洗手洗澡”人人过关，许多教师受到了过火地政治批判，一些教师的家庭被遣送回农村，特别是中文、数学两系受到的冲击更厉害。湖南1964年在少数学校中进行社教试点中，造成了不良后果。这已是临近“文革”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七、“文革”十年的重灾区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育系统更是重灾区，损失难以估计。运动一开始，省教育厅机关就受到很大的冲击。大字报铺天盖地，揭批所谓“十七年教育黑线”的盖子，矛头指向“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我首先被点名指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靠边站，和“走资派”方用、朱林森同志一起挨批斗，教育厅机关也就很快处于瘫痪状态。不久社会上两派斗争剧烈，厅内造反派暂时放松了对“走资派”和“反动权威”的批斗。1967年五六月间进入“清理阶级队

伍”的阶段。我由于1935年在北平师范大学参加“一二·九”运动以后，1936年暑假曾经在长沙被国民党省党部逮捕，经家庭保释，历史早已审查清楚作出了结论，但到了“文革”中又被翻了出来，被诬为“叛徒”，从此在机关被“群众专政”，关了起来，日夜挨批斗。1968年10月，省直机关干部集中到河西省委党校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文教战线编为第二大队。“专政对象”编一队，我和40多人集中在一间教室“学习”，除教育厅方用、朱林森和我几个人以外，有省委宣传部七个部长（秦雨屏、徐天贵、屈正中、张时杰、佟英、方克等）和两个副省长（王含馥、徐明），还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王学膺、刘晴波、汪澍白等。我和戈明、陶蒲生、孟叶鸣等七个女同志白天坐在教室里写“交代”，晚上回女寝室睡地铺，相互之间不准谈话。

1969年4月，党的“九大”以后，我和戈明等一部分人解除了“专政”，编入学员队。1970年5月对我的历史作了结论，历史证明我是清白无辜的。不久，经审查作了结论的人，都被分配下放农村锻炼，我分到汉寿清水坝五七干校，敲锣打鼓地欢送，我是带着“白袖章”进专政班，戴着红花去五七干校的。当时我已54岁了。在五七干校3年多。当时同在清水坝干校的有杨第甫、袁学之和陈宇眉夫妇，还有徐明、胡代炜，刘正，田后风等许多同志。1973年我才离开干校，年底重新恢复工作。从1966年到1973年整整7年我没有工作，因此对那一个时期的教育工作，不太了解。

“文化大革命”初期，师范学院林增平、马积高、羊春秋三同志被作为所谓“黑帮”揪了出来，在湖南日报上公开点名批判。师院院长刘寿祺被当作“走资派”、“牛鬼蛇神的保护伞”揪了出来，后来又以“特务”、“反共老手”等莫须有的罪名被送进“牛棚”，1970年和1972年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

子”关押多年，三中全会以后才平反。师院许多教师被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送进“牛棚”编入劳改队，中文系副主任、副教授李枯夫妇被迫双双自缢，含冤去世。至于中学校长、教师被批斗，剃半边头，被关押的不知多少，长沙师范老校长姜国仁被关、被斗时间很长，长沙市十四中副校长、著名女书法家周昭怡被审查批斗后说：“我是伍子胥过昭关，头发全白了。”学校都早已停课，“红卫兵”外出“串联”满天飞，学校图书仪器被毁，岳云中学老校长邓轩宇同志说他看见一担一担的图书往火里丢，好象自己的心也被烧伤了。全省学校校产的损失难以统计。

1972年和1975年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先后提出挽救教育的措施，广大教育工作者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守岗位，艰苦努力同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主义进行了长期斗争，取得一定成绩。但在当时条件下，教育工作仍然遭受“左”的冲击，无法扭转局面。1970年以后广大教师，仍然戴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遭受歧视和冷遇，师范学院大批教师被赶往平江农场劳动改造。有一批教师在那里喂猪、喂牛，拾野粪，守庄稼、赶鸟。1974年“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反“复辟”、反“回潮”和1976年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又伤害了许多知识分子，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学校教育受到极大的挫折。在一个时期内，学校强调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大搞开门办学，文科以中心任务带教学，理科以典型产品带教学。1975年在“学朝农（朝阳农学院）的影响下，学校被当作“彼得堡”，教研室被当作“土围子”，大办分校分院，大搞系科专业合并。1975年至1977年，师院先后两批组织近2000名师生参加“农业学大寨”，在农村每月集中学习文化8天还保证不了，严重地破坏了正常教学秩序。

当时一般普通中学也是强调阶级斗争，强调大搞劳动。长

沙市许多中学都在农村设有分校。教材教学内容也削弱了基础知识,强调联系阶级斗争,结合生产劳动。语文教材不断受着政治斗争的影响,跟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方向转;历史教材强调阶级斗争,变成了农民革命运动史,“帝王将相”都要砍掉;生物教材成了“养猪”、“种稻”的农业生产知识,还用“八字宪法”编过教材,物理教材强调“三机一泵”;化学教材强调化肥、土壤,大大削弱了科学文化基础知识,耽误了整整一代人。

回顾三十年的湖南教育工作,总的来说,“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路线是正确的,成绩也是大的,17年培养出来的学生,绝大多数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正在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左”倾的错误和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教育工作不断受到干扰。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拔白旗”,1959年的反右倾,1960年的学术批判,1964年的“四清”,都使教育界的代表人物广大教师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严重地影响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到了“文化大革命”,教育事业更受到极大的摧残,一场浩劫使教育质量严重下降,耽误了整整一代人,各条战线的人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严重地拖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后腿,教训是极其深刻和痛切的!

对《解放湘南》一文的订正意见

郭明龙 *

《湖南文史资料》第25辑刊有刘亚球同志所撰《解放湘南》一文，其中一些地方是与事实不符的。现就我所知，提供一些简要情况：

刘亚球同志说，他是1948年10月来到“老红军部队粤北支队”的，然而事实是，那里只有“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总队”（简称边总）。“边总”和五岭地委成立于1947年，由设在香港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领导。“边总”的基础是东江纵队北撤时留下的部队，后发展为三、四个支队，以及北上先遣队，也称湘边队。

该文把湘边队写成“桂东游击队”是不妥的。因为湘边队是1947年以原湘赣边区抗日革命军为基础，由五岭地委和“边总”命名而组建的。它经历了几年的艰苦斗争，到1949年初已发展为五个大队七个武工队的武装力量，分布在桂东、宜章、崇义等十多个县活动。

该文的主题是解放湘南，不能只谈湘南支队。因为当时湘南存在三支部队，即湘边队、湘南支队和湘南游击司令部。

该文说：“原桂东游击队回桂东，具体布置由我和李林同志商量。”这与事实有出入。因为湘边队从未离开自己的根据地，即使在斗争最艰苦的日子里，也一直坚持在桂东。刘亚球同志从五岭来湘南时，我就是在桂东根据地见到他的。虽然他

* 郭明龙系湘边队政干大队长。

是五岭地委委员，但湘边队工作始终是由桂（东）、汝（城）、资（兴）、崇（义）工委（前为湘赣边工委）直接根据五岭地委和“边总”司令部的部署与指示进行的。

湘南支队成立的时间，不是如该文说的1949年3月，而应是7月。1949年8月7日刘亚球等同志曾联名发出通知说：

“我们于24日接奉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粤赣湘边区党委7月22日电令，……正式成立湘南支队司令部与政治部……”。

在谈到湘南支队筹建情况时，该文提出：“参加工作的同志编成四个组，……桂东组原工委书记唐瑞”等，这在事实上不存在的。唐瑞是1947年来湘南并担任湘边队政委、湘赣边区工委委员。1948年撤销湘赣边区工委，改为桂、汝、资、崇四县工委，唐为书记，直到1949年7月他离开湘南为止。1949年6月桂东解放后，成立桂东县委（不是县工委），郭名善为书记。唐瑞从未担任“桂东县工委书记”、“工作组长”，湘边队也从未改为“工作组”。

该文分析形势，认为1948年8月及其以后，湘南国民党势力极大，气焰嚣张，我方则深入群众，摸清敌情，站稳脚跟等，与实际不符。当时国民党败局已定，气息奄奄，4月我大军渡江后，更如惊弓之鸟，各自寻找出路了。

该文称1949年春节，郭垂炎率部攻打资兴青腰乡公所，以后又攻打郴县光华乡公所等，完全搞错了。那时，湘边队第三大队大队长郭垂炎率部在桂汝一带活动，根本没有到那边去。青腰乡是1949年夏为湘边队资兴武工大队所解放。

该文提到“湖南保安族李可才一个团、白崇禧两个团，由郴县进驻汝城九峰”等，事实上，李可才团是1947年调驻桂东，被我军狠狠打击后，才于1949年4月退守汝城县城的。5月，我湘边队攻击离汝城十里的上桥，它不敢出援，随后从下湾逃跑，被湘边队阻击，歼其一部，余突围逃郴。白崇禧的廖

部、欧部确曾先后来犯汝城，但那是下湾战斗之后的事。九峰属广东乐昌，非汝城之地。我边总第一支队曾阻击廖部，是在汝城文明。

该文谈及李林同志曾去吉安迎接大军，应同时提高郭鸣凤及其所率湘边队第二大队随行，才能有效地说明会师活动和支援大军等问题。

该文说明湘南支队“下设三个大队，第一大队长耿俊猛，下分若干中队，第二大队长郭垂炎，王迪进为副大队长。”但其中缺第三大队，应是大队长朱亚雄。朱是由汝城地下党安排到县警察部队任中队长，1949年7月率部起义，整编为第三大队的。第二大队是湘边队第三大队在打完下湾战斗后被编入的。第一大队应加提副大队长杨湘，他是湘边队原汝桂武工队长、郴宜武工队队长，后率部编入湘支一大队为第二中队。第三中队是湘边队廖康率领的宜章武工队改编的。

订正《中统在湖南的活动》一处史实

编辑同志：

贵刊32辑刊载的《中统在湖南的活动》一文，有一处与史实不符。该文第49页说：“后来宋焕章对我说，在他与段念祖、陈崇鉴三人的密谋下，杀害了中共地下组织派来的那位青年。”这句话纯系造谣！中统特务张蔚来水口山活动时，他找的是段念祖（矿局的国民党区党部书记），而不是我这个矿局长。至于张蔚来此干了一些什么，我一点不知道，也不知情，更未参与过特务杀人密谋。

陈崇鉴

《浏阳起义前后》一文首句失实

《湖南文史资料》第30辑所载王绳祖的《浏阳起义前后》，一文开头一句说：“1948年秋，以姜亚勋为首的‘湘中一支队’在宁乡、益阳一带神出鬼没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此语不符合历史事实。

第一，什么时候才有姜亚勋任司令员的“湘中一支队”？

《湖南党史大事年表》第178页和《宁乡人民革命史》第196至198页都记载：1949年5月，“湘中一支队”建立。就是说，在此之前“湘中一支队”尚不存在。

第二，据《湘中一、三支队始末》和《宁乡“黄唐起义”以后情况》等回忆文章记载：“1948年5月，姜亚勋脱离国民党王耀武部从山东回到宁乡，下半年在黄材流光完小教书”，不但没有反映“1948年秋，以姜亚勋为首的‘湘中一支队’”之类的事，而且也找不到“1948年，以姜亚勋为首的”其他任何名称的武装队伍的叙述。

(王兴刚)

历代贡品 莲中珍品

湘潭寸三莲

湘潭县食杂果品公司经营

湘潭寸三莲昔为历代皇帝之贡品，盛产于国画大师，世界文化名人齐白石的故乡——湖南省湘潭县。其颗粒圆壮，肉色乳白，晶莹如玉。经蒸煮，加入冰糖，又名“冰糖湘白莲”，吃起来嫩脆甜美，清香爽口，素为湘中名菜。寸三莲内含蛋白质、脂肪、淀粉、糖类和各种氨基酸、维生素，有滋养、安神、固精、健脾、润肺、止泻、清热降压等功能，实为莲中之珍品。在1988年首届中国食品博览会上，我公司加工制作的“莲城牌空芯寸三莲”被授予铜牌奖（莲中唯一获奖）。产品享有盛名，畅销国内各省市，并成为湘莲中出口的主宗产品，远销英、美、法、日、新加坡、马来西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寸三莲品类有湘肉莲、湘壳莲、开边莲、空芯白莲。包装有精装和散装，其中500克盒式精装寸三莲，可作为馈赠亲友的佳品。

我公司兼营有藕粉。藕粉为湘莲之副产品。湘潭昔以盛产藕粉著称，旧志云，湘潭莲藕甲于全楚，亦系贡品。我公司所加工的纯藕粉，品质优良，营养丰富，含有淀粉、蛋白质、脂肪、糖类、钙、磷、钾等多种维生素成分。食用方便，用开水即可冲服。是婴儿、病员和老人最理想的营养佳品。

我公司还经营有黄花菜、百合干等土产特产和其它食杂、干鲜果品以及糖、酒、五金、百货等品种。经营方式以批发为主。欢迎广大客商前来我公司洽谈业务。服务热情，信誉至上。

湘潭县食品果品公司 经理：方荣申

